

# 民主台灣



36

1984年9月1日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出版



# 百花

黨外雜誌近幾個月來，出現大量的週刊。雖然屢遭查禁、停刊，但仍維持每週有七、八份的刊物（或「叢書」）上市。由於各黨外週刊上市時間彼此協調錯開，讀者每天均可看到一份新刊物，有如報紙。這是黨外人士力求突破報禁的嚐試。

黨外週刊始自去年三月間創刊的「前進」。這份標榜「最接近事實的新聞刊物」，很快受到讀者的歡迎，銷路平均在一萬五千份上下，領先於百花齊放的黨外諸雜誌。「前進」的成功刺激了其他黨外刊物，紛紛朝向週刊發展。終於到了今天七、八份並出的盛況。

單從數量來說，以台灣這麼狹小的市場，居然能夠支持七、八份的性質相近的新聞週刊，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大奇觀。以美國市場之大、新聞事業之發達，也不過只支持三份新聞性的週刊（Time Newsweek,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s）。而且台灣黨外刊物很少廣告，經費主要來自售書所得，訂價難免偏高（目前各週刊每本售價多訂為台幣五十元）。一位讀者如欲看盡七份週刊，每天得花五十元，一個月下來就是一千五百元，對每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了。然而，各週刊銷數多能維持其開支所需，有些銷路較好者還有贏餘。若非國民黨當局不時查禁，還真能發財呢！

讀者對黨外週刊熱烈的歡迎，表明台灣老百姓渴望多知道一些事情真象。既有的新聞媒介並不能取得老百姓全然的信任。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報紙、廣播、電視都有所偏。國民黨長期經營對新聞媒介的控制，出現了讀者的「信任危機」，已處在被突破的關頭上。

最近，台灣新聞界播報奧運，正可說明國民黨對新聞媒介控制開始失靈。事先，國民黨文工會下令不能正面播放中國大陸選手得獎牌的消息。結果電視上出現一些被掩蓋部份畫面的鏡頭。電視觀眾抗議了，無數的電話、信件投向電視台，逼得國民黨中常委楚崧秋不得不以「以讀者投書」方式在各報表示可以報導大陸運動員各種消息。老百姓群起蜂湧地抗議，這在十年前的台灣是不可想像的事。那時，外國報刊進口台灣，常有被塗黑、剪掉片斷的地方。讀者收到這樣一份殘破不全的雜誌，只有自認倒霉。誰敢去抗議呢？如今，人們不再畏縮地「自認倒霉」了。相對地，國民黨的控制媒體，就要面臨危機了。

當然，國民黨不會輕易讓步，放鬆對媒體的控制，解除報禁。媒體是宣傳統治者意識，塑造輿論，操縱社會思想的重要工具。以美國之自由民主，媒體仍常可以左右老百姓的意識。這次奧運，ABC電台激起美國觀眾愛國主義狂熱，即為一例。媒體既然具有如此鉅大威力，任何統治者，任何有財有勢有辦法的人，決不會不想利用媒體，操縱媒體。美國如此，國民黨當局就更不用說了。

國民黨不放棄控制，並不表示現有的控制方式仍將一成不變。面對黨外刊物的蓬勃成長，人們對「知」的渴求，國民黨在某些方面已被迫作一定的讓步。按此發展趨勢，黨外突破報禁辦報的可能性已不可忽略。黨外人士應當往這方面準備。

國民黨將改變成怎樣的控制方式呢？回顧近一、兩年國民黨對黨外刊物的控制方式，似乎是朝向「社會控制」，而與以往直接的「行政控制」有所不同。從「自由中國」以來到「

# 齊 放 !?

美麗島事件」爲止，國民黨對付異己刊物，主要依賴查禁，停刊，乃至抓人這種「行政控制」。這一、兩年，查禁停刊雖經常發生，但仍有許多漏網之魚，其言論之「大逆不道」，在以往國民黨是不難容忍的。這正表明，國民黨的直接底「行政控制」已逐漸放鬆。

從六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快速「雖然是畸型地」成長，社會累積了大量財富，中產階級興起。他們嚐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因而力求安定，深恐動亂。中產階級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堅份子，他們力求安定的心態，已漫延成爲社會的「共識」。這雖是一種錯誤的社會意識（因爲這不是佔人口多數的工人農民的意識）但却具有鉅大的影響力。黨外新生代所主辦各週刊的激進言論，已不容易產生直接的行動效果。台灣社會這種偏安心態，已逐漸成爲社會改革運動的阻力。這是當前整個民主運動往前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在不能根本改變這種偏安心態之前，運動的路綫，有些人則會朝更激烈的批判發展。前者不易產生有力的改革效果，後者則不易得到多數社會群衆的共鳴。這種不是來自統治者直接干預的「社會控制」已逐漸發揮作用，而逐漸爲國民黨當局所借用。

從前，在「行政控制」方式下，黨外刊物被查禁、人員被捕，容易激起民衆的正義感與抗議精神。高雄事件逮捕了許多黨外人士，却鼓舞更多人獻身於黨外運動。但在「社會控制」方式下，「控制者」的角色不鮮明，與統治者的關係間接而模糊，對民衆慷慨激昂地訴求方式已不易奏效（甚至會產生反效果）。

面對這種新的「社會控制」，黨外人士必須有新的策略。偏安心態是基於對現狀的滿足，對改革的恐懼。黨外人士必須分析台灣社會與經濟現況。這裡頭有許多不合理不正義之處（如中、下層民衆所受不合理的待遇與剝削），有許多長期危險的副效果（如環境污染），更有許多基礎不穩之處（如經濟的繁榮過份依賴外貿）。這種種問題，使得台灣目前的安定繁榮局面危機四伏。黨外人士必須從對國民黨批判者的角色，提昇爲對社會批判者的角色，如此方能有效地克服新型的「社會控制」。

由直接的「行政控制」過渡到間接的「社會控制」，不僅是國民黨控制台灣型態的改變，也反映了台灣社正處於一種轉型的過程中。關心台灣民主運動者，有志於從事於社會改革的人，都需要因應這種新的變遷。台灣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更加複雜了。單純的關心台灣，單純的反抗意識是很可貴，也是必要，但却遠遠不夠。深刻地認識社會問題，借助各種社會科學的知識來分析台灣社會，已經是愈形重要的課題。

台灣社會的轉型，以及國民黨控制方式的改變，還只處在開始階段。當轉型日益成熟，黨外雜誌的面目與民主運動的形式也一定要跟着改變。這將是一個改變的年代，一個開創局面的新時期。我們祝願台灣的黨外人士及所有民間抗議運動份子能掌握機先，在變局中爲台灣的民主運動之更上層樓，爲台灣人民之真正當家作主，闖出一條新道路來。我們更呼籲身在海外關心台灣的朋友及同學們，利用海外獲取資訊與思潮較容易的優點，共同努力來探索新的變局，協助台灣民主運動者更深入地掌握新局面，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 評論

- 1 百花齊放下的新問題／本社  
國民黨對民主運動刊物從「行政控制」逐漸過渡為「社會控制」。黨外也須從純粹批評國民黨過渡為對社會的批判者

## 瞭解台灣

- 5 歡迎林義雄出獄／近聞與短評  
這是海內外無數人持續地抗議下的結果
- 8 為什麼賀兆雄不可以組織工會／文山  
官僚、財團及外資壟斷下的台灣經濟體系，是工會運動的最大敵對者
- 6 送愛心給勞工，更要送正義給勞工／近聞與短評  
海山、煤山礦災震驚海內外。人們送愛心給勞工。但勞工更需要的是正義
- 7 民主運動支援勞工／近聞與短評  
黨外新生代成立「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
- 10 失落的山地花／洪田凌  
黃春明正在開拍的電影「我的名字叫蓮花」確有其人其事。蓮花是山胞苦難的縮影

## 認識世界

- 24 六十年代的國際學生運動／波特模作／夏雨譯  
一位世界聞名的社會學家，省察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席捲全球的原因，作用及其局限性
- 28 觀南非電影有感／小雲  
一位剛出國留學的新生，誠懇地表達接觸新事物後的振撼與反省。

## 思想

- 33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戴國輝  
中心——邊陲的模式被應用來探討華人的意識
- 46 歷史的焦點與預言的黃昏／林中平  
對陳映真與漁父之間關於發展理論的批評與反省

## 社會與環境

- 51 石棉的悲劇／屏輝  
一種可怕的致癌物，正被跨國公司輸送到台灣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 歷史

- 49 抗日英雄變土匪／王曉波  
陳田鏞為了打擊洪壽美，竟想利用權勢來篡改歷史

## 藝文

- 56 談西部古巴電影／吳弗林  
介紹古巴名片「露西亞」與「低度開發的回憶」，也介紹一個新興國家如何獨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文化

## 民間大家

- 17 海外知識份子的方向／王曉波  
提出作者主張統一的理由
- 21 民主意識與文化意識／林中平  
就上文提出文化的認同未必等於政治認同，民主是最重要的問題

# 編輯報告

首先要向關心的讀者致歉，七月份的「民主台灣」由於編者忙於參於籌備支援會的夏令營工作而脫期一次。部份稿件也因時效而抽掉，也在此向作者道歉。這次脫期應當可以透過事前安排而避免的。有了這次「不光彩」的經驗，以後我們較有信心，不會再發生類似的脫期。

與去年一樣，支援會今年暑期夏令營有許多精彩的演講。我們將整理於下期刊出。

這四個月來，台灣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至少包括下列各項：

一、行政院改組，俞國華繼孫運璿出任院長。內閣人事更換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李煥出長教育部。這位當年身兼救國團、組織工作會及革命實踐研究院三大實權要職的蔣經國左右大將，在中壢事件後被貶入冷宮。王昇勢力因而高漲。今年四月，王昇被流放南美，李煥則在長期蟄伏之後又開始步上政治舞台，長期在黨內工作的李煥會不會與蔣彥士衝突？會不會更上層樓？均引人注意。

另外，在「倒王昇」中立有大功的蔣緯國竟也步王昇後塵而出任聯訓部主任。「兔死狗烹」何其速也。

二、六月二十及七月十日，台灣發生兩次大礦災。七月間，勞動基準法終於完成立法，雖然內容非常偏袒資方，却也引起許多廠商非法解雇資源勞工，而導至聯合抗議多起。八月間，廣受注目的賀兆雄籌組的船員工會被國民黨巧奪果實。又，黨外新生代成立「勞工法律支援會」等等，等等有關勞工事件多起。參閱本期「送愛心給勞工，更要送正義給勞工」「民主運動支援勞工」「為什麼賀兆雄不可以組織工會？」等文。

三、礦災暴露了山胞問題。我們轉載「失落的山地花」，心情沉重地呼籲所有正義感的朋友共同來關心這個長期被忽視的山胞問題。

四、高雄市議長陳田錨濫用特權，引起黨外市議員洪壽美的抗議，最後竟曲折地導至抗日英雄林少貓的忠奸之辯。請參閱王曉波的專文。

這麼多重大事件不停地發生，顯示台灣社會內許多矛盾不斷地激化，值得我們注意、分析。台灣內部的矛盾，已不只限於選舉，黨內外對立等方面。勞工問題、山胞問題、校園問題，這些過去較不受注意的地方，如今也日形嚴重。本期對部份問題提出一些分析與評論，表達了我們對台灣問題的關懷與探討。

探討台灣却不應只局限於台灣內部發生的事。從更廣的國際架構下來檢視台灣問題可以有助於擴大視野、吸取別國人民克服困難的經驗。例如，學生運動普遍發生在許多國家許多時代中。雖各有其特性，但也有其共性，值得我們借鏡。「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回顧」一文深刻反省了這個曾經席捲全球，震撼資本主義文明的大運動。

有怎樣的社會現況，就會在人們的腦中形成一定的意識。台灣長期與中國大陸的分離，形成了有別於「中國意識」的「台灣意識」，而引起了近年來的「意識」論戰。本期「民主大家來」有幾則有關意識的討論。

這裡我們推薦戴國輝先生「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以一個獨特的角度來探討地方意識的問題。理論形式上，戴先生使用的「中原——邊陲」對立觀念，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上兩期本刊介紹的「依賴理論」即是將此「中心——邊陲」對立應用來考察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問題。台灣山胞的處境，若以這個模式來研究，將有助於深刻地了解山胞所受雙重的壓迫。

第三世界國家對資本主義中心的依賴，即使在某些已「革命」後的地方，也殘留在部份人的意識中。吳弗林介紹的兩部古巴電影，表達了這個事實。「甘地」電影則反映了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對過去殖民地仍保有的優越意識。這種依賴關係不僅表現在文化意識上，也不僅表現在政治與經濟不平衡上，還會影響在公害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向邊陲地區輸出公害，是最明顯例子。「石棉的悲劇」提供了一個直接影響到台灣例子。

# 林義雄

## 歷劫歸來

高雄事件政治犯，林宅滅門血案苦主林義雄經「特赦」「假釋」而出獄了。同時出獄的還有政治犯高俊明牧師等多人。

林義雄被關是純粹的政治迫害。莫說「高雄事件」充滿了冤情。即使「高雄事件」有罪，也輪不上林義雄。因為他並未參與高雄人權遊行，他只是應康寧祥之邀而去調節可能的衝突。

在林義雄被拘期間，在情治人員監視下的林宅竟然發生慘絕人寰的林家滅門血案。林義雄為台灣的民主運動背負了最大的犧牲。

在無數人的譴責、要求、呼籲、奔走營救下，國民黨當局終於釋放林義雄了。抗議還是有用的。當國民黨當局判刑林義雄時是何等悍然！而這悍然終也敵不過無數人抗議所匯集的力量！

國民黨當局能夠提前釋放林義雄，這總比不顧一切繼續把林義雄關下去為好。人們歡迎國民黨這個舉動，但並不感激。因為林義雄案從頭就是一個冤獄，他本來就不應被關。提前釋放並不是恩惠，他早就應當被釋放。所以人們對國民黨當局並無感激，只有憤怒，憤怒無辜的林義雄被關了這麼久，

憤怒他的母女被殺害！

或說，國民黨釋放林義雄，表明它有了悔改之意。我們不以為事情是這麼單純。政治是現實的，它只講利害，「悔改」「良心」云云都只是冠冕堂皇的表面話。國民黨釋放林義雄，必然是在鉅大壓力下，衡量琢磨出釋放比較有利，才會作此決定。這裡，各種客觀條件與時機都有關係，但人們長期持續以各種方式表達抗議，是最根本的壓力。

提前釋放也說不上還林義雄以公道。國民黨根本就沒有能力還林義雄的公道。那怕國民黨賠償以金錢，地位等等，也是枉然。然而，台灣人民却能給林義雄以公道。林義雄為台灣的苦難所付出的犧牲早已根植人們心底。台灣人民由衷地敬佩愛戴林義雄，便是真正的公道。

在歡迎林義雄及高俊明等人出獄之餘，我們也關懷高雄事件的其他服刑中的政治犯，以及其他政治犯如葉島蕾、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等等，等等，特別還有關在綠島三十多年的幾位老政治犯。讓我們繼續向國民黨當局表達抗議，以助這些政治犯早日出獄！

# 把正義還給他們

他們明知道每天都可能面臨死亡，  
但是為了溫飽，他們還是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

今年六月二十日及七月十日，台灣發生了海山、煤山兩次煤礦災變，奔走了一百七十七位礦工的生命。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生了兩次巨大的礦災，死亡人數都打破了災變頻仍的台灣礦災史，引起了海內外的震驚。從各種傳來的報導與圖片、罹難家屬焦慮，悲悽地守在礦坑口，等待救援人員救人上來或送屍出坑。有些家屬受不了殘酷的事實或長期近乎絕望的等待而崩潰昏倒，實在是人間一大慘境。

礦災發生後，台灣社會發起了各式各樣的募捐活動，「送愛心到礦山」成了到處可聽到的呼號。誠然，喪葬費、家屬生活費、子女教育費等等，在在都需要錢。而台灣的礦工，多數都缺乏適當的保險，政府官方的福利也極為有限，遠不足以維持罹難家屬未來的生活。因此，各種捐助是完全必要的，也表達了社會上仍充滿了對不幸者的愛心。

然而，再多的愛心也挽回不了一百多條生命；鉅額的死後補償也比不上還我一個活活的人來。因此，在募捐之餘，更需要研究發生災變的原因，懲罰各種失責人員。如此，才能防止未來再度發生類似的慘劇。不幸，我們看到台灣官方有關當局對這種檢討做得極為不足。這麼重大的災難，死傷這麼多人，居然沒有一個主管官員挺身辭職以示負責。我們擔心，社會上熱烈的捐款與愛心，反而會麻痺了對災變應有的嚴肅檢討以防不幸重犯。如此，這種愛心適足以為失職人員脫罪，為未來災變再發埋下種子。

一些黨外人士有鑑於此，在「送愛心給礦山」同時，主張還要「送正義到礦山」。七月二十八日，桃園黨外聯誼會與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所共同主

辦的義賣慈善晚會，更提出了「把正義還給他們」的口號。他們說：

「我們還要匯合廣大的社會力量監督政府，在未來確實保障礦工工作與生命的起碼安全。對於造成一百七十七條生命死亡的疏忽與過失，我們要求追究政治責任與刑事責任，這是我們對冤死者僅能做到的正義補償。」

黨外的這種主張對極了！對礦工，或任何受苦受剝削的人來說，正義要比愛心重要得多。只要有正義，災變或其他不幸受難可以有效地防範。否則，災難一再發生，再多的愛心也阻止不了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

而我們台灣這個社會對待勞工實在太不正義了。「廉價」的勞工，是近十多年來，台灣以加工外銷為主導的經濟成長得以迅速發達的基本因素。可以說，勞工創造了今日台灣經濟的繁榮。然而，為台灣經濟「起飛」貢獻最大的勞工，却長期受到「廉價」的待遇，不僅沒有分享應有的繁榮果實，反而在各種不良的工作環境，在缺乏適當的福利、保險條件下，以自身的青春與健康為代價換取微薄的薪資。個別的勞工與財雄勢大的資方相爭，總是以卵擊石，組織化的勞工，集體的抗議以及政府法令的保障乃成為維護勞工權益的必備工具。可是，在台灣，勞工是不許自由地組織工會的。三十多年來，只有半生戎馬退役的賀兆雄出來籌組海員工會，才開始有點獨立工會的苗頭。這個受到黨外及部份輿論關心支援下的籌組工會活動，在民主運動力量高漲以及賀兆雄本人長期堅毅不懈的努力下，却到最後關頭被國民黨當局四面撥千斤地動員了「表決部隊」而劫取了成果。國民黨當局這種旁奪巧取地阻礙真正工會的產生，從而使得工人不能有效地保

障自己應有的權益而終至各種海難，漁船被他國扣押等不幸事件一再發生，說明缺乏組織化的勞工，是一切勞工苦難的根源，也是一切不正義的來由。

七月間，延遲一、二十年的勞動基準法終於通過而要付諸實施了。這個勞動基準法，處處偏袒資方，早已為台灣黨外人士，學者及民間輿論所垢病。這次通過前，又作了更不利勞方的修改。主要有二：

1 原法案對「勞工」定義的範圍已太狹小，在六、七百萬需要保障勞工中只有三百多萬符合定義。而修改後的條文更窄，只有二百萬受到保障；

2 當公司倒閉後，一般先進國家都規定，殘存的資金應優先償還勞工應得的工資等，剩下的再返

給債權人。可是，由於受到資本家的壓力（主要是外資），台灣的勞動基準法竟把這種優先秩序顛倒過來！

然而，即使是這樣一部支離破碎的法案，資本家還是千方百計地找漏洞。就在法案正式施行前，台灣許多公司便無理地開除許多資深勞工，為的是要逃避日後可能的退休金。法案的本身以及資方的小動作，鮮明地表示台灣的勞工是受到何等不正義的待遇！

在觸目驚心的礦災下，人們送愛心到礦山。然而，礦工不是唯一受剝削受害的。多數的勞工都需要我們的愛心，更需要正義！讓我們送愛心給勞工，更要送正義給勞工。



台灣

成立

## 勞工法律支援會

今年五月一日勞動節，台灣一批關心勞工的民間人士成立了一個「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為勞工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他們選出第一屆執行委員：邱義仁（主任委員），郭吉仁、袁嬾嬾、楊青矗、簡錫楷、蘇慶黎、賀端著。並聘郭吉仁與李勝雄為義務律師。

七月間這個勞工法律支援會出刊了：「勞動者」第一期。這份報紙型的會訊，第一版簡介該會來由，宗旨與組織。第二版有世界勞工運動報導：「西德工人大罷工、爭取卅五小時工作週」及台灣勞工事件報導：「宜蘭客運積欠工資、司機車掌集體罷工陳情」等。第三版是勞工法律信箱，回覆勞工來信、第四版有五、六月份的工作報告、總計收到

六十七個案件。

「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出現，反映了台灣勞工問題日形嚴重。工人的合法權益不斷受到危害，亟需律師等人的支援。選出的執行委員多為黨外新生代。說明黨外新生代日益重視勞工問題。我們一貫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不能忽視佔就業人口半數以上的勞工。民主運動如要有進一步的成長，一定要爭取勞工應有的民主權利，一定要讓勞工參與民主運動的洪流。勞工法律支援會代表民主運動新生代開始重視勞工，重視民主運動與勞工的聯合。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祝福它的茁壯成長，為勞工爭取更多權益、為民主運動注入新血。



# 為什麼賀兆雄 不可以組織工會？

• 文山 •

戒嚴法下渡過了三十多年的台灣，一向不曾有過（更正確的說——不能有過）具體的工會運動。工會是有，不過都牢牢的國民黨當局及資方的控制之下，只有裝飾性的功能，實際上台灣是個「資本家的樂園」。在這樣的情勢下，四年前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漁船報務員賀兆雄，竟然「不識時務」的開始籌組高雄市漁船船員工會（見本刊35期「都來支持賀兆雄」一文），經過了數年來不屈不撓的奮鬥，到了今年一月三十日，始奇蹟的獲准開成了第一次的籌備會，但是隨後種種的軟硬壓力又紛至沓來，迄今成立大會能否順利召開猶在未定之天。

賀兆雄的工會是洪水猛獸嗎？

台灣的遠洋漁業船員，十多年來內受日本代理商，台灣船東的層層剝削，外受東南亞菲律賓，印尼等國海軍強盜的打劫、擄掠甚至殺害等等威脅，早就淪於非人生活的狀態。漁船上衛生、安全設備的缺乏，食物的惡劣，甚至引起南非、澳洲等駐留港國的批評與責難。許多船員紛紛轉業求去，取代的多是在平地社會比較缺乏競爭能力的山地青年，或是其他走頭無路的人。由於一般船員，尤其是教育程度偏低的山地青年，知識、力量甚為有限，很容易被船東們玩弄於股掌之上，機苟安家費、船上伙食費、甚至於傷亡撫恤、保險費已屬司空見慣；更有甚者，有些船東利用「分紅入股」制，製造假帳，使有些船員上船工作一段時間後反而倒欠船東錢，必須再上船償債，然後一再反復，使船員成了船東的奴工。賀兆雄深為這種現象感到憤憤不平，

於是想藉着成立工會組織，以團體的力量來保障個別船員的利益，爭取較為合乎人道的待遇，組織工會畢竟是連戒嚴法也沒有限制的人民基本權利啊！

細看他們的章程草案，第一條就強調了這個章程是根據台灣的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訂定的。最重要的第五條任務部份，除了第一項「團體協約之締結、或修改或廢止」，略微暗示了「集體交涉權」，屬於積極性功能外，其餘都是屬於建議性或服務性的消極性功能，比如「關於勞工法規之制定與修改式廢止事項之建議」，「有關漁政及漁業之建議」，「協助會員與船主間爭議事件之調處」，以及其他出版、康樂、舉辦合作社等等服務性措施。一般國家工會運動，最重要的武器「罷工權」自然是提都不必提了。最後一條還「狗尾續貂」的加上了「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准主管機關實施之」，給當局一個定心丸。對於這樣一個低調的、溫和的，以服務性為主的工會運動，國民黨還有什麼好「怕怕」的！真正的洪水猛獸是船東以及背後

的日本代理商，是他們的貪婪苛酷逼出了這個爭取最低生存權利的工會運動！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有一種說法，認為國民黨有鑒於過去在中國大陸全面潰敗的教訓，對於學運、工運特別敏感，可以決不容許一個自由工會的產生。對於近代史，若是稍微留意，就會發現這個論點的說服力不足。國民政府時代的中國，農村凋蔽，產業落後，勞工集中在少數幾個沿海的大城市，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甚低。工會運動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大屠殺」以前，在上海地區曾經蓬勃一時，甚至能夠在一夜之間自軍閥手中奪取了上海地區的控制權，以響應國民革命軍。可是在隨後蔣介石的鐵腕鎮壓下，只留下了無數的工運烈士，以及「白色恐怖」這個歷史名詞。中共後來還是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以廣泛的農民運動，自己會優異的軍事策略，取得了政權。所以「咬過國民黨的蛇」不是工運，國民黨沒有理由如此懼怕它。

官僚、財團及外資壟斷下的台灣經濟，才是工會運動的最大敵對者

近二十年來台灣表象上的經濟快速成長，可以說是始自於一九六五年，在美國國際開展總署等的催促下，實施了「獎勵投資條例」等一連串措施，放棄了民生主義的道路，發展出口導向的加工型經

濟，利用台灣優良，廉價的勞動力，達成了高速成長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造就了許多的新興資本家，尤其是肥大了幾位大企業、金融財團，而在近些年中更進一步的進行大魚吃小魚的兼併過程。同時官僚資本更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借助於行政特權，伸入、壟斷多種營利性事業。以美、日為主的跨國外資公司，也紛紛而入，設立以初級技術為主的加工工廠，在利潤掛帥的前題下，自然以壓低工資，減縮工人福利為能事。對於官僚、財團以及外資，高投資報酬率，高速度的資本積累，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攫取最多的勞動剩餘價值，所以任何向他們挑戰，分享這塊大餅的工會運動，都是他們所要極力防止的。

七十年代以降，台灣當局日益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於是更加倚重加強與美國、日本的經濟依賴關係，希圖做為政治上的與援，隨着日、美與中國建交，這種傾向更是有增無疑。最近在美國總統雷根訪問中國前後，台灣代表官方的新聞局局長宋楚瑜，竟然公開宣稱，「台灣是美國的資產」云云。為了防止外資對台灣失去興趣，國民黨更加避諱任何自由工會運動，這可以由反對賀兆雄工會運動的，不是主管勞工問題的內政部，而是代表國民黨中央的秘書長蔣彥士，看出來其中的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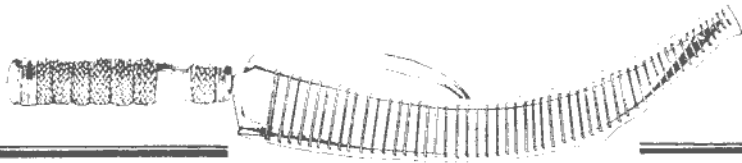
展望未來，只要台灣現行的經濟路線不改，工會運動仍然會繼續的受到統治階級，不斷的壓制和打擊，但是廣大勞動工人的自覺意識，隨着近年來勞資糾紛的急速增加，顯著的在快速提高，工人為了爭取基本生存權，保障應得利益的運動，必然會蔚成一股潮流，不是任何力量所可以阻擋的了。

（編者按）：賀兆雄籌組的船員工會於七月底正式成立了。但別高興，工會理事會完全被船主們所控制，賀兆雄本人也只被選為監事而已。佔船員百分之九十的山胞無人入選為理監事。五年來賀兆雄等人辛辛苦苦的耕耘，到頭來被人篡奪了勝利的果實！

原來，國民黨當局鑒於賀兆雄等人長期以來百折不回，其事跡又經諸黨外刊物廣為宣傳，不易鎮壓於無形。而且八月一日勞動基準法即將實施，該法雖被學者專家評為袒護資方，但終究有「法」可

據。國民黨遂允其成立，但却發動聽話的近海船員及報關員等數百人加入選舉。多數真正需要工會的遠洋船員因出海作業無法與會，於是新成立的工會遂完全被國民黨所控制。為抗議這種操縱，賀兆雄不久辭去監事。他將改籌「遠洋船員聯誼會」，繼續為受苦的船員爭取應有的權力。

國民黨不僅篡奪果實，還趁勝要趕盡殺絕，新成立的理事會居然議決，不承認事前賀兆雄等人五年來籌組工會的合法性，逼迫賀兆雄自行負擔所有的籌備費用。



# 台灣高山族的

# 吶喊

## ★我的同伴「克拉豹」給殺了

「經濟部遠洋漁船船員訓練班」是政府爲了幫船公司提供船員而設立的，每個月都有新學員受訓，但總覺得船員老不夠用，主要是上船太苦了，待遇低、時間長、沒保障、風險大……總之，不是人幹的就是。平地人除非當幹部，否則很少會像我們山地人，老老少少都不得不上船。

「克拉豹」是山地上的一隻老鼠。在隊上，我們用來稱呼一位林姓山地隊友，他善於出鬼點子，比如晚上點名後，藉機出去帶米酒、花生、滷菜等回來。每天熄燈後，他總有辦法弄些酒菜，大夥兒躲在廁所裡大幹一場，他很謹慎，一下子注意查鋪，一下子要大家聲音放低，一下子又教大家上床……

記得剛報到時，「克拉豹」是不講話的，可是才兩天，他就尋找了好幾個覺得適合的朋友了。他熱誠、有幹勁、有擔當，遇有懲罰，會毫不在乎的自己肩挑下來，實習課打漁釣、上網架，他老是學得特別快，而且幫助同伴比教官傳授的還動快。結訓時，我們都期望能轉到他的公司與他同船。

兩年後，當我第一次返航時，却聽到了「克拉豹」上的船在巴士海峽遭到菲律賓人的搶劫，他因著救助被毆打的同伴而給殺了

根據資料顯示，海山煤礦災變中，七十一位死者裡面，有二十二位是山地人，其中大部分來自台東縣池上鄉，其餘來自花蓮。這是此次災變裡，各大小報紙和電視廣播所「故意忽略」的最大事實，在台灣各地的礦工中，高山族佔高比例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高山族場的八百多位工人中，高山族便佔五百餘位。我們爲山地人悲慘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國民黨控制下的傳播機構刻意掩飾高山民族悲慘境況的手段，提出嚴重的抗議！

山地人從台灣的原住民變成「牛埔番」，變成「山地同胞」，到現在又變成名符其實的「地底洞人」。從平原一步步被趕向山野蠻荒之地，現在又被趕到海上當漁夫，趕進華西街暗無天日的小房間中供人玩弄，趕進火熱地心般的礦坑裡；台灣高山族已逐漸消失在美麗之島的地表上，真是一幕活生生的民族沈淪史！

海山煤礦災變暴露的不僅是台灣煤礦業的脆弱和台灣勞動者的保障問題，更暴露了台灣高山族被壓迫在我們社會最底層的事實！我們要呼籲全體社會不但應積極伸出援手即時協助受難家屬，而且應重視高山族同胞所面臨的種族滅絕危機！

## ★這兒不是比嫁家舒適嗎？

爸爸的積累再也不值錢了，爲了那片樂園，家裡負了一筆不小的債。

媽媽含著淚水跟著在法院工作的表叔把我送到高雄來，只說了「沒有辦法，希望妳能忍耐，對不起」。從此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我看不到弟妹與他們。

「不要想家，這兒不是比嫁家舒適嗎？」

「妳不能和客人有感情。」

「爲了妳父母，我勸妳不要魯莽，千萬不要逃跑。」

有半年的時間，老板跟幾子時時刻刻都在叮嚀、吩咐。跟著阿吉仔的摩托車東奔西走，每天都得有十四、五個，甚至還沒到家就有人攔在門口指示另一個工作。天亮才是休息的時候，吃過早點，打了桶清涼藥水清洗身子後才極著疲倦，跟著幾個姐妹擠上一張大床。直到最近那首胸，才得以由阿吉仔陪同回家與弟妹聚了三天。

爸爸負了六十幾萬的債，我却以四年八十萬的價格去償還。早知這會淪落到離苦站，我是不該上高雄的。



※ 爲什麼？爲什麼？ 詞 曲胡德夫

一 爲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綠的田園

——忘掉往日的豐收。

——漂盪在無邊的海洋。

掙扎呀！掙扎，在族人的思念裡

海奴的身軀，埋在太平洋的深處。

二 爲什麼，這麼多的人，湧進昏暗的礦坑

——忘掉了坑外的擔憂。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轟然的巨响，堵住了所有的路。

凶湧的瓦斯，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

(副) 爲什麼，這麼多的人，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最近半年來，台灣山胞的悲慘處境開始引起台灣社會的注意。部份山地知識青年覺醒了，出版「高山青」刊物，得到黨外刊物的聲援。他們發文介紹，討論山胞的生活遭遇。另外，「民衆日報」「台灣時報」等幾份南台灣報紙也注意這個問題，大量報導山胞的生活、文化，淪落都市山胞的遭遇等等。

賀兆雄籌組海員工會，人們恍然發現最艱苦的遠洋船員，竟然多數來自山胞。今年六月二十日海山煤礦災變，罹難的七十一名礦工中，霍然有三十二名是山胞。後來調查發現，海山煤礦八百多名礦工中，山胞便佔了五百多人！

今年四月四日，在這個日本首次討蕃的紀念日上，「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成立了少數民族委員會，由卑南族的胡德夫任召集人，前夏潮主編蘇慶黎任副召集人。委員會成立後即積極展開工作，首先建立山地資料中心，舉辦座談會。在海山礦災後組調查隊，調查山胞受難情況，發起募捐運動。

六月二十四日，「委員會」舉辦「為山胞而歌」演唱會。會中胡德夫唱他專為礦災而作的新歌「爲什麼？爲什麼？」當他唱到「海奴的身軀，埋在太平洋的深處」時，竟忍不住當場嗚咽而泣。歌後，他向新公園的數千聽衆致歉說：「或許，山胞的苦難還未結束……」當場，無數的聽衆也都含眼淚，場面至為動人。

山胞的處境，是台灣中下層人民生活的一個反映，山胞的苦難，是台灣經濟繁榮的諷刺。從山胞的問題，讓我們看到台灣的問題不只在選舉不公平，政治壓迫，或經濟升級等方面，而是千千萬萬墊底的人在受苦。

這篇「失落的山地花」生動地介紹山胞淪落都市後的悲慘生活。男的出遠洋，下地底，女的當娼妓。是誰使他們變得這麼悲慘？願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共同來思索，共同來行動！

本文原刊於台灣的「台灣時報」1984年3月15日。幾則有關山地小故事，錄自歌本「為山地而歌」（黨外編聯會少數民族委員會編印，1984年6月出版）

——編按

※保留地被漢人搶走了。

有一天我和一位山地籍的神職人員大談這般問題對山地的禍害，我們正談的非常熱烈之際，牧師突然以嚴肅的口氣對我說：「娼妓有什麼不好？她們也是人啊！」

我繼續憤慨激昂地述說娼妓如何如何不好；尤其對少數民族種族綿延的影響……等，他却義正詞嚴地說：「我是個牧師，可是你相不相信我的妻子、女兒都從事出賣靈肉的工作？一乍聽之下，我搖頭表示不相信，他接著憤怒地說（當然不是對我憤怒）：『保留地被漢人搶走了，外面又是一批設備，我一個牧師的收入又不能維持家計，你說我該怎麼辦？爲了生活我只好允許妻女從事娼妓的工作。』」

我說：「可是你一個牧師身份，怎麼不勸導罪惡讓你的妻子、女兒做這種工作？」他聽了我這句話頗不以爲然地說：「一個再聰明再勤苦再儉省都無法滿足的人；你要他如何想到高層次的倫理道德問題呢？」他這句話使我無言以對。



# 失落的山地花

【霸氣關心】

山地雛妓的故事

洪田浚

山地的社會，除了老人家就是小孩子，正陷在世紀性變遷的困境  
都市山胞，沒有像樣的居所及享受，却要爬在鷹架的最高頂蓋房子，在陰暗的房間出賣自己的身體供人享用，出海頂浪捉魚給都市人吃。在絕望時，只能低吟故鄉的歌曲解憂。

## 蓮花的近況

作家黃春明繼「看海的日子」以後，親自執導新作「我的名字叫蓮花」。由女演員鍾楚紅飾演他筆下被迫賣淫的山地雛妓。

黃春明在電影開拍前，我有緣與他晤談，方知道他拍攝這部影片的背景和動機，他藉着卑南族少女蓮花的悲劇性故事，闡述少數民族在強勢文化侵略下，社會解體、家庭破滅和個人淪落的現象。

在此之前，我也曾獲友人之邀，參觀高市府北城中城一帶的妓院。看到難以數計的山地雛妓，在陰暗的大廈房間內營生。她們的年齡從十二、三歲到十七、八歲之間，居大多數。

隨後，台北文化界人士召開「賴和平反紀念演講會」席間得友人告知，已經獲救脫離妓院的蓮花

，又因父親體弱多病，無以維生，她自願再入火坑，賺錢給父親看病。

同時她的二哥「阿能」，自從策劃救她出來以後，雙眼視力日漸衰微，目前都已失明。

台北友人爲了協助蓮花一家，正在募款，希望蓮花可以不再賣淫賺錢，別尋出路。

此時，高雄記者同業，在一項山地知青聚會上，獲知蓮花的遭遇，以及黃春明對山地問題的關心，即把所聽所聞，整理刊登出來，見諸二月六日台灣時報三版。

不久，得同業轉來讀者的信，是在麻豆任教的方吉雄先生所寫，他表示：

「於二月六日見貴報報導有關一位山胞少女的悲慘遭遇，讀後甚爲感動。這樣純樸的山地少女，遇人不淑，遭人擺佈，真令人惋惜、同情。

目前，社會明暗之間相當複雜。明的方面：大都是以勞力換取代價的人，生活較爲樸實，他們不

知黑暗的一面。

蓮花到底決定在台東山區，靜靜地陪老父度過終生，還是想找一份對社會有益的生產工作，過着踏實的生活呢？

如果蓮花願意工作，那麼歡迎她到本人經營的養雞場，當一名養雞工人，藉着工作忘掉不幸的往事。

這份工作並不繁重，上下午的工作量都是固定的，月薪五千元以上，自己起伙、供宿，唯需身體健康，才能勝任。若是一個人覺得孤獨寂寞，可以另找一人結伴，年齡在十五歲以上，會說國語即可。

以上煩請記者先生代為轉達及連絡。」

方吉雄的善心及好意，阿能十分感激，但他考慮蓮花是否能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的問題，未能立刻作決定。

### 陳榮發的「妓院浮生」

三月初，在新聞報擔任美工編輯的陳榮發兄，舉辦個展，他發表一連串以城中城妓女為主題的油畫近作，題為「妓院浮生」。

陳榮發表示：他的畫室設在城中城內，每天都可以看到妓院動態，而妓院的生意很好，人潮不絕如縷，妓女中泰半是山地雛妓。

這些山地姑娘，相當漂亮，都是各族的美人，她們每天必需粧扮，看起來真是花枝招展，楚楚動人。雖然接客辛苦，可是因為年幼，常常聚在門口

，嬉戲拉客，一派天真。

自從近年來，大批山地雛妓出現在妓院，使風化區的景觀為之一變，過去為妓者，常是皮笑肉不笑，臉部着粉過濃，為拉客而使出渾身解數。

山地雛妓被賣入妓院後，照樣受嚴酷的鞭笞，可是她們人多，又因年幼，沒有一般世俗的羞恥觀念，縱使有羞恥之心存在，久之也變得麻木，習以為常。

所以現在的妓院，雖然房間陰暗如故，設備未見改善多少，但風貌大大相同。嫖客常見一群天真的山地姑娘，鶯聲燕語，稚氣迷人。且她們對待客人，也較親切，不比過去的平地妓女那樣乏味。

「妓院浮生」，幾筆寫意，幾筆寫景，把當前的神女生涯，生動地呈現出來，參觀者每被畫面上所揉和的莊嚴、可親和美感所悸動。

妓院風貌的轉變，雖然可喜，然而其中蘊含太多的悲愴和無奈。

稚子無知，何以天真地賣淫，遭遇像蓮花一樣，出而復入，甘願重操此業，能不令人唏噓！

可是山地各族，不論阿美、排灣、布農、魯凱、卑南、雅美、賽夏、泰雅、曹、邵等，他們的本族，却將從此喪失了母性，同時各族的文化母體也因此為之崩解。

喜好登山的人士，往往發現，山地部落依舊深藏在群山峻嶺之間，可是部落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逐漸在蛻變。年輕的一代，不會說他們的母語，國中以上年齡的青年男女，留在村中的，少之又少，幾不可復見。

### 山地經濟的現況

今年春節，靜極思動，隨高雄市進行會前往茂林鄉舊萬山，探勘魯凱族原始廢城的千年石刻。在萬山部落裡，與魯凱族村人同渡春節晚會，只見小學生跳「狄斯可」，唱「出外的人」，年輕人穿洋裝、騎機車，祇有老年人才唱本族民謠、跳山地舞、穿傳統服裝。

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一書指出：山地社會的解組，與山地經濟受到台灣經濟生產方式的衝擊有關。

### \*都是吳鳳惹的禍

我在成功嶺接受大專集訓時，認識了一位「共患難、同生死」的同志。結訓前幾天，我那位同志以誠懇的口吻說：「我可以去你家嗎？」我心想能有平地大學生去家鄉玩是件大事，於是毫不考慮地答應他，然而他接着又說：「去你家會不會有危險啊？」我遲疑一下反問他：「怎麼會呢？」「嗯！」他欲言又止，我便安慰他說：「你放心啦！我們那兒現在交通已很方便，不會讓你這位平地少爺爬山涉水的！」我接着又說：「你去我家，我會讓你嚐嚐山肉、野菜……」他對我這些話似乎不滿意，後來他終於道出他的顧慮，他很不自在的對我說：「唸國小的時候，課本上說你們會獵人頭，把吳鳳殺了，不知道你們現在還會不會獵人頭？」

「光復後的台灣經濟，轉變原本相當程度的『生計經濟』的生產方式，形成資本主義和市場取向的生產方式，形成資本主義和市場取向的生產方式。而山地經濟也已經無法脫離和逃避台灣整個經濟生產方式轉變後的衝擊和影響。

山地經濟愈來愈依賴市場和平地經濟，山地內部經濟的本身，已無法自給自足。於是乎，單是提高山地的土地經濟效益，恐怕無法解決山胞的經濟困境。癥結在於山地經濟一旦納入台灣整個資本主義結構的生產方式之後，就會增加其依賴性和不完整性，也必然會受制於後者。」

這項論點：主要出於蕭新煌教授的手筆。

據調查；山地村落的人口流出率，從六十年的三、八八%，提高到六十七年的六、〇三%。平地山胞從五十八年的三、五〇%，提高到七十年的七、六五%，而女性山胞的流出率，比男性增加得快些。

山胞外出是為了謀生，即是為了獲得山地經濟所不能製造的就業機會。而山胞外出後，所從事的行業，依序是製造業、娼妓及個人服務業、漁業、礦業、營造業、拆船業等等。

不論當童工、奴工、雛妓、遠洋漁船船員、礦工、營造工或拆船，都是平地社會中最卑賤的職業，屬於雙重市場中的「次級勞力市場」。工作性質「不穩定，待遇差、不安全、少升遷、沒保障、缺福利」。

出外謀生的山胞，在「次級勞力市場」中掙扎求生，經常遭遇嚴重的社會心理適應問題，例如城中城所見的山地雛妓，就欠缺一般平地妓女常見的職業性格。

然而，有許多山胞外出，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在非常狀態下，被迫或被動從事這些次勞力的工作。例如山地雛妓的大批出現，大部份與販賣人口集團有關，而娼妓業嚴格說來；並不能稱為次勞力工作。因為這一行只是出賣肉體，與勞動無關。

再如遠洋漁船船員，上船出海手續繁雜，事先又須經過經濟部漁訓中心訓練，才能取得船員證和船員手冊，山胞因語言和教育程度的影響，很難主動踏入此行。一般船東常稱僱用的船員是一種「拉伕」行爲。「走！我們到台東捉番仔去！」一語，便是他們的口頭禪。賀兆雄籌組漁船船員工會，便與此有關，而山地船員上船後的遭遇，絕不在山地

★「你看起來不像山地人！」

「你看起來不像山地人！」

什麼是不像山地人的標準尺度？山地人就是山地人，還有什麼像不像的？可是我約略可以知道，一般人對不像山地人的判斷標準是，只要合乎漢人的價值觀，或皮膚較白的，或斯文、溫柔的……等，反正一切較好的就是不像山地人，否則就是山地人，好像把山地人當「垃圾人」一樣。

而最令人遺憾的現象倒是山地人的反應，當平地人說他不像山地人時，他會很高興，如果一眼被看出是山地人時，反而暗自難過。真是奇怪！

雛妓之下。

蓮花的淪落，最能說明山地少女如何被迫為妓，也可以明白顯示強勢文化如何侵略弱勢文化，同時更能說明資本市場行爲的掠奪與剝削本質。

### 黑蓮花的故事

蓮花是台東卑南族的少女，童年在風景秀麗的山區成長，過着快樂悠遊的日子，是大自然鍾靈毓秀的寵兒。

十七歲時，蓮花出落得標緻嫣然，猶如待放花蕾，對前途充滿旖旎幻想。但是，一位西部平地來的外地人，由表姐夫陪同去看她，從此便改變了她的一生。

原來當老師的表姐夫，受平地人的蠱惑，相互串通，欺騙不識字的舅父、舅母，表示要帶蓮花到台東大武去工作，以便賺錢養家，孝順他倆，並給予少許的安家費。

蓮花在不明就理的情況下，依依不捨地告別家園，起初陌生人安排她吃、住，並買漂亮的衣服給她穿，無聊時又供給零用錢，讓她隨意花用。

蓮花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感到驚喜，逐漸產生好感，原先的生疏疑慮，也就淡化了，她開始信任這位「大哥」。

不久，她混混噩噩被賣到高雄市府北地區一家私娼寮，寮裡的保鏢控制她的行動，不准她與家人聯絡，並以暴力強迫她接客。蓮花在昏暗的房間裡送往迎來，淚水儘在肚子裡吞。

家鄉的父母一直蒙在鼓裡，不知女兒已經身陷

### \*金納帶著女友逃走了！

「金納逃跑了，今天派兵到家裡來找他。」

叔魯恩背著一隻小山豬，一跛一跛的從山裡回家的途中遇到大伯父這麼講。他並不訝異，似乎早已知道遲早會如此的。他的這個最小的弟弟，也是跟著他生活最久的家人，可能會有幾年不能回家了。

金納國中沒畢業就被一部遊覽車接走，到中部的第一家護器工廠當學徒，沒多久聽說爲了不願再被侮辱，換了一家鞋廠。金納除了過年一直很少回家，兩年前他祖父過世時還騎了部野狼回來。可是他一直沒有女朋友，酒量却大得驚人。

去年底，部隊調到北部駐防。金納於一個昏暗的日子，在娼寮裡發現了小學的同學阿奈，他們有好長的時間沒碰面了，幾乎不認得，膚色與屬於他們的特徵却叫他們憶起了兒時的玩伴。他們從沒有過愛情，從未擁有過愛人，這是難得的機會，但也只有很少的時間相聚。最後他們走了，金納帶著阿奈一起逃跑。

部隊已經找到山上了，娼寮的保鏢大概也快來找阿奈的父親吧？

火坑。但外表寧靜的山村，其實不再是人間桃源，除了及笄少女成了外人的搶手貨之外，自創世洪荒以來的原始密林，也成爲平地人覬覦的對象。

陌生人又與表姐夫共謀到山區盜林，某次伐木時風聲外洩，被警方逮獲。表姐夫爲逃刑罰，設計去央求蓮花的父親代坐「人頭牢」，條件是他願意照顧他們的家庭生活，保證衣食無缺。

表姐夫得逞以後，偕陌生人逃之夭夭，蓮花家中頓時陷入絕境。父親在牢裡得知真相，捶胸頓足，悲憤莫明，才想起蓮花可能凶多吉少。此時孤立無援的母親，三餐不繼，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遂含恨上吊，自殺身亡。

蓮花有兩個哥哥，大哥被拉伕出洋當遠洋漁船船員，經兩年半後返航，發現家中景物依舊，人事全非，變化如此巨大，又找不到他最疼愛的妹妹，不免悲痛着急。大哥遍尋不着，後來靈機一動，參加電視五燈獎節目，在山胞才藝歌唱項目中，唱出他改編的歌詞，敘述他和蓮花兒時在山間遊戲的情景，家鄉的山和樹，溪流遊魚，共把迷藏捉。

蓮花在接客時，隱約聽到大哥的歌聲呼喚，想要通知電視台，設法告知她的處境，盼望大哥早日救她脫離苦海。

她的異常舉動，引起保鏢的注意，而當大哥摸索找到府北區的妓院來，却在巷口與保鏢們發生衝突，不幸被一刀殺死在異鄉的黑夜，做了惡勢力欺凌下的亡魂。

蓮花的等待，一天一天過去了，終於落了空。

正在服役的二哥「阿能」，休假回家探父監，得知家庭已遭一連串的慘變，如遭雷殛，利時之間

難以承受這些殘酷的事實，他決心逾期不歸，要踏遍茫茫人海去尋找妹妹。

沒過幾天，他被部隊緝捕歸營。在營中，他向輔導長哭述悲慘的家境，贏得出身於大陸少數民族的長官之同情，只判他關禁閉一週，隨後又幫助他會同軍警力量，救出蓮花。

蓮花看到二哥，才知道母親亡故，大哥被殺，父親坐牢，不禁悲從中來，兩人相抱痛哭，是如隔世，蓮花哽咽着說：

「爲什麼我們是山裡人！」

這時的蓮花，未滿二十歲，却已歷盡滄桑，像煞三十歲的婦人。幾年來，每天接客十餘人，日夜遭受蹂躪，一度罹患性病，陰道糜爛，子宮變形，在她被依政府規定，送往斗南婦女習藝教養所之前，阿能向朋友借錢送妹妹進醫院，作子宮切除手術。

進入習藝所，並不意味蓮花已得到新生。前途的惡化，並不是幾項單純的手工藝技術，可以應付得了。

二年後習藝所結業，昔日的保鏢成群結隊而來，打算搶人。阿能事先得知情報，便與中北部的文化界友人商量，以防止保鏢得逞。

服務於新聞界的友人，首先打電話警告有關與保鏢勾結的人士，如把蓮花交給外人，將在報上抖出內幕，讓他丟職。

第二天，保鏢群遠從台東押着甫出獄的蓮花之父，企圖令他依監護人名義，領出蓮花，然後再加以擺佈。

阿能與友人棋高一着，早先已回台東老家偷走



父親身份證和圖章，而按規定，領人時認證不認人，使歹徒徒費心思，蓮花由阿能接走。

歹徒並不就此作罷，隨即展開一場幾近迫殺的飛車大賽，蓮花等人被逼躲進一家百貨公司，雙方在重重的玻璃櫥窗之間捉迷藏，蓮花在躲避之際與同伴失散，她藉着人潮藏匿身形，無意間却發現櫥窗內的飾品衣物，雖是小東西，價格竟然貴得讓她不敢想像，如一條項鍊數萬元，一件衣服數千元。這種價格若拿來和她接客時，每次二、三百元相比，簡直判若天壤，何況她接客所得不能全拿。她在緊張之餘，仍不免自卑地想到這一輩子大概沒機會購買這些東西了。

後來她被迫到十餘層的陽台，眼看走頭無路，便回過頭來，面對群匪，喝令他們不准再接近，否則就跳樓自殺。歹徒無奈，只好僵持不下。

啊！依稀是故鄉的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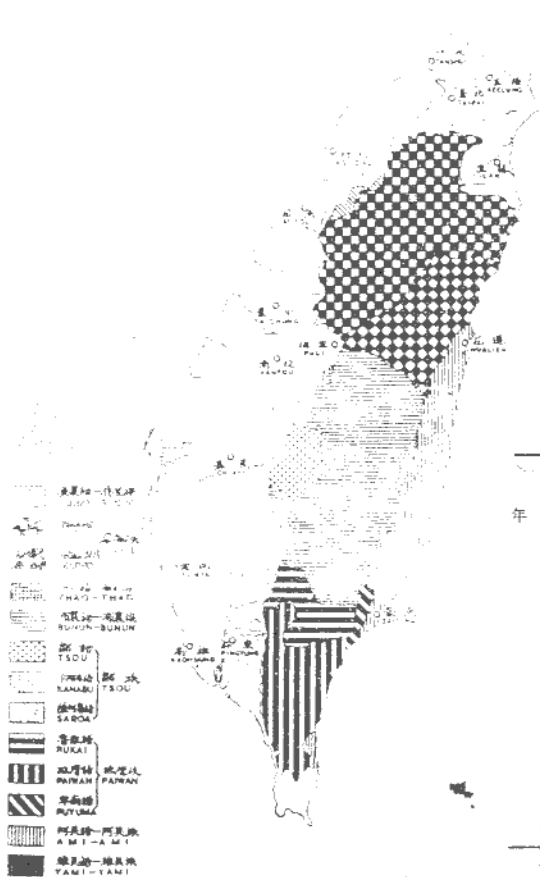
這時阿能領着警察趕到，化解危機，但蓮花驚魂未定，心智俱失，只有阿能可以接近她，而當她認清眼前之人真的是二哥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望着天上悠悠白雲，依稀是幼時家鄉的雲彩，她不斷地搖着二哥的身體，迷茫地問着：

「爲什麼我們是山地人！」

蓮花只是數以萬計的山地難妓之一，蓮花的故事只是數以萬計的同類故事之一。然而，難妓問題也不過是難以數計的山地問題之一。

黃春明以這個故事當題材，拍攝影片「我的名字叫蓮花」，用意不難了解。今天存在我們的周圍，竟然還有這種泯滅人性的事實發生，而且不斷上演。從賀兆雄籌組漁船船員工會，到陳榮發的「妓院浮生」，再到黃春明的「我的名字叫蓮花」，應該足以使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深切反省，有所覺悟。

臺灣土著民族分佈圖



高山族各人口比例 (民國65年底)

族別	人口	比例
泰雅	64,080	22.69%
賽夏	3,200	1.13
布農	31,229	11.06
鄒	4,496	1.59
魯凱	6,220	2.20
排灣	55,628	19.70
卑南	6,800	2.40
阿美	108,122	38.28
雅美	2,547	0.90
合計	282,322	100.0

(資料依據臺灣省民政廳提供之數字算出)

\* 邵族人因爲目前人數太少故以下各表均不列入作比較

15歲以上就業人口的行業分佈 %

年次	臺灣省		山地山胞		平地山胞	
	初級行業人口比 %	其他 %	初級行業人口比 %	其他 %	初級行業人口比 %	其他 %
民國42年	61.3	33.7	95.93	4.11	—	—
民國56年	53.61	45.39	92.15	3.95	—	—
民國58年	49.63	50.37	—	—	62.53	37.47
民國61年	44.10	55.90	73.82	21.18	—	—
民國63年	41.03	53.92	—	—	62.45	37.55
民國67年	35.54	64.46	75.45	24.55	57.16	42.84

資料來源：臺灣省民政廳，臺灣省山胞經濟調查報告，民國69年，頁14-15

# 海外知識分子的方向

王曉波

## ■「和尚」結婚了

此次赴美訪問，路經東京，就有朋友告訴我，「和尚」要結婚了。六月二十五日，我到了柏克萊，問到了「和尚」的電話，證實他確實要結婚的事，並向他道賀，在他堅持邀請下，七月一日晚搭機到底特律，參加了他露營的結婚儀式，及七月七日在芝加哥的結婚酒會。

「和尚」乃是林孝信的綽號。與「和尚」相識，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都是台大學生，他是物理系的，我是哲學系的，他高我二班。一九六三年，台大學生曾有過一個「自覺運動」，我是那年秋天進台大的。「自覺運動」在台大有個刊物叫「新希望」，進台大後，我很快就投入了「新希望」的編輯工作，而常常到男生第六宿舍二〇三室，找鄧維楨討論編輯事務，孝信也住在那個寢室。

「新希望」被迫解散之後，他糾合了一些念理工的同學和「新生報」合作，在報紙上開闢了「科學週刊」一欄，介紹一些科學新知給中學生讀。當時孝信給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刻苦勤學、任勞任怨、苦幹實幹，「和尚」的綽號，不僅指他剃的那個大光頭，也有苦行僧的意思。

後來，他出國念書了，竟用雲遊四海沿門托鉢的方式跑遍美國各大學校園，勸說中國留學生，而創刊了「科學月刊」。不久，留學生的「保釣運動」起來了，我在台灣聽說孝信就是「罪魁禍首」，接着又聽說孝信變成了「共匪」或「台獨」。

八〇年，我到美國，看到一些「台獨」的刊物在罵他是「併吞派」，也聽見一些傳言說他有「台獨的尾巴」，甚至，還聽說在某一場合被「台獨

毆辱。而他本人則爲了「保釣」放棄了學業，護照也被註銷，綠卡又沒拿到，又拒絕申請政治庇護，而變成了一個有家歸不得的「黑人黑戶」。那時，他已在美國糾合一些朋友，成立了「台灣民主支援會」發行「民主台灣」刊物，反對台灣當局對「高雄事件」的處理。

無論孝信被左、右、獨三派如何的誹謗，並且他又從不作任何解釋，但認識孝信的朋友對其刻苦崇高的品格無不敬佩。有些朋友對其不肯變通的「擇善固執」的作風，最多不過有「林石頭」的埋怨而已。

## ■統獨問題不能迴避

七月二日，我到底特律的營區，參加露營的人有上百人之多。有些是我認識的，有些是不認識的，有些是經過「保釣運動」的，有些還剛從台灣出來在念書的。他們的露營除了遊樂活動外，還安排了一些有關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一些討論會，我也參加了一些討論會，並發了言。但因屬於臨時性質的講話，事先沒有準備，不免顯得拉雜和凌亂。所以，我願以文字的形式再做一次表達及補充，以就教於支援會的諸君。

我個人覺得支援會或孝信，之所以受到許多誤會，主要是對許多來自各方的誹謗不作解釋，而只在海峽兩岸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民主上下功夫。當然，我也知道，支援會的朋友怕一旦公開主張統一，就被中共利用；公開標榜反對中共，又會被國民黨或台獨利用；而台獨的一些荒謬的理論，也不是支援會的朋友所能接受的。甚至有些朋友自認爲，以

往喊過「統一」被中共利用了，至今一碰到「統一」就有道德上的「罪惡感」。

但是，任何關心台灣前途的人，總不能不涉及統獨的問題，即使是為民主而奮鬥，也不能不涉及究竟是為統一的民主而奮鬥或為獨立的民主而奮鬥的問題。迴避統獨問題，只講民主，就不免給人有不清楚的感覺。

當然，在目前國共鬭爭的中國現實政治下，談統一問題是有其現實政治上的困難性，不歸於揚必歸於墨似的。但是，中國統一的要求並不僅是國共二黨的主張，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自歷史的、文化的情感和現實的要求。國共二黨的統一主張，毋寧說是看到了這一項人民的要求，而以此作為他們政治號召的一項運動，這也許還比較符合彼等政治的實在。

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那麼海外的民主運動，就應該超越國共二黨的侷限，為沒有充分表達自由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表達他們中國統一的願望。站在民主的立場，中國的統一不是統一於某個黨派，而應該是統一於全民。如何統一於全民，法國大革命時有「國民會議」；孫中山當年也提過「國民會議」。

再者，民主也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法國大革命的混亂不必說了，英國初期的民主也沒那麼理想。傑佛遜在美國獨立後，還在神壇前起過誓，要和一切的暴政奮鬥，也不該是無的放矢的。直到今天，還有人說，美國只是「少數人的民主」。即使是以「國民會議」統一後的中國，我們可預見的，也是需要有一個過程，民主才能上軌道。

#### ■ 反對專制的統一

或者有人說，台灣人民是不希望中國統一的，從目前現實政治來說，這句話有它的道理，因為不在民主的方式下統一中國，只有三種可能，一是把「四持堅持」搬到台灣；二是把「戒嚴法」搬到大陸；三是名義上統一，實質上，各堅各的持，各戒各的嚴。對台灣人民沒好處，對大陸人民也沒好處。

但是，超越黨派的全民民主的統一，就一定會是因為統一而遭到台灣人民的反對嗎？我看那就不見得了。

在以往的中國人所稱的「太平」就是統一，不打內戰了。今天我們當然不會為了「太平」連專制皇帝都接受。但是，統一了之後，台灣的軍費就可以不必負擔那麼多。每次黨外人士在選舉的時候，都在呼籲裁減國防預算，能減輕台灣人民的國防負擔，難道台灣人民也反對？在不能統一的情況下，即使台獨成功，就能裁減國防預算嗎？

如果，中國能由民主統一後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台灣的商品可以流通於大陸市場，資源可以由大陸取得，難道台灣的商人會反對嗎？這幾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外銷不好，追根究底，市場發生問題，全世界的商人都注目於大陸市場，而唯台灣商人無視於此？若果真如此，又為什麼有偷偷摸摸的「三角貿易」。記得幾年前，台灣資本界的代言人高希均就在「國建會」上提出與大陸通商的呼籲。黨外人士費希平、黃信介、康寧祥也為通商提出過聯名質詢。最近，立委余陳月瑛又提出開放大陸探親的質詢。難道這些都不是台灣人民的聲音或願望？

現在台灣開放了觀光，為了避免台灣人到大陸去玩，而不發香港的觀光護照，但還是有人迂迴的跑到大陸去看看，難道台灣人民只喜歡到日本、美國觀光，而不喜歡去看看滿街都講「台灣話」的廈門嗎？不願意去看看自己先人墓碑上的潁川、泗水、隴西……嗎？我看那也不見得罷。

再者，日本電視記者拍的「絲綢之旅」引起台灣人民收視的狂熱，出版畫冊又造成空前暢銷，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後期，台大曾經有人做過一個對大專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贊成中國統一的。

所以，我認為，台灣人民在現實政治上反對中國統一，其實是反對中共極權的統一，而不是反對統一的本身。

#### ■ 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人生不能不有理想，政治也應有其崇高的理想，才能提昇其文明的道德，柏拉圖講「至善」，中國人也講「止於至善」，天下沒有「至善」，「止於至善」只能是無限的不斷的道德提昇，否則，所謂的政治活動也只能是現實權勢支配下的螞蟻運動而已。

另外一面，人生也不能不面對現實，失去了政治現實的政治活動，也只能是政治空想家而已。以現實面而言，今日國家組織尚存的一天，總是有一定的強制力的。這種強制力，包括國內的，也包括國際的，有國家組織的鎮壓，也有人民不滿的反抗。這種強制力的形成與集結也是有其原因的。

主張台獨的一些人說，台灣並非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這句話並沒有現實政治的意義，因為北美也並非自古就是美國的領土，中國自「古」的領土也很小。

從歷史來說，台灣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實際上是由政治的強制力決定的。如果當時山地人有力量可以驅逐漢族移民的話，台灣就決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土。如果鄭成功不能驅逐荷蘭人的話，台灣也決不能成為中國的領土。如果第二次大戰，日本不是戰敗的話，現在台灣也不能成為中國領土。如果不是國府有武裝力量遷台及美軍進駐台灣海峽的話，今天也沒有台灣海峽兩岸的對峙。

雖然，國際上鬧了二、三十年的「台灣國際地位未定」，但是，現在世界各國都不能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也是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有那一個中國政府可以放棄台灣的主權，即使今天中共政權垮台，明天的中國新政權也不可能放棄台灣主權要求的。

那麼在現實政治上，台獨的可能性只有二種途徑，一是以帝國主義的力量打敗中國，再訂一個「馬關條約」，但是，這在現實上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台灣人民又會對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抱着什麼態度呢？五十年的台胞抗日史應該殷鑒不遠罷。或者說，那是台灣人民的「落後性」，還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封建思想」，但這種「落後性」，「進步的」台獨諸君又將如何克服之？

第二是結集台灣人民的力量對抗中國，迫使中國承認台灣獨立，又因為國府不承認台獨，所以，要先推翻國府。

又要推翻國府，又要對抗中國，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尤其是未來大陸的政局若獲得改善，或在中共結束後出現新的政局，台灣人民基於「落後性」的「大漢沙文主義」又有多少台灣人民願意追隨台獨諸君呢？

所以，我覺得，在現實上，台獨的可能性太小

太小了，既不符合國際政治的客觀形勢，也不符合長期的台灣人民的主觀願望。

#### 論主張與批評台獨的自由

或者說，台獨還存一個可能性，那就是「民族自決」，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為國際間所承認的殖民地獨立的方式。但「民族自決」必先有民族才行，於是首先有廖文毅的「台灣民族論」的提出，認為台灣人經外來統治而形成了與中國不同的「混合血種」，這種血統論僅能暴露廖文毅的無知而已，後來他也自己承認錯誤而回台定居了。

取代血統論的，現在有經濟論和文化論。經濟論，說穿了，和費正清的「海洋中國」並無基本的不同，只是把「海洋中國」縮小到台灣一地而已。所謂文化論，不過是吹捧一下日據時代的「三腳仔文學」，說台灣已形成了漢文化與日本文化結合的新文化，這個結合中也拉了什麼荷蘭、西班牙、山地族來陪。

「台灣民族論」在理論上實不值一駁，但在感性上却在群眾裡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他們有台灣人的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裝飾成一個「民族」的「偽形」。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擴大就是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的傾向又是民族統一的阻力。這個問題在法國大革命後也曾發生，並且討論過的。其之所以成為民族統一的阻力，乃是因為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產生於農業社會和封建狀況下的。

「偽形」的「台灣民族論」除了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外，還有一些具體的歷史、政治、心理的因素促成其產生。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加上三十五年的國共分裂，在近幾十年間，台灣有八十五年與大陸形成隔絕狀況。光復後的台灣，政治未能充分民主，尤其「二·二八事變」後，台胞對光復的熱烈期望頓時跌入冰凍的深淵，轉而對祖國的失望。中央政府的遷台，全國只剩全省，雖然有省政府的存在，其實全省的權力却掌握在由外省人佔絕大多數的中央政府手中，而成為台獨所攻訐的「殖民統治」。台灣的政治未有充分的民主是事實，但「殖民統治」却和「台灣民族論」一樣是「偽形」的。

我認為，把台灣獨立論建立在台灣民族論，這是一種不聰明的提法。因為「偽形」的台灣民族論

是經不起批判的，台獨其實應將其獨立論建立在國家論上，國家論是屬於政治學的範疇，而民族論則必須涉及血統、文化和歷史。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言，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是，一個民族也可以建立一個以上的國家，這種例子也很多。當然，這又涉及了台灣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問題了。

雖然，我個人並不贊成台獨，但是，在一個民族國家內，人民有權做各種的政治主張，也有對這種政治主張批評的自由權利。主張與批評都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 ■生於中國人是無法選擇的

在海外我也看到一些朋友研究社會主義，並且，以此批評因民族感情而對國共二黨或「偽形」的「台灣民族論」認同的海外華人。

作為一種學說或政治主張，社會主義也是應該受到尊重的，迴避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反共家，也只能是另一種形式的駝鳥而已。

中國是否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或實行那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這應該是一個嚴肅而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是，民族感情卻是一種自然的流露，不能因其現在受到政治黨派的利用而予以排斥或抹煞的，而是只能因勢利導。

人可以有選擇或變更國籍的權利，但卻沒有選擇或變更族別的權利，因為上帝並沒有賦予人在出生前選擇族別的自由。最多只能埋怨自己「投錯了胎」，在「投錯了胎」之後，又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形下，接受了該民族的文化，成為該民族歷史之鏈上的一個環扣。這完全是一種「先驗的」和無可奈何的。

因為有這些「先驗的」存在，所以，作為一個中國人，就免不了有自然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的流露。任何中國政治的黨派在海外號召華人，如果不首先掌握這點華人的民族感情，恐怕就很難獲得海外華人的擁護和支持。

有些朋友或自覺於社會主義的國際性，而對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分軒輊的支持和關切，但是，絕大多數關切民主運動的海外華人，相較起來，還是最關切中國（含台灣）的民主運動罷。

就民主而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一點海外朋友已應有共識。另外，或謂民族主義是

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然沒有發達的或壟斷的資本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的可能。這也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常識，雖然，二十世紀的蘇聯和中共的革命，認為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故使得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而是資本主義太少的劉少奇受到殘酷的鬭爭，但也造成了大陸上文革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不可不謂之慘痛。

我絕無意為資本主義辨護，並且，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弊端百出，尤其是由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帝國主義為禍全世界，中國亦有切膚之痛，第三世界的人民至今猶在其剝削下的貧窮落後中掙扎。但是，有了大陸這三十年的慘痛教訓，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實行社會主義，這些問題也必須嚴肅反省，重新的認真討論。

即使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但沒有民族主義的完成是否可以有真實的國際主義的產生，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個人是懷疑的。

#### ■民族的民主運動

以現實的國際政治來講，蘇聯對中共的「社會主義兄弟友誼」如何了，「蘇聯老大哥」不可靠，難道「美國朋友」就可靠嗎？中國人的奮鬥還不是要靠中國人自己。站在中國的立場，不論實行什麼主義，「濟弱扶傾」也是傳統中國國際政治的理想，但是，中國自己都站不起來，又如何幫助別國？當然，我們還是可以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共同奮鬥。

如何團結海內外的中國人為中國奮鬥，如何激發海內外的中國人為中國而奮鬥。這應該還是民族主義的範疇。並且，在人類還停留在國與國之間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階段，做為一個中國人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今天只不過是在民族主義的範疇內，我們認識到民主是中國奮鬥的重要必須目標之一。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的民主而奮鬥。並且，在歷史的實踐上，民主運動與民族主義也是並行的，並且，民主運動的實現也才是民族主義的完成。

所以，我認為，近代中國民族的民主運動，應擔負三項任務，一是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二是結束專制統治，建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府；三是統合各地地方主義，完成中國的統一。

參加了孝信的結婚露營，受到支援會許多朋友的啟發，而草成此文，但因身處旅次，資料不全，思慮不周，待返台後，必將各位朋友給我的啟發認

真研究。唯願以此文作為孝信兄嫂的新婚「賀禮」，並請海外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指正。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於柏克萊

陸大來

# 民主意識 與文化意識

林中平

“民主台灣”編者提供我王曉波先生「海外知識份子的方向」一文，做為一個島外的知識份子，我有一點點感想，寫在這裡和大家討論。

王君開始提到林孝信先生多年來在海外受到許多非謗與誤會的原因，隱約地提到林君以及支援會單單只在民主問題上下功夫，但卻對統獨問題避而不談，說這是一個主要被大家誤解的理由云云。究竟支援會過去的問題是不是真的如此，我沒有資格猜測，但是，我不贊成王君對統獨問題與民主問題這樣子合起來的提法。

民主，若是落實到社會制度與結構上而言，究竟該是甚麼，我這邊不討論。但就其觀念而言，我想大家多少都知道一點。不過我想強調一點：民主就是民主，它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和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現象彼此是獨立的，絕對沒有甚麼“特殊的”東方式民主、韓國式民主、台獨式的民主、或統一式的民主。

所以，就「支援台灣民主」這個概念而言，也是支援、促進台灣各種有志於民主的運動，而不是只支援台灣社會中“某些”團體的民主運動，或是其文化運動。我不懂，為甚麼為台灣民主而奮鬥一定要涉及統獨問題，不涉及的話就是“不清楚”。難道台灣的許多社會運動，如消費者，環境與生態

、工人(?)、鄉土文學、草根等等運動都必須要涉及統獨問題才算清楚嗎？退一步說，即使這些運動都很清楚地劃清這種立場，恐怕只有對這些運動的發展更不利吧？當然，王君也對他的論點提出了一些論證，容後討論。

## 政治實體與文化意識

統獨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和那個政治實體中人民的文化意識是兩回事。西方許多國家的文化根源往往源於歐洲，甚至希臘、希伯來、或天主教的傳統。所以，美洲、還有其他洲上的人民都很認同、也想追溯他們的文化源流。教宗的天主教傳統、基督教、猶太教、非洲傳統、印地安傳統等等都在世界各地有許多熱情的追隨者，就連英國王子的婚禮、王妃的一點一滴在世界上也引起許多對過去“殖民”情調的懷念。但是，大家也都清楚，這些文化現象和統獨問題不相干。

所以，王君的一些論點，如：台灣商人想對大陸做生意（世界那一國的商人不願意？），探親，掃墓，觀光，畫冊狂熱等等都不成立。台灣許多人當然反對現在的中共政權，可是，即使現在中國不是共產政權，統獨問題大概也沒有這麼簡單好解決。

關於台獨可能性的“泥巴戰”(楊遠語)

王君也觸及了一點在島內外打了幾十年的泥巴戰的內容。我並不是讀成島外台獨的一些論證，只是覺得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非如王君所言“不值一駁”而已。相反地，王君的論證中漏洞也十分多，讓我現在來挑一挑。(我的用意在於：泥巴戰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泥巴戰永遠也不會因對方的泥巴而停止，島內的一些“批獨健將”的文章也許可以盼顧自難，但其實是沾老K的光不少之緣故)

王君首先想“提醒”大家統獨問題血淋淋的政治現實。勸大家不要只空談理想(?)。但是，台灣幾百年來血淋淋的政治現實其實正是許多台獨人士的精神刺激來源。奴隸因為血而使他有理想的提昇，社會主義者也因為資本主義的惡而使他們想走向新的世界。台獨常常問這個問題：為甚麼幾百年來台灣的地位常常是決定於中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的政治意志？這個問題事實上是反問王君的。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難道就必須忍痛地屈服於一些政治的、國際的、經濟的“現實”嗎？難道就不可能創造一些比較“屬於人”的新現實嗎？

再回到現實上來，台灣如果不做美國的不沉艦、不做蘇聯的衛星國，和中國成立友好的關係(我還不曉得有任何台獨派想向中國挑戰的)，對諸強權保持中立，立身於第三世界不結盟的立場，那麼，這樣的台灣，中國不取之又有何損？這樣的台灣，中國非得動干戈而取之又有何益？一個大家庭，因為自己的破敗而不得不賣子之後，僅僅是因為家族中的某些人對失散的兒子的懷念就想動兵戈而強迫其離散子“回家”，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些“骨肉同胞”論令人深深齒冷的。無論這個大家族如何地向那離散子“解釋”、“1840年來如何如何”，這個大家族都該絕對尊重那離散子自身的意願。一位苦難的母親，如果真正地愛那個離散子，應該盡量幫助他，成全他、尊重他，希望他無論流落何方都是幸福的，而不是強迫他“回家”。離散子真地自願回家固然可喜，若不願回家也只有祝福而不論其他。

王君對台獨只提供兩條路，一個是「再訂一個馬關條約」，另一個是「又要推翻國府，又要對抗中國」！也許有些台獨真想再訂條約，但是，遊戲

規則不只有這兩條路，還有一些其他的路吧。反過來說，王君所提超越政治上的統獨的政治解決法又是甚麼呢？它有現實性嗎？王君提出來的是島內中華雜誌提了多年的“國民會議”。我們知道，法國是要在“大革命”開始進行後才有可能談國民會議的，孫逸仙當年的國民會議提法是失敗的，兩島內中華提了多年國民會議也不見到有甚麼效果，方法，更不要說進展了。國民會議，在沒有大革命時，純粹就像柏拉圖的至善一樣，是在洞窟中的國民捉摸不到的。真正有可能時是國民真正站起來，把一切代表洞窟的惡權力打倒後才提得出來。所以，國民會議，如果放在中國與台灣的政治現實上看，說不定要比台獨的一些路子更艱難吧？如果不把「戒嚴法統一中國」或「四個堅持統一中國」等口號背後的勢力打倒，掀起一個中國大革命，國民會議如何可能？所以，引一句王君的話來問王君：「又要推翻國府，又要對抗中國，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 國民族的民主運動？

王君最後一個論證，是要求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並行，又說「民主運動的實現也才是民族主義的完成」(?) (如果真是這樣，談民主又何必涉及統獨？民主若是爭到了，民族問題不是也自然解決了嗎？)。王君對這個“並行論”似乎沒有提出甚麼理由來。我們知道，美國資本主義民主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礎上，難道美國的這些民族都已完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嗎？猶太、或日耳曼等民族的“完成”倒反而造成其他民族莫大的損害。今天歐洲許多比較民主的國家不少是多民族的國家，不曉得那些民族是否也都已完成了？如果一個民族分別在好幾個國家裡面都享有民主，那個民族是不是已經完成了呢？如果是，那麼如果海峽兩岸的人民各國都爭到民主，“中華民族”不就是完成了嗎？為何在台灣爭民主時一定要分統一的民主還是分離主義式的民主呢？反過來說，現在世界上也有許多民族，他們在某些國家中較有民主，在另一些國家中則沒甚麼民主，如中華人，黑人，猶太人，愛爾蘭人等等。這種情形不是也很多嗎？當初黑人在美國爭民主時為甚麼一定要提「黑人民族主義」且一定要解放整個非洲不可呢？社會運動如果要建立在這麼

遙遠而理想的目標上，大概真地很難進展吧？今天美國的黑人都非常同情非洲的情形，也想幫助非洲的困境，但是也不太聽說過美國的黑人要成為非洲民族的公民，黑人族才真正有救吧？事實上，一些第三世界的學者指出，第三世界目前的惡劣情況、非常低度的團結、易被分化等等現象，第三世界的許多狹隘的民族主義要負一部份的責任。

總之，王君的並行論我無法理解，也不能讚成。

### 現實的中華意識

以前有位友人感傷的說：「台灣獨立，李白就變成外國人了。」，後來，我想起來，這基本上是把政治問題與文化意識混淆不清的結果。傳統上來說，「中國人」這個概念也常常在政治上、文化上二者混雜不分。中國以前動不動就談「天下」，所以不需要分清楚。現在情況不同了，也許稱「中華人」比較好一點。

如果我們能夠仔細地區分政治與文化使用在民族問題上的不同，也許一些老問題能有較好的解決。在台灣，有許多人具有濃厚的中華文化意識，他們非常關心中華民族的種種情況，但是，這毫不代表說就應該和中國行政上的統一（無論短期或長期內）。台灣即使獨立後，如果真正能有民主，就該允許有濃厚中華意識的人為關心、促進中華民族的興盛而努力。他們甚至可以鼓吹統一，只要台灣人民大部份能讚成就可考慮——所以，民主問題事實上反而是超越統獨這種政治問題。在老K專政下，發發問卷問人是否贊成統獨又有甚麼意思呢？

就理想上而言，我覺得有濃厚希望「台灣人民出頭天」或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人理想都同樣高，就台灣與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台灣島內的這些有心人士們中，大概只有較具台灣意識的人比較有行動的機會吧。許多有濃厚中華意識的人，言必稱「十億人」的人，他們究竟對中國能夠做些甚麼事呢？刊登一些他們的文章、小說，公開抗議一下中共的惡行、提醒在台灣的人他們是“炎黃子孫”，狠批台獨或分離主義等等。但是，這些事對在四個堅持下的中國人民的身家幸福又有甚麼用處呢？在中共的“堅持”之下，島內一些想對中國有些影響的作法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中國的民主希

望也許該是在中國國內，該是寄託在無數像王希哲、魏京生、王希翎這樣可愛的中華人民的意志上吧！

「十億人」中當然也包括台灣近兩千萬的人。為甚麼不在比較可觸及的範圍之下，和許多更具有台灣意識的人共同比較現實地為兩千萬人謀福利呢？畢竟，對中華意識的朋友們而言，這兩千萬人也是他們最最接近的中華民族的同胞呀！當年台灣割讓，梁啟超和戴天仇在台灣朋友要求中國援助的情形中，都告訴台灣朋友中國現在無力援台，勸告他們向日本友人求助。今天，老K在台灣坐得穩穩的，黨外問題、瓶頸等等一大堆，如何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更民主、更屬於人的社會的問題重重。連島內最迫切的民主問題都解決不了，有時我真懷疑我們還有能力、有效果地來汲汲地關心中國問題。有許多人以關心「十億人」的整體為首要目標，這當然也很好，只是希望他們不要痛批一些專門想、或至少首先想關心「兩千萬人」的人。當然，有許多只關心兩千萬人的人也痛批關心「十億人」的人，他們天真地認為只要這場泥巴戰能夠打贏，台灣人就可出頭天。年來島內外關於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論戰可能一開始就把問題談偏了。意識問題雖然不是決定許多歷史現象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個深切的問題，可是這種泥巴戰只能使問題更糟。還是回歸到民主問題上來吧。

### 總結語

王曉波先生在台灣對於爭取民主有不少貢獻，我非常佩服。但是，就像對另一位島內我所佩服的小說家一樣，他們在處理中華意識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夠同意。所以，在複雜的心情下，我一吐為快寫下這一篇非常批判性的短文。希望不會被認為是一惡意攻擊的叫喊。該說的總是要說的。

最後，我想引揚遠老先生寫給夏潮雜誌的短信中幾句話結束本文：「……我們有這種心態來對待爭論與論戰，就應先了解對方的心結，幫對方解決其心結。如這樣還不能奏效，這樣的爭論與論戰將成為離題的泥巴戰，可以不理，自己以實踐來證明、解決問題了。……以上是我的經驗談。也因此我才能避開了多次泥巴戰的困擾，而專心做一些自主的工作。」（此信刊登於夏潮論壇革新版，第六期）



# 談六十年代的 國際學生運動

波托模作·夏雨譯

一九六〇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從美國到蘇聯，從東京到雅加達，從巴黎到北京，都有學生在罷課、示威、出版手抄刊物，等等。波瀾寬濶的學生運動不僅爭取學生主權、批評校政、檢討教育的方向，還喚醒學生們對社會的關心，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一股新興力量。這股學生運動的影響既廣且深。在廿世紀中葉各國政權對社會的控制空前龐大之際，居然還能發生這麼鉅大的不按社會“常態”發展的社會運動，引起了學者、思想家與政客們共同的注視。

七十年代初期的海外保釣運動正是在這股國際性的學生浪潮的背景下開展的。保釣運動影響傳回台灣，導致台灣的學生們開始關心社會，「向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七十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各種學生社會服務工作，乃至新生代黨外運動，多少都受到保釣運動，亦即世界性學生運動的影響。

學生運動雖有行動過火之處；但整體而言，它對社會的進步作用遠超過短期“騷動”所引起的負面作用，尤其當一個社會愈形制式化，被掌權者、大財閥，各種媒體以及市場機制牢牢地套住，當人們在這個社會只知（或只能）按部就班地讀書、賺錢，往上爬之時，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充滿批判力與行動力的學生運動，往往能夠使制式化的社會出現新的創意與活力。一個真心關懷社會，高瞻遠矚地期望社會進步的人，是不能，更不應忽視學生運動所能產生的積極作用。

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進入一個重新檢討方向的瓶頸時期。台灣的局勢更是處在一個風雨前的寧靜時期。這都有賴更多有心的年輕人積極熱情地來共同關心，努力。學生運動正是使年輕人大量地覺醒與投入社會改造運動的一個有力方法。了解學生運動發生的因素，性質與可能的作用，將有助於上述目標的達成。我們在前幾期介紹了台灣的學生運動。這裡，我們開始介紹世界性的學生運動。

本文譯自T. B. Bottomore: "Reflections on Student Movement"，原文刊於Universities Quarterly，22(4)1968，收入作者1976年的書：“Sociology As Social Criticism”作者係國際知名的社會學家，曾任國際社會學會副會長，重要著作有：“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Critics of Society”

，“Sociology : A Guide to Problems and Literature”等。

—— 編者識

學生運動在六十年代末期形成一個國際性的現象，並逐漸受到重視，認為它是政治行動的一種新形式。它在許多國家導致與過去截然的分野，因為美國原本缺乏活躍的學生政治參與的有力傳統；而在有些歐洲國家，學生運動雖與更廣泛激進運動（Radical Movement）十分密切，但大致是附屬於激進運動的目標與信念之下而已。現階段的學生運動却有二個最突出的特色：(1)它宣稱自己是獨立性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不但有它自己的理念與用語，它與其他激進運動的關係也有了重大的爭論。(2)學生運動特別關切大學本身的結構與運作。這些特色讓一些觀察家使用在成長中的「學生意識」這個字眼，而認為在許多方面上類似於十九世紀工人「階級意識」的出現。法國社會學家亞蘭·杜練（Alain Touraine）曾對學生與工人之間的相似性有細膩的刻劃。一來，他認為今日許多法國的大學（如有名的南泰爾學院），因歷經相當大的社會隔離，使學生成為特殊的集體，正如同早期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工人所歷經的一般。再者，對比了現在學生運動的信念與早期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觀點，杜練更進一步認為科技發達國家中的大學生已是主要「生產力」之一，故由準馬克思主義者（Quasi-Maxist）的觀點看來，學生可說是繼承了無產階級的社會角色。（註一）

類似的觀點也被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大部份跟隨米爾士（C. Wright Mills）的看法——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申論。馬庫色認為產業勞動工人，尤其是在富裕消費社會的美國，已喪失了意願和能力去發動社會的激烈變革，而這角色已落在主要由大學生所構成的年輕知識份子身上。不過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進一步調整了這個觀點（註二）。他認為現階段的學生運動並不已經就是一個革命性的力量，但是作為美國社會的一份子，若是與其他被壓迫的各團體聯合——特別是黑人團體——是很可能成為一股革命性的力量。

上述主要是美國人的經驗，以及美國思想家對這經驗的闡釋來符合學生政治角色的新概念。歐洲的學生運動却是由「新左派」中發展出來的，亦即源自傳統激進主義的復甦。「新左派」形成於19

56年，是因為對英法聯合進攻蘇彝士運河的反對，波蘭與匈牙利工人的抗暴，以及知識份子對史大林式社會的不滿。此外，歐洲學生運動一直與奠基已久的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保持着有力的連結。但是在美國，學生反而是構成「新左派」的主要力量，像民權運動，為古巴革命的辯護，及反越戰等等，當然學生們的智性上及政治上的自信，很大一部份可能要歸功於在最黑暗的麥卡錫主義時代由老一輩的思想家所獻身而產生於美國社會的激進批判主義（Radical criticism）。但是歐、美學生運動之不同理由是很明顯的：美國自一次大戰以來就沒有政治性的勞工運動，也沒有基礎廣闊的激進政黨可作為新激進主義的泉源，雖然長時期來是有不少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日漸感到不安，在如此情況下，大學學生因此擔負起特殊的角色來表達這股不安，進而成為反對派，他們便一直是激進運動中最主要的成份，即使後來激進（Militant）的黑人運動（Negro movement）興起，他們仍然一直是激進理念的鼓吹者，群眾示威的領導者，乃至支持參議員尤金·麥卡錫（Senator Eugene McCarthy）為反對黨的總統競選人來影響全國性的政治（註三）。

因此，美國學生運動之所以產生了國際性的影響力，主要是由於它在本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具有重要性，另外也是因為它最早介入一個重要的學校之內的衝突，就是1964年加大柏克萊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但是假若不是其他工業化國家中的學生處境也有一些相同的因素存在，那也引不起影響的，一方面是那時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情境：(1)越戰的國際性反應。(2)種族衝突。這在美國特別尖銳，但也存在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中，而由全球性的視野來看，也存在於富裕的白種人與貧窮的有色人種之間。(3)各國在政治上對激進的反對意見一致性的壓制。另一方面，各國大學本身也有其相似性：(1)學生人數急遽地增加。(2)大學規模的擴大。(3)更激進而不服從的年輕一代出現。(4)專制式或家長式的大學管理作風依然存在於許多國家之中。

不能繼承勞工運動角色

不過，即使學生運動在美國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義，即使各工業化國家社會條件相近，從而更加強了學生運動的重要性，這仍然遠遠不能得出結論，認為國際性的學生運動將能繼承勞工運動的角色。因為不論是早期或是現在，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之間是有甚大差別的。第一，學生不是被壓迫和剝削的團體，在某些國家及一些大學之中，可能有對學校設備、經濟狀況或對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強烈的不滿，但是以學生和學校外的社會來看他們却形成一個特權團體。他們主要來自社會上中、上階層的家庭，畢業後又能得到不錯的工作。他們在大學中所受到的限制即使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相對於勞工所需忍受的可說是十分輕微的。學生的社會處境與地位實在是與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大不相同的，如貧民窟中的美國黑人，或是未開發國家中的農民；若把他們視為相同，令人感到荒謬。再者，學生不但現在，即使將來也不會是人口中的大多數，它更不可能造成“革命的大多數”，如馬克思或早期社會主義所預測的那樣。那麼，做為社會中的一個少數團體，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提供對社會現況批判性的診斷，亦即激進知識份子一向所擔任的傳統性的功能；而不可能期待他們在更廣闊的運動層次上去與其他社會團體結為聯盟。許多國家的學生運動，曾試着去結盟，如美國學生與黑人及其他貧窮的團體，德國及法國的學生運動與工會，但都沒有顯着的進展。這不成功的原因，主要不在於意識型態上的不協調，而在於學生與其他團體在社會地位上的差別。黑人與勞工之間能夠形成各種利益團體（真正的共同利益，或是潛在的共同利益），這些團體進行非常實際的鬭爭；而學生運動主要只是表達對社會的批判，而且是較抽離的智性與道德的批判。這二種不同的行動——激進的批判與實質利害的爭取——本來就是互相關連並深深的交互影響着；但是被壓迫和剝削階級的真實生活經驗才是所有持久性激進運動的根本條件。最後一點，學生不像勞工、農民或種族群體，它缺乏穩定而持續的成員，大部份大學生的生涯在3~5年之間，學生只是站在一暫時性而非長久的社會位置。因此，視學生群體或學生運動為激進運動之持久而穩定的基礎是不實在的。

---

#### 青年反抗運動的延續

---

但是，若視學生運動為持久社會利益的表現，則有二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學生們可以說特別清楚而有力地表達了年輕一代的憤怒與激情，也就是說學生是青年群體的「先鋒隊」。許多資料可資支持這種看法。學生運動，特別在美國，實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反叛運動是非政治性的，可以用詹姆士·狄恩的電影與生活為象徵。事實上，今天存在着一種“青年次文化”，其涵蓋面遠超過學生運動。這個“青年次文化”在每個國家都很突出特別，而且又具有相當國際一致性。這種現象是過去所罕見的。造成代間這種明顯差別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當然科技變遷的速度，生活水準的上昇，有些國家年輕人口的比例增高，一定都造成影響。總之，似乎有一股新的精神漫延着。就很多方面而言，這股精神與一次大戰前美國史上的另一個騷動期所激起的精神很相似。Randolph Bourne在其「青年與生活」(Youth and Life)文集中，表達了一種與日俱增的矛盾感覺——人類幸福新的可能性與毀滅性戰爭的矛盾。同樣的矛盾現在更加尖銳，正如馬庫色的看法（註三）因為科技的成就使理想世界不再只是一種空想而已，但另一方面也使徹底的毀滅成為可能。而這種矛盾年輕人大概體會得最深刻，學生運動正可視為是對這種自我毀滅的抗議。學生們的反戰，不只是在反抗一種不正義的侵略戰爭，而且在阻止人類朝自我毀滅滑進，防止炮製“一個瞎了眼的巨靈暴怒地揮舞着巨剪”。最能反映這種反抗精神的口號，便是當時流行的：“要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

我們還可以由具體的方式來呈現學生運動與廣泛青年文化之間的相似性。例如，1968年5月法國的暴動中，學生十分成功地吸引了大批青年工人加入運動中，而當時工會本身却一直是十分冷淡。不過，若因此遽下結論說這種代間的差距，會造成「青年群體」對抗「中年群體」的一種新的政治取向，我看恐怕是錯誤的。因為青年是變動不定而不易界定其社會地位正如同前面提及的學生一樣，是不適於形成一種持久性的運動。事實上，年輕人縱然缺乏對原有的政治團體的向心力，但他們也很少認同於以年齡為區分的“新生代團體”。年輕人較同情那些基於種族、語言或文化而形成的運動或政治團體。即各種復活的民族主義型式（如美國黑

人民族主義、加拿大法語系民族主義，以及在英國的蘇格蘭與威爾士的民族主義，等）。

### 學生權力與民主大學

在大學裏，這群自我點醒的學生形成一特殊的社會團體，近來這種自我的點醒透過“學生權力”這個形成來表達。這種“學生權力”不僅只是爭取學校裡頭學生們應有的主權，它關心社會國家的政治事務。即使在與學校行政方面對抗上，只要爭議的事項涉及一般政治問題，那麼，抗議行動就是最猛烈而廣泛的。例如，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一九六四年爭取言論自由運動，便是由於其所爭論的問題是屬於一般政治上言論自由的範圍而成效彰著，其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西柏林、華沙、南泰爾等學府都是例證。學生運動的生命力，主要取決於它是否有能力去傳達社會國家中的不滿不平，特別是這些不滿不平已無其他孔道出路。這在美國最為顯著，學生們鼓吹反對越戰，反貧窮、反對剝削黑人。被反對的這幾樣都是美國社會的不平不滿，學生們出來領導，因而產生了波瀾壯大的學生運動。在捷克與波蘭，學生們起來爭取較大的政治自由與文化自由；在法國，則領頭反對戴高樂的權威統治，等等。

大學中這群激進的少數學生能否成功的領導多數學生參與國家性的政治事件與他們對學校行政結構的影響力是相關連的。學生運動的成功主要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學生運動所提倡的平等和參與的精神相當適合「大學」這樣的一個機構。「學生權力」即表達了這些觀點；而每一學校既定結構的本質影響了“學生權力”在情緒上令學生振奮，在行動上得到實踐的程度。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大學的最終決策單位原本是一完全非學術性的董事會，正如Thorstein Veblen，50年前在「美國高等教育運動」（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文中所批評的那樣。因此，大學教師和學生一直在努力促使學校變得更自主、更有學術獨立性。激進的學生要求更基本徹底的改變。他們注意到，課程的安排、教員的聘請等已改由學術人士自行控制，而不再受董事會或其他校外外行人的支配。雖然如此，但學生的參與仍然很少。大學

雖有較高自主性，但決策單位仍然只限於少數資深教員與學校行政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官僚階層的精神仍保留在大學之中。因此，他們提倡一更全然“民主化”的大學。這些看法在湯姆·海登（Tom Hayden）的文章上有清楚的整理。在大衛·阿德斯坦（David Adelman）編輯的“基進學生聯盟一教你了解學生自己的權力”的手冊中，海登認為：

「學者之間是彼此平等的，也許某些人可能較為智慧或是較有學問，但不能說他們就比別人更認識真理。因為教授們比其他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訓練，他們應該為大學發展的方向負基本的責任，教育不是一單向的過程，教師們應從接受年輕一代新鮮的看法而平衡原有的主張。原因為民主是要求大眾對重要決策的控制權，學生應該與教授們分享發展大學的決策權力。」

上面這樣的看法近年來已相當廣泛的被學生們接受，而且在不同的社會中被應用出來。在法國，學生反對及攻擊學校被教育局官員及一小群資深教授所控制。在捷克及波蘭，控制大學的共產黨官員也是被攻擊的。在英國，學生的抗議較為緩和，因為某種學術自主、獨立的形式已存在於大學之中（不見得存在於其他高等學府中）；但是，激進學生的批判也更加深刻。因為，政客與外行人對學校的直接控制雖然減少了，但透過經濟手段來“間接控制”大學自主性仍然嚴重。因此，英國及一些其他國家的激進學生們對控制學校自主性的批評，也就從“直接控制”衍蓋到“間接控制”。大學，不應當是一個“知識工廠”，而應當是一個“民主大學”。學生不應當只是購買知識，像工人般地被僱來生產知識；而應當是學校的主體，參與管理學校。這也正是“學生權力”的注意。

“民主大學”不應當只是消極地理解為對校方的權威控制與官僚作風的批判而已。“民主大學”應當有更正面的內涵，這還須要我們進一步的探討。因為，大學實在是一個實踐民主的理想場所；大學的成員較平等，它應當是講道理而不是逼迫別人服從的地方。另一方面，大學的本質，如學術研究，發現，傳遞知識但不斷地改進等等，也使大學民主

不會成為純粹的多數代表。因此，大學將是發表不同意見，進行真正知識探索，以及一種新的人際關係的場合。總之，它是創造更徹底民主的地方。

---

### 結論——產生新一代思想家

---

以上討論了學生運動的三個方面，即它作為一種新的激進運動，它作為新生代的代表或先鋒，以及作為在校園內的特殊團體。這三者雖分開討論，彼此却緊密相連，彼此影響。政治事件對學生運動的興衰將產生最大的影響。例如，倘若越戰結束了，學生運動將會失去它的許多活力。不論學生運動能否發展出更進一步的激進運動，它至少能產生新一代的激進思想家。這將是學生運動最重大的功能之一；而這批新思想家的成就，還要待未來歷史才能給予判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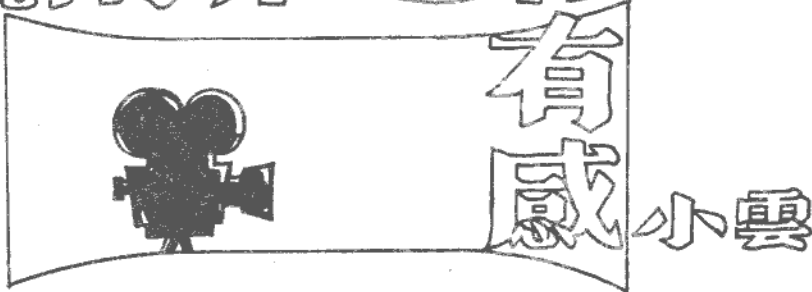
註一：見亞蘭·杜練發表在法國世界報的文章：“學生的起因(Naissance d'un mouvement étudiant?)”(1968年3月7、8日

)1971年他的書：“五月運動：反叛與改革(The May Movement:Revolt and Reform)”對這個看法又有進一步的闡述。

註二：見馬庫色：“反抗暴力的問題(Das Problem der Gewalt in der Opposition)”刊於Psychanalyse und Politik。

註三：這裡的尤金·麥卡錫並不是五十年代時期麥卡錫主義的那個麥卡錫。麥卡錫主義的那個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是個極端反共者，在他五十年代初期參議院調查委員任內，曾迫害過許多學者，政府官員及民間領袖，而且往往缺乏證據。他的那套反共主張與做法，影響很大，成為“麥卡錫主義”。尤金·麥卡錫也是參議員，但他的主張和另一個大異其趣。他在1968年力主反對美國打越戰，號召了許多基進與自由派的學生的支持，但也成為那些保守、反共、好戰份子的眼中釘。當時美國正陷入越戰泥潭，全國反戰聲浪日漲。麥卡錫以反戰為基本主張來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曾在一些初選中獲勝，造成全國性聲勢。

# 觀南非電影有感



小雲

這是一位留學未及一年的新生，真誠地寫下他來美後的見聞與感觸，特別是他看了幾部有關南非社會現況的電影的感想。作者投稿來本刊時，雖自謙為「寫得很亂，很沒信心，亦缺字法」，但讀者將不難從文中樸直懇切的文句中看到一位關心社會與故鄉，滿懷追求真相與正義者的心情。我們認為，一個人最可貴的，不在於他有多華麗的文采與學識，而在於他是否具有一個關懷他人的赤子之心，以及為真理與正義的擁抱之情。特此推薦給讀者。

希望讀者能來信談談您的讀後感，更希望有更多的新來留學生也一樣能寫下您們來美後的一些心路歷程。不管台灣已經多麼地西化，出來海外還是很有機會遇到

一些在台灣不曾看到、聽到或想到的事物。「民主台灣」是一份要從台灣現實出發來關心台灣、支持台灣民主化的刊物，我們特要需多了解台灣的現況——不僅是物質社會現況、還要了解台灣一般人在想些什麼、同學們心中所思所感是大家了解台灣不可或缺的一個層面。非常歡迎同學們的來稿。

——編者識

前一個半月裏學校的一個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為宗旨的學生社團為拓展社務，招募新團友，有一連串的活動，如系列電影欣賞會、種族差異討論會、禁食捐款（由宿舍同學簽名放棄一餐）等。其中的電影欣賞，由於一些教授授課要求，參加者為數最多。此次系列電影的主題是探討南非種族隔離，以呈現社會現象為表達方式。由於片數較多（每次二至三部，一共三次），使觀眾在一連串的「電影欣賞」下，頗能一窺現今二十世紀末現代社會中，居然有一群為數不少的人類，過著一種讓我們（或者是我）難以想像的生活，然進一步的思考後，以一個台灣剛出國（八個月），多少也讀了點歷史的我，也並不致於陌生的難以接受才是。資本主義國家挾著現代的武器，自以為超人一等的優越感，在第三世界裏恣行巧取豪奪，其實早已不是新聞，甚至是一椿被人習慣而不自覺的現象。如此想來，這些電影當就不只是電影而已，其中有頗多值得台灣同胞思考之處——以她具有五十年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及目前被美國、日本深深影響的地位而言。

#### 南非的背景與現況

在介紹電影之前，願將南非背景、現狀做一概述，或許會更清楚些：

▲一六五二當白人進占南非好望角，便執行種族分隔，由於武力的優越，荷蘭和英國人掌握了權力。

▲一九四八由荷蘭後裔組成的國家主義黨（NATIONALIST PARTY）開始被授權行使一切以白人優越為基礎的分離政策，稱之為「APARTHEID」。

▲「APARTHEID」（發音為APART-HATE）意指分離（APART）或隔離（SEPARATENESS），在此制度下所有的人由膚色之不同被分為「白人」（歐人之後裔）、「黑人」（非洲土著）、「有色人種」（種族之混血）及「亞洲人」（大部份是印度人後裔）。白人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却控制了所有其他人種的各個生活層面。

▲在種族分隔的制度下，舉凡人民的居住、工作、教育、行政權的行使等皆被皮膚的顏色所決定。各種族住在不同的地區，坐不同的火車、汽車，上不同的學校、教堂、餐廳、戲院、沙灘、俱樂部及作不同的運動項目。他們走不同的人行道，進不同的門，用不同的電話亭及洗手間，甚至進不同的醫院，死了也「各得其所」地理在不同的地方，所有白人用的設備都是一流的，有色人種的設備都是次等的。生活水平的差異亦是大得驚人：九十%以



上的白人家庭有電冰箱；相對地，只有百分之二的黑人家裏擁有；一千個黑人家裏只有一戶有電話，而在白人家中除了電話外還有豪華游泳池。

▲土地方面，87%富庶的土地歸15%的白人所有，13%貧瘠的土地留給黑人。即使在這剩餘的土地上，黑人亦無權充分行使政權。所有黑人依部落區分成十份稱為「黑人鄉區」。(BANTU-STANS OR BANTU HOMELANDS) (按：在南非，BANTU 泛指非洲黑人)，原居在白人地區的黑人通通被迫遷到這十個廢地。不遵從者，或是剷平住屋，或是燒毀住屋。進而政府又宣佈十分之四的「黑人鄉區」為獨立區。對這些獨立區，除了南非政府外，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承認他們的存在。南非政府這樣的做法是使政府可以儘可能地削減財力補助，讓黑人在這些廢地上自生自滅。

▲行方面。一九五二年起政府為了更順利控制黑人，規定所有黑人公民十六歲之後必須隨身攜帶「通行本」(PASS BOOK)，本內載有種族卡、指紋、照片、工作記錄、稅單及旅行許可。若忘了帶會被處以牢役及罰款，在南非有三分之一的罪犯是因此獲罪。一九四八年國家主義黨，執政以來，超過一千三百萬人因此而犯罪。

▲工作方面。各種法律皆將較好的工作留給白人，有色人種被排除在高薪工作之外。雖然現今亦有非洲人工會(AFRICAN TRADE UNION)存在(至一九七九年才有合法地位)，然各種不同的法律，如：POLICE HARASSMENT, PROSECUTION BANNINGS，始終是直接地壓抑這些反種族歧視的組織及領導人。

#### ▲人口統計：

南非人口統計

非洲人 (AFRICAN)	20,862,610	73%
白人 (WHITE)	4,500,000	15%
有色人種 (COLORED)	2,500,000	9%
亞洲人 (ASIAN)	821,000	3%

#### ▲教育方面：

- A、白人的教育經費是黑人的十倍。
- B、白人上小學免費，黑人得付費。

C、教育內容：學校灌輸學生——歐洲人是優越的，非洲人是野蠻的。

國家主義黨執政以來(一九四八)，為執行上述不平等待遇，二十年間通過數以百計的法律以壓制當地百姓及維持統治局面，重要者如下。

1、一九四九年：禁止異族通婚法 (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 OF 一九四九)——異族通婚是違法的。

2、一九五〇年：集體居住法 (GROUP AREA ACT 一九五〇)——分配總人口84%的非白人，遷居到只有總面積13%的土地上。

3、一九五〇年：鎮壓共產黨法 (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OF 一九五〇)——將所有反種族隔離者打為共產主義份子，進而剝奪他們一切的權利。

4、一九五二年：國民法 (NATIVE ACT OF 一九五二) 要求人民必需隨身攜帶通行本，隨時接受檢查。

5、一九六七年：恐怖主義法 (TERRORISM ACT OF 一九六七)——在此政策下，任何人都可能被冠上恐怖份子的名義而輕易地被政府逮捕。

由於不合理的法律太多，人民動輒得咎，使得南非人民犯罪率為世界第一高。對政治犯(反種族隔離者)更是壓迫的對象，南非的警察及獄官常施以極殘酷的刑罰於犯人。任何反政府行動，更是施以暴力制裁如：

1、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一群反攜帶通行本法的和平示威者，示威於SHARPEVILLE (靠近首都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警察武裝部隊以機關槍和來福槍射殺群眾，當場死六十九人。一八〇人受傷，包括婦女和孩童，當他們想躲開警察時，多數背後中槍死亡。

2、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學童反政府用歐語 (AFRIKAANS) (以荷蘭語為基礎，演變而成夾有德語) 為教學語言，和平示威於一黑人鎮 (SOWETO)。警察暴力的鎮壓下，有60%的黑人學童被射殺、受傷或被逮捕。

美國對南非的政策：美國對南非政策隨著不同總統而有不同的做法。卡特時代，因他主張人權，故嚴重指責南非政府反人權的作法，而與之關係惡劣。雷根上台，為了經濟政策，態度緩和，其政策為CONSTRUCTIVE ENGAGEMENT，一切交往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

七部電影的內容都是根據一位南非女作家 NA-DINE GORDIMER 的作品改編。每部時間，在一個鐘頭左右。短短的故事裏，以平鋪直敘的手法導出種種現象和問題。现就印象較深刻的五部電影內容簡述如下：

(一) 城市之戀 (CITY LOVERS)

南非城市裏一名任職於超級市場店員的有色女子 (COLORED)，在偶然機會裏遇到一位前來南非做考古研究的歐裔學者。由於女孩對這位學者的崇拜及學者客居他鄉 (異地寂寞?)，兩者有了男女之情。但礙於法律的限制 (異族交往是違法的)，總是暗地來往。終有一天夜裏，警察來訪，女孩在驚恐中逃入衣櫃裏，教授找律師交涉無效，終於在翻箱倒篋，照相留檔存證中，發現了女孩。當場侮辱性的拍照不談，事後對男女當事人一連串的检查及對女孩審問，讓人簡直難以置信這件事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

(二) 禱告 (PRAISE)

一位熱心於教會活動的英國女子，有一天經過街頭遇到一對以乞討為生的叔叔，叔叔雙目失明，姪兒一面乞討一面閱讀書報，幾次攀談下來，英國女子覺得這個孩子天資聰穎，頗堪造就，意欲培養。於是透過各種關係及財力支持，使得這名沒機會 (沒錢) 上學的男孩讀書上進。最初這男孩在鄉村學校唸書，同學都是清一色黑人，由於他的聰慧及來自城市的背景，使得他在大部分的場合都是當然的領袖，唯有在某些傳統非洲文化裏他顯得異常的陌生，如「成年禮」、「宗教儀式」等。漸漸地他對本土的文化產生了莫大的興趣。好景不常，他的支助者——英國女子欲送他去城市裏接受更高層次的學術訓練，期他能奠下深造「牛津大學」的基礎。他去的學校是個教會學校，因此，英國女子將這非洲男孩取名「禱告」(PRAISE)，意含經由對這個男孩的栽培，行取悅上帝之道。在這教會裏男孩學的是物理、化學、數學等先進之學，他的表現也確是受神父們的讚賞。他也常常寫信給他在鄉村學校的朋友，但從未得到回音——他的朋友覺得他和他們已不是一類的。其間他也回他叔叔家裏——事實上他是個孤兒，他叔叔只是收養他的人。然而鄉下叔叔家裏對他也是非常地陌生，叔叔亦病故。之後，他對他的學校生涯便有了疏離感，常常在

做練習題時，心早已不在書上。久而久之，他不知所學何來。思考過去，他的朋友已將他劃為異類；展望將來，所要邁向的道路與自己又是那麼地疏離。生活對他成了難以言喻的負荷。他逃離了。整個學校的教職員都無法找到他。鏡頭的最後照在南非街頭，每一個青年人的長相都與他酷似，然終究不是他。

(三) (片名不詳)

故事敘述一名印度籍的南非婦女為公義而努力的故事。這位婦女已婚，丈夫是一名流動的水果攤販。在白人女子挑三揀四，冷言熱嘲中討生活。他生平最感無奈的就是娶到一個好爭權力的妻子，讓他飽受擔心，遭人批評之苦。偏偏生的兒子、女兒又偏向母親，日子更是苦悶多多。這名印度女子由於同胞遭受政府強制遷離居住了幾十年的老屋，面對無力購屋致流離失所的慘境，而聯合一些有識之士、婦女同胞，秘密宣傳反政府言論。終於一天夜裏秘密警察來訪，帶走了她。丈夫從此陷入極低潮，鎖日怨嘆命運乖舛，怎麼會娶到這種妻子，自己不能像其他的朋友一樣，有個正常的家庭。因而對本來就不親近的孩子更加疏離，連妻子也不曾前往探望 (他是法律上第一優先探望人)。每回到了探監期，都是由已出閣且大腹便便的大女兒代表。一天早上，在他正吃著早飯，準備出門做生意之際，大女兒回家，轉達母親祝賀父親生日之意，丈夫突然久久不能言語。連自己都忘了的生日，獄中的太太居然在那種狀態下還能記得，一時百感交集，於是買了一束花到獄中做首次的探監。

(四) 口述歷史 (ORAL HISTORY)

故事發生在南非的一個小部落。有一天地區的軍隊長官前來警告這個村的村長和村民：若是他們知道有游擊隊而不報告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此後村長為此憂心忡忡。他知道他的村子裏確實藏有游擊隊，他的老朋友的兒子失蹤多時，他自己的兒子也不知去向，他們都有可能是游擊隊員，而且都是好友骨肉。事實上，整個村子裏不是他的親戚便是他的好友。國家廣播電台，播放知游擊隊不報告政府的村落不是被燒毀便是被殺光又不絕於耳。終於在他的明察暗訪下發現了游擊隊的所在，他更擔心了，夜夜輾轉，不能入睡。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他做了決定：與其讓地方政府發現游擊隊而毀滅全村，不如報告實情，以保全村的性命財產。到了軍隊部，告之詳情後，軍方給他一瓶上好的酒，讓他好好休息一陣。一覺起來，趕回村裏，烈陽高照下



，全村已成灰燼。這個結果萬萬出乎意料，他無法面對自己所做的後果，他上吊了。

#### (五) 鄉村之戀 (COUNTRY LOVES)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白人回到他成長的故鄉——南非的一個農莊，往事一幕幕浮現眼前——他的幼年、少年、青年。他的父親是這個農莊的主人，一些本地黑人為他們處理農事、雜事。一個小黑女孩與他同齡，兩人青梅竹馬，一塊嬉戲成長。小男孩長大了到城裏求學，每回出莊入莊都是女孩為他開門。在回莊渡假的期間，男孩和女孩有了男、女之情。同時有其他的黑人男士向女孩求婚，女孩家裏也答應了，於是女孩在男孩進城的當兒出嫁了，不久時便育有一子：一個白小孩。男孩在暑假裏回家了，發現她結婚了，居然還懷有他的孩子，其震驚不可謂不小。他不能承受他有個孩子養在黑人家的事情。他恐嚇母親，毒死小孩。母親的丈夫決定上訴，法院判決更寬再審。男孩的父親要女孩的父親同家人立刻離開農場，女孩的父親說，我跟了你二十多年，這下你要我去那裏？男孩的父親說：「我不管你，離開這裏隨便那都可以，不准再回來」。女孩一家離開了，這回女孩為自己開了農莊的門。沒有人再提上法院的事。

#### 一個新留學生的惶恐

幾部片子看下來，頗有不知身置何時之嘆。這些個情節其實並不是頂陌生，只是早已把它們歸到「過去式」。現在當有人告訴你這就是世界上部份的人在過的日子，一下子卻有點反應不過來，覺得這和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實在是差距太大。後來我參加了一個座談會，主要是以這幾部片子所引發的問題做一些討論。在座的有各系教授六、七人之多（二位黑人教授，四位白人，主持人是黑人），很自然地問題落到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問題的關係。其中黑人女教授談到個人幼年經驗時不禁情緒激動，她說：「從小在佛羅里達我們黑人用的東西就和白人不一樣，我們上不同的學校、用不同的洗手間，當我要上大學時，因本州法律不准黑人上本州的大學，而被逼非到別州上大學不可。記得有一次，我的家裏被白人放火燒毀（父親抗議白對黑不平等）我們打電話，三天後才有警察來……。」之後數名白人問是否這些年有若干改進否，氣氛中頗有雖然早年我們白人政策不合理，但我們也是努力在改進……。黑人教授原則上也是同意這種說法，但在語

氣上多少有點勉強。是的，黑、白世界間的平等是應該，而非一方給另一方的恩惠。

來美一年不足，半載有餘，在台灣不解的問題至今始終還是疑問，尤其在和中國大陸來美同學接觸下，感覺特別不同。在台灣每每宣傳我們的經濟是如何的發展蓬勃，生活水準高於大陸多少。到了美國和大陸同學相較下，台灣同學穿的、表現的的確也是進步，摩登得許多（具體的說是和美國人比較像），然有一回在和室友聊天時（伊朗人），一句話讓我回味至今。他說：「如果霍梅尼做了好事，那麼第一件便是把美國人趕出伊朗。」當他談到巴勒維掌權的幾年，伊朗大部分的東西都從美國進口，農村人民不願耕種紛紛移到城市……，感覺像台灣日前的現象，我們的經濟的確是在三十年有長足的進步，這可從個人成長中家庭經濟的改善，明顯的感覺，吃的、穿的、用的的確是比小時候好的許多。但是這樣的好，感覺上又不像真正紮實的好，報上經濟罪犯不斷，不景氣倒風頻頻，朋友長輩的道德觀似乎不再像以往的強調，取而代之的是金錢取向，這一切對一個不懂經濟的我本來就是一連串的問題，總覺得一個真正健全社會的進步不當是如此。來美後的刺激，讓我覺得台灣的經濟奇蹟並不足喜，大陸閉關自守，生活水準不高也不見得太為他們憂心，至少關起門來單打獨鬥慢慢走，要比和朋友一塊「起飛」要牢靠些。

看看南非，看看第三世界的國家，舉凡有外國勢力插手（無論經濟、政治）那個國家有好下場？歷史的教訓離我們這代並不遠，教科書中讀到近代史的中國遭列強侵略瓜分的事實，言猶在耳，對我們這一代雖然帝國主義已不是那麼尖銳地呈現在眼前，尤其在台灣生活進步，水準提高的當兒，更是難以敏感到我們的未來是被一隻或多隻（日本、美國、專政）無形的手深深影響的，沒來美國前，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所知僅是政治安定、經濟進步、文化蓬勃，到美國後看到的消息是政治靠美、經濟靠美、文化也和美國相距不遠，好處是來美國適應得快，擔心是我並沒有太多的知識讓我考慮所謂「台灣」要走向何處，我只是一味地惶恐著。

參考資料：

1、WASHINGTON NOTES ON AFRICA  
一九八三。

2、GREAT DECISION, 84 一九八四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 中國人的



戴國煒

# 中原意識與邊疆觀

——從自我體驗來自剖或解釋——

戴國煒先生於1931年生於台灣。

1954年中興大學畢業得到農學士（農業經濟）。1966年東京大學得農學博士（農業經濟），現任東京立教大學東方史學教授。其著作很多，重要的有：「中國甘蔗糖業史」、「和日本人的對話」、「日本人與亞洲」、「境界人的獨白」、「新亞洲的架構」、「台灣與台灣人」、「華僑」、「台灣霧社烽起事件的研究與資料」等。新編著有「轉型期的中國」第一部，及「我們生涯中的中國」，但很可惜概為日本文。

中心與邊陲的對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城市與鄉村、中原與邊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地區等等，都是這種對立的例證。有關這種對立的研究已逐漸盛行。例如二十多年前興起的庸屬理論（或依賴理論，見本刊34期37頁）便是根據中心——邊陲的對立與差別來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問題。

台灣地處中國邊陲，加上曾受日本統治，以及目前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具有濃厚的邊陲性。台灣居民因而具有遠較其他地區為強烈的地方意識，亦即「台灣意識」。但另一方面，台灣居民除了少數高山諸族原住民外，均移自中國大陸。移民每有綿延不斷的原鄉意識。來台的移民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原意識。這種中原意識在受到日本等外來侵略，形成漢族意識或「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存於台灣，反映了台灣社會組織及歷史過程的複雜性。

原鄉意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海外華人或留學生。東南亞華人的原鄉意識曾導至當地政府的排華行動。台灣來美留學生的原鄉意識也在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及提倡台獨運動中發揮重大作用。

戴國輝先生這個講稿係根據他在紐約哥大一次公開演講整理而成。作者以親身的體驗來分析這個重要而不易理清的題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省察「台灣意識」「中國意識」論戰，特此推薦給讀者。

——編者識

我先交代一下今天這個題目的由來。第一是前年，1982年的暑假我用日文寫了一篇論文，收在「漢民族與中國社會」裏。〔舉起這本書〕這書是一系列從當前的世界探討各民族與國家間問題的叢書之第一冊，是我的老朋友橋本漢太郎教授編的，他是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語言學教授。這裏頭我寫的一長篇論文就是今天的題目。那裏頭我提了幾個問題，最主要的是對漢民族的意識，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及中華意識做一個未成熟的整理和交代。這是我一直在日本探討的主要題目之一。其結果變成我這篇論文。其次，在愛荷華我沒意料到會碰上陳映真。結果在「台灣與世界」第八、九期（分別在1984年二、三月出版）發表了上下兩篇的「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希望在座的鄉親與同學們趁我在紐約的這段期間，能給鄉弟多多批評和指教。好好地我們可以討論一番。

#### 從邊陲到中心的史觀

為什麼要從“自我的體驗”談起呢？照理說這種寫法是吃力不討好的。以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講的話，是最笨的一種作法。為什麼要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過去的體驗交代清楚呢？把這些

記錄下來，將來或許要吃虧。可能我是個大傻瓜所以才這樣做。我始終這樣想：（原則上搞社會科學的就是應該擺開情緒的部份，把所研究的對象對象化、客觀化，保持一定的距離，然後才加以探討。但把所有的感性部份丟掉，並沒有把它昇華，提高層次來結合科學研究的話，亦太過於枯燥。不一定能道出其所以然來）。因此我在東京這二十八年，經過種種的挫折，各色各樣的衝擊，發現到就是應該從自己生活的現實，或是生活歷史的現實，或是我既有的社會生活的現實做出發點來思考、來整理自己的問題。意思就是說千萬不能藉為「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來自欺欺人。對自己也應該有所交代。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知識份子經過很多很多的挫折，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頭。但是不管在大陸、在台灣，或者是現在在美國，一些搞政治，參與政治的朋友們一直都不大

原則上，社會科學應擺開情緒，把研究的對象客觀化，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把所有感性都丟掉，未把它昇華，提高層次來結合科學研究，亦不一定能道出所以然來。

公開地談這些問題，至少在我的狹窄的經驗來言是如此。這個問題就是人人所罵的美國在成熟期資本主義下開花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我却認為「個人主義」有正、反兩面。我們應該追求其正面意義。我希望對自己比較忠厚一些，善待自己一些。這樣對做學問、研究、待人、處事都要好一點。不然的話，就像很多知識份子被人家牽着鼻子走，始終走不出自己的道路來。不仿美國，就學日本，老是依賴別人，老是高攀（或許該說低攀）。對一些權勢低頭，出賣自己，甚至出賣朋友。簡直是胡鬧，也相當不應該。總之，我這個題目是要對自己有所交代而談的。另外，從我個人生活來說，也是給我在日本生的孩子們留個記錄，讓他們能超越我，從他們的父親所經歷過、所苦惱過的行程和思路得到一點小小的教訓。對這個問題要交待的第三點則得從我半路出家談起。剛剛出席又誇獎我學問相當廣泛，這並不事實。只能說我興趣很廣，肚子裏都是「油」〔大家笑〕，並不是學問。我這個半路出家也有它的必然性。過去我學農，學農業經濟，寫這方面的論文，然後寫農村社會學有關的題目，博士論文寫的是農業史，我做農村社會學這方面的題目的時候，相當積極地利用文學題材（小說）加以整理、考證並精煉後做研究的「基材」。後來我寫糖業史也得利用我們老祖宗留下來比較多的文字材料，因為，諸位都知道，甘蔗糖業這方面根本不可能在考古方面留下來。所以我就找出當年都市生活的一些文學語文等記錄來，用社會科學、社會經濟史的方法整理出我的第一本書。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我對所謂正統就形成一種看法。就是說，中國知識份子背負了相當重的歷史包袱，總是從歷史，也就是從過去的觀點來看問題，其實老百姓對正史都沒有太多的興趣。比如廿四史中的三國史，我相信除了唸歷史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去看它。但是三國演義看的人却很多，不管它的歷史事實性如何。後來我就想到搞正統歷史的人很多，我何不從邊緣來圍攻呢？套一句大陸的術語就是“從農村包圍都市”，「革命」求勝的方式既然可以用，當然做學問也可以一試吧。那麼「邊緣」對我究竟是什麼呢？搞台灣史啊、搞華僑史啊、搞農業史啊，甚至在農業史裏我搞的是蔗糖史（並不是社會經濟史裏的主流，而是一個邊緣的東西），就是一些嘗試吧了。如此就慢慢形成了鄉弟的一種「

史觀」。我在搞台灣史的時候亦是從另外一個“邊緣”的高山諸族著手，我覺得高山族的歷史境遇太慘，沒有人替他們講話，因而我就代他們整理一些資料出來。當然，我沒有資格替他們寫歷史，但是起碼給自己一個交代。歷史上，我們客家人給高山諸族添了許多麻煩，或是傷害了他們，或是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就這樣，終於編出了「台灣霧社烽起事件的資料與研究」。這樣講，諸位就可以發現到我總是在“邊緣”徘徊，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核心，中心地帶去。

我現在以為我的歷史觀體系在慢慢地成形。這是我第一次很冒昧地公開講出來。我的筆記本裏是畫了許多圓圈、箭號等等，在一步步地搞。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完成較有系統的一套東西來。另外一句題外話就是：我覺得很多過去搞歷史的沒有用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等方法，我希望能夠把這些方法導入歷史研究方法裏來。或能稱為歷史心理學的一種範疇的新境界。

---

#### 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為負責

---

在進入正題之前，最後一個想請教諸位的就是“自我同定”(identity)的譯詞問題。我不曉得台灣島內或大陸上寫文章的人用不用這個翻譯詞彙。常用的譯詞“認同”還算不錯，但是比較適於動詞的場合，也就是英文的“identity”。但是把“identity”翻成“認同”，很有些時候會引起誤解，不很適當。所以我想用“自我同定”。這個“自我同定”的“自我”當然跟「個人主義」有關係，這個非常值得我們留意與強調。就是說對自己的“identity crisis”(認同危機)如何解決，以及如何豎立自己的自我同定。也就是說，當為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為負上責任來。時時刻刻都應該好好對待自己，老老實實面對自己，進一步要能對得起朋友、鄉土與民族。還得與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才好。就是我未成熟的一個看法，也就是為什麼我要赤裸裸地把我的看法說出來的主要因素，這在日本學界也是很少見的。

當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日本朋友來信說，引起了種種爭論和嘉評。我今天的一個如意算盤就是希望諸位能夠給我一些意見，我回去以後可以藉諸位的智慧來應付日本朋友方面的“挑戰”。

現在言歸正傳。第一個要談的就是“黃帝子孫論”。我特別是要談我從小到小學這一段期間，黃帝子孫論在我家的情形，為什麼家祖父、家父常常與說我們是黃帝的子孫呢？這當然是針對着當年日本統治者——一個外來的壓力，一個權威，且是侵略民族相對抗而說的。我是1931年出生，那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件。等到「七七」的時候，我在唸小學。那時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要逼着我們改姓名，獎勵年輕人參與日本軍的侵略行爲。在這種情況之下，家父很怕我這個么兒將來會被同化成日本人。那時我的哥哥們，有的在東京、有的被動員徵備到南洋，只剩下么兒在身邊。天天給日本老師灌輸“日本國體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偉大的大和民族和大和魂。家父當然希望能夠把這個么兒拉回中國人這邊來。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們家過舊曆年第一天，所謂開正，要拜天公、祭祖、貼春聯……等等。拜天公的時間還得看當年的干支來決定。我相信家祖父和家父等老一輩是透過這些祭祖、拜天公等來教育我們這一輩。叫我們不能且不要變成日本人。

但是我向來不是“乖乖聽”，常常要發些疑問。那時我在東京的哥哥希望我上中學時到日本去上學，因為在台灣受到日本人歧視，很厲害，到日本起碼還有那反動且保守的明治憲法的保障。千萬不能忘記，當年的殖民地台灣，連那老日本憲法都沒有被施行，當然無所謂憲法的保障。他常常寄書來，有次寄來一本松村武雄編的「朝鮮、台灣、支那神話與傳說」。（我寫這篇文章時又看了一次，坦白說，編得不錯）。書上說黃帝是神話，是不存在的。我就向家父發問：“不存在的怎麼會是我們的祖宗呢？”，爸爸說：“你怎麼這麼嚙味？！聽爸爸的就對了，為什麼要發問呢？”我說是書上講的，他說可能是日本人有些偏見，書上抄來抄去，要侮辱我們漢民族，侮辱我們黃帝的子孫，所以說黃帝不存在。後來我向我哥哥求救，他就把司馬遷的史記寄來了。那時我才小學五、六年級，當然很難看懂囉！但是總也看得出來其端倪。五帝本紀第一講黃帝，司馬遷也只是當它是傳說，並沒說是實在的人物。只管說黃帝可能有些不妥，所以再找他的先一

輩的炎帝也就是所謂神農氏來再加一層「武裝」變成所謂“炎黃子孫”或“炎黃裔胄”的成語來，流傳到現在。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想如何用近代人文科學來對這些神話、傳說之類作下分析。是否可沿用社會心理學或精神分析來解釋？日本也有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神話與傳說。我們為什麼不能找出通用的方法，新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解釋它。不管怎樣，對或不對，我爸爸、我祖父他們始終是以爲黃帝是我們的遠祖，漢族的遠祖，我們是他的子孫。這個社會觀念我們絕不能忽略它，更應該加以科學的探討才夠時代意義的。

#### “黃帝子孫論”的政治應用

1955年秋天，我到了東京。本來對於三民主義，除了應付留學考試和預訓班受訓以外，都不大願意看與唸的。到了日本以後，反而想好好研究一下孫文、辛亥革命等。這樣就接觸到章炳麟、王船山、「黃書」，也看過「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等。王船山可以說是主張漢族中心國家並以華夷思想力主排外保種（漢）的開創人。黃帝的「存在」，我看了那些書以後，我斷定它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存在，精神所繫的一種存在。我猜我祖父和爸爸可能沒有看過這些書，1972年回台省親時，我還到老家去查了一下，的確沒有這類書的存藏。那麼他們為什麼會與王船山等人一樣地主張我們一定是黃帝的子孫呢？會不會是口碑傳下來的呢？他們當年的知識水平來言，當然分不出何爲神話，何爲傳說。他們更有可能沒有把神話和傳說分開來的欲求。當然，他們也不會想到更不需要去分。只有我們這些嚙味的知識份子才要搞這個區分了，定義了，分析了等等的事情。（笑）。史記中的黃帝已不是神，而變爲半神半人的「存在」。司馬遷把神話中的黃帝描繪成帶有濃厚的“人”的味道來，但他只認爲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並沒有確認他是真實的存在，我的解釋是：當年我們（算是說自認爲的原初漢人或漢族吧）在中原以黃土平原和黃河來當做我們偉大的母親，向無能爲力來馴服的大河黃河來討生活，還得向可畏的自然環境挑戰。斯時的漢人們爲謀取鬪爭的勝利，還得假託「神通力」等，至於有關炎黃等的故事，却反映當年與大

炎黃等的故事，反映漢族先民與大自然搏鬥的一種社會心理。他們需要「超能力」來支持自己的社會行為。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過去的神話、傳說變成促進排滿、保種（漢）、革命、團結、統一的象徵。

自然博鬥的一種社會心理的反映。原初漢族人當年需要「超能力」來支持自己的社會行為，由這種社會心理的反應逐漸造出一種黃帝子孫的說法。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黃書」、「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就再給倒清興漢革命攤出思想性的準備。它們說的黃族就是漢族，過去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慢慢却變成促進排滿、保種（漢）革命、團結、統一的象徵。後來孫文一統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當然，排「滿」就給沖淡了，逐漸提升為五族共和，五族却不排除滿族了。這種轉變以一個「中國人」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也是一個很大且很有趣的課題。不共戴天的仇族一經過革命卻變為共和的族伴。這一種邏輯的轉換，如何來做合情合理的解釋，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更有意思的是，這幾年大陸對台灣的統戰口號，一貫地呼籲“我們是黃帝子孫”云云，台灣國府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在大談其“炎黃子孫”。他們還一方面說：最好你們“台獨”不要搞什麼台灣民族啦，我們同是炎黃子孫云云。我仍然不做“乖乖聽”，就去查兩邊出的辭海。台灣中草書局發行的『辭海』（1959年4月台4版）的“黃帝”項等於抄襲「史記」根本沒有近代人文科學一類的任何解釋。至於“炎黃”項却加有「今我國人常自稱為炎黃裔胄」。大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1979年版）的“黃帝”項則先明說「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後再引「史記」等記事來闡述。另“炎黃”項亦先明示有「傳說中的中國上古帝王炎帝與黃帝」。

台灣國府講“炎黃子孫”不奇怪，因為他們不要馬列，不講唯物史觀嘛。但是大陸中共就該不同的了。大陸作統戰時又為什麼也來個“炎黃子孫”呢？這不是怪怪的嗎？怪怪是怪怪，但它打這個口號是有一定功能才會繼續在打的。這就是值得我們

探討的呀！彼官為統戰對岸人們的心態究竟為何？難道不值得我們去關心、注意的嗎？我們當然可以批他：“中國共產黨啊！不要變成老修囉！你們的唯物史觀要好好保持囉！你們自己編的辭典明說是傳說，怎麼可以用來作統戰呢？”批儘可以批，但實際上這種政治口號有它存在的合情、合理性，有它發生效果的社會心理基礎。或許被統戰的人們，無意識的具有接受斯種口號的心理基礎。（不被統的當然是例外），不然大陸當局老提這個幹嘛？這次我來美國一年，就發現很多過去搞台獨的鄉親們到北京去了。大概他們動搖了，他們是否對「台灣民族論」失去了信心，回過頭來，承認他們為炎黃子孫的一份子？我並沒有譏笑、中傷人家的意思。而只是以為這種心態值得我們去分析就是了。反而又可以說，自廖文毅以來叫了三十幾年“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我們已自成為「台灣民族」，對中國人，中華民族不但有別，還另具有「民族仇恨」，講了大半天，好像是「空喊」。

在此我順便給諸位，介紹一些小插曲（EPI SODE）。1950年末期到1960年代初頭，大概因為鄉弟是客家系，加上在同學會愛說話又能用日文寫一點小文章的本省人的緣故，有些鄉親來遊說我，要小弟去看他們的廖（文毅）大總統。但我看完了廖著「台灣民本主義」後，我認為襤褸一套，那一套行不通，不值得我浪費時間去訪問他。過些時候有一位同學來邀我去看邱永漢，那一位同學說，邱是在堂堂皇皇的日文大雜誌「中央公論」，「文藝春秋」等寫文章，不至於是襤褸一襲吧！我說邱的日文很美可佩，但他的邏輯我不能贊同。另外我問那位同學，邱會不會是“小政客”來唬人的，搞台獨怎麼取“永漢”這個筆名呢？他恍然大悟，嘿！戴學長，我不曾想過這個問題。（邱的本名為炳楠）。這一次來美國，去年暑假前在灣區有位“新相識”，來了個電話，邀我參加世台會，另外問我想不想與陳唐山見一見面。當時我對美國僑界一無所知，當然不知道陳氏為何許人。經過新相識說明以後，我向她發問，唐山是不是本名？，本名還可原諒，若是筆名的話，會不會再來個“邱永漢”呢？，她忙着在電話那一邊說，唐山大概是本名……。唐山先生將來何去何從，我個人無法預料亦無多大興趣。但邱永漢財神師爺（日本商人對他的稱呼），他已自認“炎黃子孫”回台賺他的

錢。前幾年搖身一變，又成爲日本公民去了。愛罵人的在日華僑們裡，甚至於有人打起問號“邱會不會再從日本公民，升級變爲日本皇民”“可嘆可嘆！！”。這個是後話。

---

### 尋根，族譜與中原意識

---

諸位都知道，前不久『根』這部著作和電視在東亞亦風行一時，在日本，台灣也煽起尋根熱。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界又是一樣。反正生活提高到了某一種程度，一般人都會想做起家譜，族譜之類的。我們戴家也新搞了一個。還有遠祖的相片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戴家的族譜豈能有個黃帝“玉照”〔衆笑〕。真有意思呀！。那時我們家的總管大哥還在世，我就寫信問他，族譜裏那張“玉照”怎麼弄來的。怎麼用“今人”古裝照相來唬自己。根本不知模特兒爲何許人，還要我們戴家後裔來祭拜，不是胡鬧嗎？他老人家含糊其詞，但却讓編譜的“業餘文人”賺了一大筆。這亦可說幫台灣創出“就業機會”相助並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景氣”（哈！）。

我們家的店號是“晉和”，晉當然是指山西省的太原。這也有段故事。我爸爸那時教育我們是黃帝的子孫，當然要談到中原。但我始終不是乖乖聽，就問他：「中原在什麼地方？」我爸爸說是在河南附近。可是我一查，我們的店號是晉和，是山西的太原囉，河南到哪裏去了呢？會不會以前的河南包括太原，或是後來分離了呢？我爸爸素來討厭日本話，這時却用日本話罵我真是“唔路塞”（指嚙嚙，討厭的人）〔衆笑〕我就說：「你不是說要我們好好發問，學習才能進步嗎？怎麼又罵我『唔路塞』呢？」我們的祖宗靈牌和祖墳的墓碑上都寫的是“譙國”。我就問我爸爸在哪裏，是不是在中原呢？他說不知道。好，我就去查。給我查出來了，原來是河南省上丘縣，當然得託福，大陸的地域以及地名並無超過大變化。我就說：「我們的祖宗靈牌和墓碑上的兩個字與我們的店號距離相當遠。那時船也不甚大亦不可能很好，當然沒有飛機囉，怎麼會差得那麼遠？」我爸爸大概沒法回答我，就說：「我們偉大的正統祖先，在周朝時被封於譙州，就是中原遙遠那段時期，我們戴家被封了，由『州

』變成『國』，就是『譙國』。這一下，你就得服氣了吧？」我說：「還是不大服氣。我們家那麼偉大的話，爲什麼跑到台灣來冒險？首先要過“烏水溝”也就是現名爲台灣海峽的險，那時候好危險！到了台灣還要跟高山諸族打仗，這是很危險的。」他一方面翻我們家的老族譜，（不是剛才說的有照片的族譜，另外有一本老族譜）並指着族譜說我們的祖先多光彩，好多的秀才、舉人。我說：「沒有吧？哪有那麼多秀才、舉人呢？如果我們戴家都是秀才、舉人的話，我們應該像林本源一樣囉？奇怪！我們家的秀才、舉人都不靈光？」〔衆笑〕我爸爸又罵我“唔路塞”。差一點要挨揍。

---

### 因“雜種”挨了耳光

---

最絕的是，有一天我的外祖母到我家來，那時她七十幾歲，她很漂亮，鼻樑高高地，客家山歌唱得好得很。我突然問我爸爸：「外祖母會不會是平埔番？」我馬上挨了一個耳光。我爸爸說：「你這個混帳！我們家怎麼會有“雜種”？」我說：「哥哥寄給我的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門第爾（MENDEL）的有關「遺傳法則」之書——說染種是好的。爲什麼你要罵我、打我？」我爸爸說：「你混帳！什麼“染種”好！我們戴家怎麼會有染種？」我說：「染種不壞嘛！從進化論、遺傳學來講，越染越有希望啊！」〔衆笑〕當年，我的想法不外是承認家父的中原正統說，再加上與平埔族混血不是可以培育更上一層樓的“雜種”嗎！但長輩却不能接受。中國話的「染種」是罵人的話，其實就是有一點混血又不至於傷大雅才對（哈！）。但我爸爸絕不讓如此的說法。當時他會有那種激烈反應是很有意思耐人尋味的！他雖然唸過漢書，我相信不會看過太多的書，但他身體中充滿了“黃帝子孫”觀與“中原正統意識”，心理上始終認爲是大陸中原那邊南下且過海來的。關於混血，我相信客家人和邊疆民族混血，該是常見的，你看李光耀，如果把他請到東京，日本人一定說他是朝鮮人。李的面貌很像“平均”的朝鮮人的面貌啊！朱德據說又是客家人，大塊頭，可能比較接近北方人的所謂漢族。葉劍英在相片和電視上看，較爲斯文些。我自己嘛，我相信有一點高山諸族的血統吧。〔衆笑〕現

在弄了許多，以前黑漆漆亦是很Smart，大家叫我“black”。〔衆笑〕踢足球時，大家認為我是很兇猛的。有關我們家，自囿於“黃帝子孫論”和“中原正統”意識的故事，就此暫時結束。

---

### 客家人與閩南人

---

現在我講第二個題目，就是“中原、客家人”。我想，我如何地慢慢認同自己為客家，當然是先碰上非客家後，才會逐漸地做下自我認識，認識到我自己是客家人。我生在中壢，我們家的小醫院在中壢街上，店也在街上，平常碰到的都講客家話，有一天回去鄉下的家，忽然碰到有人講我聽不懂的話，後來家母告訴我他們是福佬，是閩南人。我們通常叫做“福佬仔”。我們彼此間的生活很少有過衝突，住在我們鄉下家的隔壁就是我們家的佃農，他們是閩南底客家人，原本是閩南人，後來遷來客家村莊住，又種我們的地吧，他們平常在家裏講福佬話，但在外面則講客家話，慢慢地年輕的一代，二代就客家化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是福佬底或閩南底客家人。然等到我上中學以後，就再發現我們的周圍日本人變多數了，鄉下只看小學校長與警察大人以及他們的眷族是日本人，但在中學的同學，3/4是日本仔，剩下1/4才是當年稱謂本島人的台灣人，偶而可尋出一、二位山地人（全校裏），這就是當年的新竹州立中學的情況。當年的日本人學生很霸道，常常欺侮我們，我們本島人之間逐漸發現我們同受日本人的欺凌。但是我們互相之間介有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好像氣質亦不大一樣。客家人一般較多出身於農村，商人比較少，像我們家既是醫生，又是地主，再兼營布店和碾米廠是很少有的。而當年我同班的其他客家人不是小學老師的兒子，就是中小地主當年被分類為“貸地業”家的兒子，或是醫生的兒子，生意人的子弟甚少。但福佬人同學，他們的出身較“雜”，因他們住新竹市、桃園街（當年新竹市是一大州城，客家城鎮的中壢還沒有現在般的繁華，福佬人的城鎮好比桃園、竹南都要比中壢、苗栗街要繁榮，起碼在我幼少年時期是如此），他們間還有“大”商人的子弟，習慣於商場及商人討價還價一般的生活，顯然地他們的表現較為“敏捷”，較為“狡猾”，較為“油條”。我們覺得閩南系同學很靈，很會對付日

本人。我們甚至認為閩南人狡猾，不老實，不忠厚。而我們客家人直通通，說打架就打架；閩南人則說我們“阿呆”（笨蛋）。另一方面，我們也覺得閩南人不易團結，客家人則比較團結。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客家人大多是鄉下出來的，對於都市的商業社會沒有什麼認識與體驗。閩南人則見的場面多與廣，較為“世故”或成熟，很會適應。由於這個區別，客家人和閩南人同樣受日本人的欺凌，但我們之間却難於構起“被迫受害者”間的共識與連帶團結。原因不外是以下幾種。第一，母語有別。第二，氣質有異。第三，彼此間的信賴感亦不易建立。第四，日本人的挑撥離間政策促進我們本島人之間的分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年的山地青年同學在我們新竹中學者，始終受到日本人的“特別”庇護，他們講日本語比我們靈，他們不會說福佬話，客家話，他們的母語我們不懂，當然不可能站在一起，我們之間建立關係尚要等到光復後。

---

### 客家是什麼？

---

由於這個閩南人與客家人的不同，後來我就問家父，“客家是什麼？”他說，“客家就是講客家話的人，是從中原來的。”還說我們客家是正統的漢族，再問他正統是什麼，他就答不出來了，反正他確信是中原正統出身，跟閩南人不一樣。甚至我們父母都有一種偏見，認為閩南人髒，不愛洗澡。〔衆笑〕其實，我祖母，我媽媽梳頭髮的髮型、穿的客家衣服、唱的山歌都有客家的特殊風格，當年的福佬鄉親很可能在背後罵我們客家人“土包子”呢！〔笑〕

到了光復後，我的視野慢慢擴大了。幫我擴大了。幫我擴大視野的第一個人就是我們大哥。他從南洋復員回來，告訴我們南洋華僑裡，有很多和我們講同樣客家話的。甚至於有同我們家母，祖先梳同樣髮型頭的，穿“大婆衫”的婦女們。他還進一步在台北給我們家添購了一本羅香林原著『客家研究導編』的日譯本。

我們那以前，只知道中壢靠海邊的客家人講“海陸”，我們家母就講“海陸”客家話。但我們家常用的却是“四縣”。另外有位孀母來自於台中的



東勢角，她們家講的是另外一種饒平客家話。這些命名統統來自於對岸大陸故鄉的地名。

我詳讀了羅著以後我發現客家在大陸上的分佈都在“邊陲之地”，不毛的“邊疆”之地。也就是說多散居於Marginal Land。後來我再發現台灣的客家分佈亦是一樣，在“山脚”地帶，在福佬系所佔據的平野部份與山地諸族退據的高山地帶之間。南洋亦有類似的歷史情形。

這般分佈的來龍去脈，我們今天不加以討論，我只在此地提一提，我們客家人士的潛意識裡面有雙重、三重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在，却是事實。

---

### 邊疆意識

---

在大陸已居於邊疆，遷台後再來個邊疆。再加上在台灣的客家人數只佔有漢族系台灣人的13%的少數，被歧視是理所當然的。日治時代被日本人歧視，在漢族中還得受福佬系人們的疏離、歧視。這些情況足夠形成客家鄉親們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

來會的鄉親們，千萬別誤會我在“訴客家人的苦”在唱客家人的哭調。鄉弟不過是在試圖發現問題所在而已。我一直認為自囿於低層次的“被迫害意識”者是難於獲得“勝利者之碩果”的。我們為了解決問題，需要發現問題的所在，然更需加以分析，以便解開我們問題的癥結，可以繼而克服我們的問題。更想把自己的看法昇華且提高我們彼此間的精神境界。何況，福佬系鄉親們既然亦有人在主張，福佬通於“河洛”。以此作據尋他們自己的根於中原的。我們就可知“中原正統”意識和“邊疆異端”觀是具有其普遍性的。問題不局限於客家鄉親們。其實古老一點的國家，不管它是東方或西方，多多少少都有中原和邊疆或正統和異端之對抗或“間距”的狀況。就連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加

古老一點的國家，不管它是東方或西方，多多少少都有中原和邊疆之對抗的狀況。一般來言，邊疆意識通常帶有卑屈和反面的潛意識在。

拿大都有類似的問題。中國或許是因為太古老，國土廣大，問題較為巨大與深刻些。

值得我們注意的却是美國。一般來言，邊疆觀或意識往往是曲折錯綜亦複雜的，通常帶有濃厚的“卑屈”和反面的潛意識在。但美國却少有此種性格。

一般白人系美國人的邊疆觀不單沒有負面的價值，反而把它提升並與Frontier Spirit連結在一起它具有正面的，開創新境界的理想，拓荒冒險的崇高精神的含義。我們還可以在其文學裏面，找出強有力地反映開拓者精神的作品類。我現在請教諸位，能否在我們的福佬系台籍作家的陳映真或者在客家系台籍作家的鍾肇政等人的作品裏找出類似Frontier Spirit的“進取性格”和“傲骨”來。

近幾年來，張俊宏提出“草地人”楊遠提出“草根性”雖然難免帶有些美國文化中的Grass-roots的味道，但也值得我們去留意它。

話得說回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看法中的邊疆觀通常却是與“土包子”、“鄉下佬”、“落後性”、“流放”、和“放逐”一類負面價值連結在一起的。

對不起，請諸位再一次回到我們戴家的事例來。我們家祖父、家父輩，他們繼承了遷台來的父祖們的血液、風俗習慣以及不甚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們以開拓者且最低層農民的“身份”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確實是清朝期中國的邊疆之地。他們忙於討生活，他們得向自然界搏鬥，得時時刻刻提防先住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的“出草”而力圖擴展他們以及他們屬主的開拓前線。他們還得與福佬人(有時是泉州人，有時却是漳州人)械鬥搶地盤，確保水源。因此我們父祖輩很不易獲得安穩的生活。當我們家好不容易成長為小地主的時候，却來了個兇暴的異族侵略者——日本人——。

他們雖然不曾作過心理剖析或精神分析，但他們的確確是需要找出能使他們的精神安定下來的“依靠”。套最新的詞彙就是群體的“自我同定”。他們還需要在觀念上找出他們團結的核心。“正統”性的“象徵”。這個不就是，黃帝、中原正統等的觀念嗎？這一類觀念的相對觀念却是“邊疆異端”觀。諸位大可批判我，說我戴某人既然在社會科學，怎麼好把父祖輩的感情都引出來灌漑研

定對象裏去，不但如此還用上你父祖輩不曾想到過的新詞彙來解釋問題。我只好回敬說，這些不過是濶語的一個小小的新嘗試而已。請多多指教就是了。

我們在日本的客家老鄉們，多年前組織了客家同鄉會，另外又組織了姐妹團體崇正協同組合（等於中國的合作社）。1980年的10月上旬，我們還主辦了一次世界客屬懇親會。

在這一次大會上，我觀察了來自各地的客家鄉親。他們的國籍各色各樣，有些鄉親連客家話都已經不會說了。一俟日本的各大報登載了我們開大會的顯着消息後，居然有些未見過面的鄉親來電話，說是幾代前是客家人，但現在已入日本籍，客家話，中國話一概不會說，能否加入大會，參加大會。

他們的熱情真感人。我發現他們所懷有的中原正統意識相當強烈且相當地普遍。

會後我也聽到背後有人罵我，批評我。說是戴某，思想並不保守，爲啥子還用歷史的倒車，搞什麼“泛客家主義”一類的話。

---

#### “自我同定”不是“冷客家主義”

---

藉這一次的良機，我想表明一下。我並不是泛客家主義者更不是唯客家主義者。我到處表明我是台灣出身的客家人，不管對任何國人或地方人，當然包括在排外閉鎖的日本人社會也有所主張。鄉弟沒有瞞過人更沒有瞞過自己。我主張客家人並不意圖與非客家人鬧情緒甚至於搞分歧以及促進分裂。原本的意思在，如何豎立我個人的“自我同定”和客家群體自我同定，我認爲連自己的“出身”都不敢主張它的“固有的尊嚴”時還談些什麼？。知識份子的一切社會行爲的“基點”在於此。就假設我媽媽是位包小腳的窮家出身，我仍然不會掩蓋與逃避我出生的“秘密”的。我當然不會猶豫，去主張與我媽媽臍帶連繫上的“自我同定”。因爲這個是“命運”的，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亦沒有什麼可逃避的。成人時，我們爲了自己的生活與生存當然可以嘗試“非命運”的“自我同定”的選擇。我們可以不讓子女再包小腳，我們可以爲爭上游，向日常生活搏鬥，甚至於我們還可以選擇我們願意歸屬的國籍或公民權。

我不懂，爲何有些人，向來不敢表明自己的“出生”爲何的人，因有“小便宜”（好似感恩票啊，幾十塊美金啊）可賺，他會突而來的道出，我父親原本是……，然一到對她表明自己出生有不利時，又再來一變……，嘿那些沒有什麼可計較了可涉及的啦……，少數者的語言，文化將會被磨滅……會被同化埋沒的囉……可以不談……。奉持有奶是媽哲學的，爲了一時的生活方便亦可“認賊作父”的人們，有何臉皮來主張「革命」，來整理「本位」文化。

「明天」的台灣以及全中國乃至於全世界，客家人應該與高山諸族，與福佬人，與大陸各省人與日本人以及與賣國人等共同致力謀取和平共存，光明的日子才是我的理想。我真不懂，爲什麼還有人會懼怕我們主張客家人意識，要謾罵我們開客家世界大會之盛舉。他們盡其所能在掩蓋他們自己的投機心理的不安，倒反而要來謾罵我們的正當作爲爲「自卑心理在作祟」，真是無恥？！

---

#### 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

---

下面，我們談一下，有關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事實」有關的問題。我們先前已分析過，客家人在流浪求生存的路程裏頭，他們急切需求精神上的「寄託」，中原終於變成他們的價值中心同時亦成爲一種歷史的「真實」。中原在何方，有無其「事實」已不成爲問題，不成他們探討的所在。

老百姓們，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裏頭，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欲望和精力花在分別闡明歷史的「真實」與「事實」的。他們亦不善於分層次來做它的分析。

各位都知道，以客家系農民爲核心展開的太平天國運動過程裏頭，洪秀全自認爲是基督的弟弟，他那有可能是基督的弟弟。事實上基督的弟弟雖然不會是歷史上的「事實」，但後來逐漸在運動過程中醞釀成歷史的「真實」隨而捲入並動員了不少信徒，參與運動。不可否認，洪秀全的「信念」終於轉換變成他自己的歷史的「真實」且擴大牽住了當年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低層農民群眾。但我們又不可不承認，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間的「差異度」過巨，最後還是要破綻的。太平天國終於

又見沒落和崩潰是個最好的事例。

類似的例子，可以找希特勒與東條英機來闡釋。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一說，東條的「大和民族優秀論」以及「大和魂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國體神聖說」等等，當年雖能給一般德國人，日本人尤其是懼共反共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灌上迷湯，醞釀一時的「愛國」的假熱潮但最後還得破綻，挨上原子彈等的悲劇。

前「近代」時期的農民運動尚可利用「迷信」來推行。但二十世紀以後的改革反體制運動則再也沒有可能利用「迷信」，非科學的邏輯來獲得勝利碩果的餘地了。這一點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不然我們的悲劇將會很不客氣的降臨到我們頭上來。

最近我發現，圍繞着我們台籍僑界甚至於島內「黨外」界正在醞釀有「接受“台灣民族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種怪氣氛。我得敬告諸位，這一種氣氛或許能得勢於一時但搞不好，處理不妥很可能會變成「台灣式法西斯主義」的「鬼胎」。如此的話，它將引起的災禍將是無窮。

沖昏了頭的人們、鄉親們，當前一聽我如上的話，他們當然會大罵我，罵我「胡路塞」，還好他們尚未掌權，若掌了權的話，他們非把我關進監獄裏不可。

我們鄉親的大多數人是屬於聰明人，為了明哲保身，對這些問題都不願碰。只有我這個“胡路塞人”又是“傻瓜”的人才會提這些問題。總之，希特勒認為他們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野郎自大地大誇他們的國，大談他們的大和民族優秀論與大和魂無敵論。史實已告訴我們，他們有過甚多的老百姓喝了“迷湯”後被捲入旋渦裏頭。他們誤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災禍，害人傷己還殺了不少人，賠了甚多的命。

我們客家父老包括我們家父，認為我們是中原南下來的正統漢族，又是最純正的。因為他們不曾掌過權，亦沒有利用它來搞過政治，說一說，信一信且無傷大雅亦不至於惹過禍來，尚可說有其可愛之處。

大陸上的客家人如何想法我不甚清楚。但東南亞的客家人，很多都抱有很類似我們家祖父，家父一樣的思路與情懷，真叫人驚奇。這一點也是促使我來嘗試探討上述一些問題的原始動機。不管那些思路，心態正確與否，還是值得我們去整理與分析

的。

我介紹了半天客家鄉親的心態，恐怕諸位非客家人的朋友們不易懂，現在我可以向諸位介紹一部英文書是韓素英寫的。“The Crippled Tree”，是她的自傳體小說。

韓素英介紹她的家史，述及他們家是從廣東省的客家莊遷移到四川去的。他們父叔輩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但他們還抱持有客家意識和其尊嚴。她介紹了他們家的葬禮的形式，「洗骨」，「檢骨」，裝於金斗甕。在「走反」時還得揣着金斗甕逃難，這些可以說與我們家的作法完全一樣，真叫人驚奇〔一聽眾插話高聲說：閩南人也有同樣的作法和講法，叫做“金斗甕仔揸脚聽”〕。韓並沒有高唱客家沙文主義，她只是在闡述她的家史與她生長之過程而已。

---

### 華僑與華人

---

現在，我講第三個题目的“華僑”。鄉弟一貫地在日本學界主張，我們應該把華僑和華人在政治與法律上的範疇界定清楚，千萬別再馬虎混淆不清，叫別人生疑招起殺身之禍。

好比我們夫婦，住在日本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但仍然保持中國國籍拿的是台灣國府護照。因日本的國籍法是以「正統本位主義」為依據，所以我們的三個兒子雖出生於日本，未曾回過台灣或大陸。他們拿的亦是台灣國府護照，因而我們全家可以稱為華僑。

我們有些親戚，不管在日本或在美國已入當地國籍者，我把他們界定為日籍華人或美籍華人。鄉弟不但希望他們能自己好好在政治、法律的範疇上搞好定位外，我還勸告他們千萬不要參預台灣以及大陸有關的直接政治。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中國或台灣國府的公民故也。但他們可以仿效“出嫁的女兒”或“被招婿的男兒”關懷本家的家務事的方式，保持一定的距離來關懷故鄉的政治。這個當然既可以亦應該被容納才是合情合理的。但千萬不能亦不要超越自己的“定位”來直接參預海峽兩岸有關的政治。

實際上，說出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却不甚容易。除了本身需要有充分的覺悟與堅守居住國的法律外，還得有關方面的諒解及多方面的協助才能達到理

想的境界。

過去，不管是台灣政府，大陸中共的當局都有“墨守成規”，“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總認為中國人的後裔一概為中國國民或中國人。不管他是否已改了籍，入了現居住國的國籍。

往往有關當局，有意或許無意地把中國人的涵義搞成含糊混淆不清。

美、日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第一，因為華僑、華人人口不大，第二，其政治、經濟社會的基礎穩固並不很懼怕華僑、華人力量。

但華僑、華人人口眾多，且剛從殖民地體制脫離不久，議會民主政治剛剛起步，國民經濟尚未成形，社會上百孔千瘡且百端待舉的東南亞諸多新興國家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樣。

雖然東南亞的華僑，大多數已逐漸加入當地國籍變成當地籍的華人。但他們在目前還經常被逼面臨各種危機與厄運。

引發危機和厄運的主要來由可分為兩大方面：第一，為當地土著民衆，輿論界，知識界以及政府官員所抱有的普遍反華情緒和反華政策。今天因為時間不充裕弟不便多分析與介紹。在此我只限於第二來由，也就是華僑、華人本身以及他們先人之故國有關當局所惹起的側面來加以分析與介紹。

甚多外國有識之士，總認為華僑、華人不願隨俗，更不易被同化。日本學界甚至於認為華裔人士一般比起日裔人士，對「故國」之歸屬感特別濃重且強烈。

我個人倒是認為，中國人出外真能隨遇而安，在末節瑣事上亦的確能隨鄉入鄉。但在基本的生活規律上或在「文化」的核心部門，一般來說，華僑、華人都有固執其中華人性（CHINESENESS），並有把它連綿地續傳下去的欲望傾向在。

尤其在第三世界圈子生活的華僑、華人界為甚。

衆人皆知，我們中國人普遍地懷有中華意識、中華思想。在背後曾經主要支持它的却是華夷思想。華夷思想在作祟時，華僑、華人容易在主觀上自惹疏離感。幫助這一種疏離感的「不間斷性」（Continuity），還有，他們謀生活，求生存的客觀環境與客觀條件。

當地人民和社會、政治不接納他們甚至於歧視或疏離他們時，他們更願意，更容易或被逼得不得

不更堅持並延綿他們的中華人性，甚至是華夷思想。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正在動盪，華僑、華人的居住國與他們父祖的故國都起了莫大的變化。

人們對國籍、公民權的看法，有關對它的選擇（包括放棄原國籍或公民權以及取得新居住國的國籍或公民權）和態度都在變化中。

圍繞人們的生活價值體系，價值觀念亦逐漸走向多元化。華夷思想，在主觀、客觀上都變為不便亦不易維持的保守思想。

土著語文的興起，華文教育的後退，英文教育的取代叫僑界的有心人士感恐惶應付不易。

---

### 「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

---

華僑、華人有關居住國政府逐漸開放其入籍門戶，台灣、大陸的政情並沒有讓僑界人士放手走上「落葉歸根」之路，反而有促進其走上「落地生根」道路之趨勢。

本來，「落葉歸根」的生活哲學應該是附屬於華僑的。華僑本為出外打工，只圖借宿僑居，並無準備長留國外或定居的。有朝一日，他們總是準備衣錦還鄉的。但「落地生根」的生活哲學却是屬於華人的。他們已入當地籍，為了謀生活與求生存，他們亦準備作下長留甚至於定居的打算。一般而言，華人的回鄉省親，掃墓祭祖不過是一時性的。

最近二十年，僑界正面對着轉型、震撼、挑戰的時代而在徬徨。他們又正面臨着自「落葉歸根」（華僑）轉換為「落地生根」（華人），求生存的既曲折又艱難的道路。他們往往會掉進認同危機的困境而忙圖掙扎，但却不易整理出其思路或合情合理的自我解釋。

在此，我很願意把我多年來在日本探討下所成的未成熟的看法披露出來。

首先，我認為華夷思想與中華人性雖有重疊的地方，但其內涵，我們應該把它們界定清楚。華夷思想表面，具有排外並藐視異族的含義在。我認為該把它藏進歷史博物館的檔案箱底裏去。但中華人性却不一樣。

中華人性應該歸類於 Ethnicity 的範疇來認識的。Ethnicity 可以當做種族或民族的集團特

質來解釋。由共認有共奉的祖先之多種家旅，氏族或部族構成了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 常常彼此間保持有共同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等的文化諸特徵，這一些文化諸特徵，我們便叫它為 Ethnicity。有關「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 Ethnicity，我把它擴大又叫做中華人性（CHINESENESS）。有些朋友很可能叫它做「中國人性」來使用。

我們，下面繼續把 Identity 與 Chineseness 連起來探討，圍繞着我們華人自我同定的困境問題。

起先，我得主張。自我同定可有多元的。大分類起來，第一類為政治、法律上的自我同定。第二類為文化、社會有關的自我同定。

我認為政治、法律是人工的，華僑改籍然而入了居住國的國籍，這個只不過是加上了法律上的手續而已，國籍者，也只是個人與國家的合同關係，最多也不過是個人和國家之間在政治、法律上的一種結合關係而已。就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三博士的例子來闡釋，他們已取得了美國國籍，他們已成為美籍華人。他們在政治上當然得向美國國旗表示忠誠，當他們行使他們的美國公民有關的權利和義務時，所必須依據的法律當然是美國的法律。但我們不曾見到他們有改己姓名，有放棄中華人性而所行動。意思就是說，他們雖然在政治、法律上選擇了對美國的自我同定，但他們仍然可在社會、文化上保持對他「故國」有關的自我同定。這兩者之間並不發生對立以及衝突才是人的常情。

我認為華人們，能保持並繼續發揚光大他們的中華人性也就是豎立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於其出身的 Ethnic Group（種族和民族）並不妨礙他們在美國求落地生根之行爲。

三博士的類似例子，同樣亦可在美籍日裔人士群中，好似夏威夷的有吉州長，前共和黨上議院早川代議士等人的生涯上找出見證。

這些在美國可行的事例，在日本以及東南亞却是不易行得通。當地的政府、社會逼着華僑改了中國姓名以後始准入籍。另又盡其所能，在法律上，社會規範上加上多種的限制和規則，逼使華人慢慢磨損他們的 Ethnicity。甚至於想盡辦法，來抵制華人繼續發揚光大他們所持有的中華人性，並順利培育出「有根的下一代」的正當社會行爲。

實際上戰前的日本，借題發揮慘殺了朝鮮人。東南亞亦一樣，排華事件窮出不盡。歐美白人世界，歧視猶太人的事例不勝枚舉。

尤其最近幾年，印尼、馬來西亞、印支半島特別是越南，反華事件常假藉，華人對當地社會、文化、宗教不願認同，更對當地政府、國家不曾有過自衷的忠誠。當地政客一而再地利用種族主義來做他們的反華勾當。

故國，心有餘力不足，加上已改籍不方便發言或許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真是無能爲力。華人社團更是一盤散沙，並沒有能夠尋出合情合理的對付方法。更沒有弄出一套理論來向居住國有關部門試作溝通和公共宣傳。

據我多年來的觀察，華僑、華人所懷有的鄉情是濃厚的。「美不美鄉中酒，親不親同鄉人」便是一對反映上述心情的句子。

華僑、華人的愛鄉，回饋鄉土的念頭，却往往被誤解爲「愛國」的行爲。「愛國」的慣用術語上的國字，一般來言，所指的含義上多爲局限於鄉土而言才是事實。除了特殊的少數例子以外，它根本與認同於某個政權或政黨是有一段距離的。尤其是以華人身份來高喊「愛國」的話，當然容易引起居住國有關當局和人員的注意與反感。累積起來搞不好將引發殺身之禍的。

悲劇往往出在誤解與種族歧視主義的反華情緒與政策上。不但當地有關當局和人員如此，故國人士甚至於華人本身往往亦沒有搞清楚，政治、法律上的自我同定和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有別的。我且相信不但有別，更需要分別善待兩者才能真正認識問題的根源，尋出解決問題的要訣。

有關文化上的自我同定，常常要涉及到個人的信仰以及「靈魂」，精神層次等問題。至於有關社會上的自我同定，亦常常帶有血緣、祖傳、生理語言等等換句話來說，是屬於「命運」上的無法選擇甚至於無法改變的一種自我同定。

所以說，政治、法律上的有關自我同定，雖然有選擇和更改的餘地，但它的更改並不能又不該牽動同一個人的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才合情理。在人的本性與日常生活的常情裏來言，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是不易亦不能臨機應變地更改才

是真實。雖然它有可能逐漸被沖淡，但這個該另當別論。

在前幾年，我終於提出了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的概念。暫且可翻為「既矛盾亦動態的自我同定」。我認為一般華人以及在外面的其他僑裔人士，好似日、韓、猶太裔人士，不管他們有無意識，他們總會懷有上述的多重且錯綜的自我同定。同一個體內，抱持有一見好似矛盾，却並不絕對矛盾相對抗的雙重或四重的自我同定，並沒有什麼不公正，不正常的。入籍以後，一個人老是花心計掩蓋自己的“根”或民族特質時，他將只能掉進“One of them”沉沒於大海裏頭去。他又只能變為扮演不痛不癢且不甚光彩的小人物角色吧了。如此的話，不但對那個人本身，或對接受他變為新公民的國家社會都不會有太多的益處。不敢或不能接受自己出生的事實，又不敢或不能對已出生的尊嚴有所主張，甚至於不敢或不能面對現實，依據自己已有的Ethnicity來發揚光大自己的才能者，要在堂皇可見天日的「事業」裏獲得成功與勝利的碩果是絕少僅有，這個才是世界上的史實。

---

#### 背井離鄉者求生存之道——結語

---

時間已剩下不多了，我們來個暫時的結尾話。中國人的分支以及其後裔的華僑、華人，一般來言，他們亦懷有與我們先前談及的中原意識和邊疆觀極為相似的心態。尤其是，受過中文教育，出外第一代或年齡屬於老壯年那一代人為甚。

他們或許是他們本人，出國外謀生活、求生存、求發展的關爭場合裏難免遭遇到疏離、歧視以及包括生命危險的多種困境。他們常會感有寄人籬下，討生活的孤獨感，心中往往很是徬徨。失落感，不安全感不斷地襲擊他們。我們在海外飄泊多年，保衛着自己的後代而討生活時，常常又會感覺到我們本身是否將變成無「根」的浮萍一種存在。類似缺乏一份「有所屬」，「有所靠」，「有所託」的生活困境體驗，自然而然地讓人們感受到人生的懸空與迷惘。

現在在北美僑界呈現的，同鄉會、教會有關活動之活潑的一部份社會心理基礎又可藉此來解釋。人們為上述失落感所驅使，人人都有需求去追尋一些當前且暫時的「保護傘」或某一種心理上的補償

。大陸為原先出發赴外地者，往往上述心態反映在華夷思想，中華意識以及強烈的歸屬感（歸屬於鄉土為其中心內實）上面。

台籍的華僑、華人，因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加上光復後在台灣的挫折與遭遇，他們的心態，雖然老年一代人與老「華僑」（包括華人）們具有相同重疊的部份。但因為台籍僑界大多分佈於北美、日本（南美者據說有甚大差別，因鄉弟未曾親睹，不便多言）等的所謂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華夷思想已相當淡薄甚至於可以說少見其痕跡。

當前，我們在北美可以看到的「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的培養推廣「運動」以及「台灣話」的普及教育運動，除了有他們的政治意圖外，我們又可藉先前的心態剖析來認識其深層裏的社會心理基礎。他們的領導層很可能正在嘗試着「奪胎換骨」之作業。「故鄉·台灣」的處境驅使他們去追尋新的「取代」象徵和他們台美族獨特的一些且暫時的「寄託」或補償。

台籍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往往因其生活歷史背景的關係，有甚多鄉親自囿於「現代主義」（歐美白人與日本人透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價值體系與觀念），轉而看賤台灣國府，大陸中共以及「大陸人」之不正常心態。另外因其出身階級及其宗教信仰又再進一步驅使他們患上拒共，即拒中共的心理，這些作祟以後再形成他們抗拒“大陸人”的心態甚至於提升擴大為反華的情緒。

這一點，我們值得留意。我這個客家系台灣人，甚至於還覺有無限的悲哀和道不盡的內疚。

我總認為政治、法律上自我同定的選擇是一時的。我們千萬別搞錯，有關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具有「命運」性且具有半悠久性的特質。

我們雖然可以變換我們的信仰象徵或價值的中心類似黃帝與中原。但我們自己的Ethnicity是該為擇善保持並且該加功夫發揚其光大，才不致於徬徨和失落的。我們正面臨着，如何在外國教育出「有根的下一代」的重要課題，我們有何多餘的精力去「剪斷」自己的根，去自找徬徨之苦呢？我願與我親愛的鄉親們，同學們，不管來自於何方，我都願意透過切磋琢磨，相勉互勵的方式來一道追尋我們共同的且最合情合理的。更合乎發揚人性的求生存之光明方途。謝謝！！諸位！！〔眾鼓掌〕。

# 歷史的焦點 — 批評與反省 —

## 與寓言的黃昏

### 林中平

最近從八十年代雜誌上看到兩篇轉載海外刊物的文章：一是金延湘的歷史的焦點，一是殷惠敏的消費主義與意識形態。二文主要都是針對陳映真前一陣子出國前所寫的「大眾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而提出批評。筆者覺得這兩篇批評的文章很有趣。它們有趣的地方倒不是在對陳映真「消費社會」一概念的攻擊，畢竟陳映真在那篇短文中所描述的消費社會很簡短而模糊，筆者也無意為陳映真在這方面做什麼辯護。筆者較感興趣的是金延湘與殷惠敏二先生在批評時所使用的論證，以及這些論證背後所顯示的一些思想形態。筆者不贊成他們所使用的這些論證以及它們所代表的一些思想（陳映真的一些想法可能是錯誤的，但是問題大概不在於金、殷二人所指出的地方）。先談一下金、殷二文的優點：

金、殷二文點出了西方保守主義對於歷史、傳統、社會變動的一些看法。他們將那些看法應用到目前台灣裏面一些人的想法上來。這種提法通常比較少見，況且保守主義（或如海耶克所稱「真正的自由主義」）在西方也是一個持之有故的流派，他們對比較激進的人所提的警告至少有一些好處：可以使左派或自由派（LIBERALS）較有警惕心，因為對社會作大幅度的改變一弄不好就會產生極慘的後果，這些極慘的後果也明顯地要由那些「革命黨」所負責。（相對地來說，由傳統的不義、獨裁等等所造成的饑荒、疾病、階級無言的壓迫、罪犯、等等社會問題而言，保守主義者就比較不注意，也許是不太容易找出該負責的「黨」來吧！？）其次，金、殷二文至少在文字上要求台灣知識份子討論較大的社會與歷史問題時要重視實證，「數據分析」、理性等，也應當減少情緒性的謾罵與空泛的意識形態式的高調。這點筆者十分贊成。儘管我們該了解台灣多年來的政治扭曲常常使得寫理性與心平氣和的文章成爲非常困難，但是比較情緒性的言論並不能產生討論、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效果，它

只能激起一些有類似情緒的讀者底共鳴。但是當大家把情緒發洩以後，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且使本來已經對立的社會改革者更形對立，另一方面，讀者的情緒已被發洩，反而使改變社會的潛在動力（讀者的潛在動力）很廉價的浪費掉了。也許有人會說：海外知識份子在一較自由的氣氛下講「理性」的風涼話畢竟太容易了。但是，我們要反問：難道企圖將一個社會推向較好的方向是一件容易的事嗎？不應以一句話的風涼性就否定了話中可能有意義的內容。

談完優點後，筆者首先要批評金、殷二文的論證。

金文主要的論證如下：他分別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政黨。一種是建立在巨大的體系哲學信仰上、配合以嚴密的組織、並以一定的歷史任務爲目標的政黨。另一種是代表多元化社會一定利益集團而以短期政綱爲暫時團結力量的「民主社會」的政黨。金延湘認爲在東方社會中通常都產生第一種政黨（東方社會論？）。而且，要使西方的民主社會存在下去通常都只有在第二種政黨充斥的環境下才有可能。所以，金文結論：黨外不應成爲「革命政黨」，黨外歷史焦點的貧困恰恰是它「最大的財富」所在。

先討論一下金文的數據與實證。事實上，西方社會的近代與現代中許多政黨或龐大的集團往往正是金文所指的嚴密組織、歷史任務的政黨，不獨「東方」的政黨爲然。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大部份的社會民主黨乃至後來英國的工黨都是如此。其次，二十世紀西方的許多大工會，乃至目前時代的寵兒、左右國家方向的跨國公司，許多國家的社會黨等等，它們在組織結構上，甚至信仰、任務上都和金的第一種政黨相去不遠。反過來說，在許多極權，或高度權威性的國家中，符合金文第一種描述的政黨也十分少。例如說，我想金延湘也會承認，台灣的國民黨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沒有什麼「體系巨大的哲學信仰」或「一定的歷史任務目標」了。就像不

少共產國家的共產黨一樣，黨的哲學信仰或歷史任務只是一具空殼子的意識形態，而實際上黨內外的運作邏輯都與這具空殼子沒有關係。

筆者的批評正是希望顯示：一個社會的民主或獨裁等等的社會大現象絕對沒有像金文所描述的一一與那個社會中的一個組織的組織結構（或意識形態）有那麼深刻的關係。在某些社會中，一個只要組織嚴密却毫無意識形態的政黨（利字當頭是它唯一的意識形態）就可以當家獨裁幾十年。在另外許多社會中，十個金延湘所描述的第一種政黨也無法在其中唯心所欲。要點是在於一個社會中權力平衡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各種階級、集團、部門等等彼此的權力差不多，彼此能夠互相約制，那麼，那個社會中的人民所感受的自由程度仍然會不小。我不曉得陳映真心中是否真有「革命政黨」的想法，但是金文也承認：台灣政治上的黨外前途仍然充滿荆棘。請問：台灣黨外如何打破百分之二十的投票率水平呢（不是百分之三十）？如果台灣黨外永遠只局限在「人權」、「黨禁」、「戒嚴法」、「短期性的具體政綱」這些問題，而不更推廣他們的視野、不更深層的去了解台灣的社會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那麼台灣黨外的社會衝動大概會慢慢消失掉，而成爲金延湘悲觀的東方世界中的一具花瓶吧。（附註：金文似乎也遺漏了東方世界中的日本，更遺漏了長州、薩摩等等的知識份子，在德川晚期的革命精神以及包括明治初年三傑、自由黨、左派等等知識份子的哲學信仰與歷史任務了吧）

其次是關於殷惠敏一文的批評。

殷文毫不隱藏地說出「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卻使有千瘡百孔，即使多麼庸俗，多麼不合理，目前仍然是最有效率，也最能滿足人民需要的一種制度。」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反面是「國家」或「黨官僚」所規定的「合理」的計劃，於是，國家就進一步地把社會上各單元、各團體、乃至各個人來主宰運作的權利都剝奪掉。結果自然就走上了海耶克所說的「到奴役之路」。

殷文的論證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市場與統制經濟的二分法以及「市場經濟可能是必要之惡」的論證之上。這是西方保守主義最簡略、也是最典型的論證。殷文中特別強調討論問題的理性與數據分析等等，但是這似乎與他的粗略且不切實際二方法頗不協調。關於這粗略的二分法的種種問題，以及殷文中強調的「資本主義爲消費者提供了選擇性……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的論點，汪立峽在前進

五三期中一篇比較火爆的文章中已有批評，筆者不再重覆。

筆者特別想談的是下面的一個命題：海耶克、普蘭尼（M. POLANYI）等等這些古典的自由主義者（或現代意義下的保守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等的批判只有一些預言式的價值，而缺少經驗性、社會分析性的價值。即使就那些預言式的價值而言，到今天也大爲減少。而就他們的缺少經驗性、社會分析性而言，筆者覺得他們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價值是很少的。這些保守主義者最珍視的是西方傳統中好不容易才發展出來的這麼一點形式民主，所以對於許多左派乃至自由派的不知足，對於他們竟想要推翻這個制度，或大搞福利社會等等特別覺得反感。而蘇聯史大林主義的興起爲他們提供了最好的辯辭。他們強調：不要以爲西方發展出來的這一點形式民主是容易的，要珍視它，而且任何想改變它的企圖都會走向更壞的結果，蘇聯就是例子。但是，就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而言，既然連形式民主都沒有，保守主義者們的論調就比較沒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法治究竟是如何達成的呢？我們也許都曉得「法治」一詞在字典上的意義，但是，「法治」就做爲一種社會現象而言，它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它的社會基礎是甚麼？——唯有如此問題才對第三世界的國家有意義。可是，保守主義者似乎對這些問題沒有甚麼答案，他們甚至反對對社會做科學性的社會分析、實證或經驗分析。海耶克的整個奧國學派的傳說，乃至普蘭尼等等都多少持這個論調（這和殷惠敏的強調分析，數據等頗不一樣）。普蘭尼甚至用一些奇怪的心理論證來強調把社會當作科學、實證研究的對象就會導致史大林式的獨裁云云。總之，對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而言，保守主義既然講不清楚、不重視，甚至恐懼社會分析、民主社會發生學，他人值得借鏡的地方就實在不多了。

其次，關於保守主義的預言價值——例如，著名的「到奴役之路」的預言。首先要注意的是，海氏犀利預言的一個主要對象是福利國家的想法，更確切的說，是針對經濟恐慌以來的凱因斯潮流而言的。海氏及其門徒在三〇年代的劍橋與凱氏學派的辯論大概是佔下風的。其後，凱氏的思想風行一時，它在社會福利與財政政策上的措施徹底地粉碎了市場經濟與統制經濟這種粗略的二分法。那麼，福利國家是到奴役之路這個預言呢？這也許就要看我們對歐美等西方福利國家的評價如何了——堅持戰後



歐美福利國家是奴役的國家的人大概才比較會承認海氏預言的正確性吧？

當然，海氏的預言今天之所以仍然被人引用是因為他預言的第二個對象——行統制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好像符合他的預言吧？（我們也不能忘記的是：第三世界許多半資本主義或依賴性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獨裁與權威特性就更不是海氏的預言所能了解的對象了）。就筆者而言，海氏對蘇聯的預言仍然是很不成功的。理由如下：（一）就經濟運行方面而言，海氏的主要論證是集中在市場經濟價格體系的高度彈性與統制經濟的僵硬性二者對比之上而立言。但是，我們知道，價格體系在一個經濟亟待發展的國家並不是很重要的；其次，統制經濟對長期性的經濟規劃具有很多市場經濟所達不到的優點；最後，年前C I A所揭露的六〇年代以來蘇聯經濟成長率還高於美國的資料更顯示出海氏預言中經濟論證一面是大有問題的，依照海氏預言的話，蘇聯經濟早該崩潰了，那裏該是C I A資料中所揭示的那種情況？（二）就權力運行方面而言，海氏「決定經濟權力就是決定一切權力」的說法雖然仍然有他的要點，但也發生了很大的問題。蘇聯的經濟官僚體系在很早就已經龐大到蘇共中央無法控制的地步。蘇聯經濟的各個部門事實上在功能方面倒很類似於歐美國家强有力的利益團體，在多方面影響了國家整個的經濟運行。在大部份拋棄了市場運行機搆之後，蘇共中央企圖用千絲萬縷的條例與法規來控制它的經濟官僚體系，但是他們的經濟官僚體系在各個部門、各個公司、各種管理階層總是有辦法多多少少維持他們自己集團的利益。他們使蘇共中央的法規條例互相衝突，於是更有機會讓各種集團尋找漏洞。更讓人驚奇的是，爲了減少條例衝突，蘇共中央幾次想大幅度地刪減條例，並有效地控制這個經濟官僚大怪物，但一直都不成功，條例的數目只能暫時減少，過一陣子後似乎又「必然」地增加起來。「有效地」控制並規劃一個現代經濟體系事實上是社會主義經濟上的一大問題，這是歐洲的蘇聯學者如諾夫（A·NOVE）或柯耐（J·KORNAI）等一致同意的看法。諾夫還以「中央化的多元現象」（CENTRALIZED PLURALISM）來描述上述那種類似歐美利益團體的現象。所以，就權力結構而言，中央集權似乎有它一定的限度，絕非像海氏所說的那種一面倒的現象；而就歷史發展而言，史大林倒台後蘇聯有限度的自由化現象更非一些預言可以解釋了。總之，我們今天對社會

主義國家的評價應該超越「一定會如何如何」的預言層次了（當然也包括社會主義者自己們的預言）。仔細而實際地做社會分析，廣泛地接受多方面的資料似乎是島內外知識份子所該加強的一條路。

最後，我希望重新討論一下保守主義的「警惕」來結束這篇批評性的文字。雖然我在文中大幅度地批評了一下西方保守主義的種種。但這主要是基於這些保守主義者在一些島內外的知識份子中佔有太高的地位而有所感觸的緣故。可是，我們仍然得注意一下他們所說的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民主這種社會現象可能只是人類幾千年文明歷史中的一個短暫現象而已，今天我們似乎仍然不十分清楚它的社會真正基礎何在，如何才能「保證」它的存在呢？既然不清楚，我們在思想上就該更開放，拋除掉各種意識形態中的聖人與聖經心態，進一步地仔細分析歷史社會問題以求一些原創性的結果出來。（我們實在不需要再花時間在爭誰的說法是「真正的」歷史唯物論了。）同時，在行動上，我們也該更謹慎而謙虛地面對社會所可能的變動。社會主義者常自豪於他們對於「人」有真正的關心，有真正的進步的理念。但是在社會主義者短短的百餘年歷史中，我們却也常常看到許多政權、黨等等對「歷史任務」、對「黨利益」的著重遠超過他們對於「人」本身的關心。如果社會主義者也有他們的「黨的必要之惡」的抱歉，他們又有甚麼權利來憤恨保守主義者他們的「市場經濟的必要之惡」的抱歉呢？

所以，不滿意於時下歐美這種形式民主，或第三世界中的一些假民主的知識份子，不滿意於保守主義的「必要之惡」的抱歉的有心人，有志於改變這個世界而非止於「解釋」這個世界的歷史中的行動者，都應該多多關注在他們可能的行動後果所連帶的「責任」上面來。有人說過，政治作爲一門專業而言，從政者該嚴肅地爲他的政治決定的後果負責。同樣地，對於想改變這個世界的歷史中的行動者而言，他們也該嚴肅地爲他們的信念、思想與行動負責。不可諱言的，今天許多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許多許多方面並不比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來的好，甚至更差。保守主義者的一些警惕也許是條不錯的座右銘。就像一些海外知識份子的話——它們雖然是風涼的清談——仍然有它內容上的價值，保守主義者的許多警惕——即使有它的階級性與傳統心理情結——仍然值得一顧。

（附註：很感謝X君向筆者提供金延湘、殷惠敏、汪立峽三文。）

# 抗日英雄

· 王曉波 ·



## 變土匪？

最近，日據時代台灣史又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首先，在今年年初，抗日英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在文學界朋友，部份黨外人士及家屬等長期抗議下，終於獲得平反，重新遷入忠烈祠內。在遷入過程中，賴和的故鄉，彰化縣民自動出現了「路祭」，反映了賴和在民間崇高的地位。

其次，則是武禁抗日英雄林少貓，由於陷害他的漢奸陳中和之後裔陳田錨權勢的應用，竟然要將其污為土匪，而從忠烈祠內迫出。這引起了一些重視歷史大是大非的史學者、黨外人士等的抗議。

王曉波先生對這兩個事件均參與其中，知之甚詳。支援會夏令營王先生臨時趕來參加，即席介紹了林少貓事件的來龍去脈。本文即根據其演講錄音整理發表。

從林少貓事件，我們看到似乎有些人不論如何改朝換代，總是安居高位，榮華富貴。辜顯榮與陳中和兩個迎接日軍，靠協助日軍鎮壓台灣人民的漢奸，到了戰後國民黨主政之後，其子孫仍然是黨的中常委（辜振甫）高雄市長（陳啓川）議長（陳田錨）。國民黨這種做法太叫人不服了。有正義感的人那能不起來抗議呢！

——編者識

大約半年前，高雄市議會議長陳田錨與議員洪壽美起了一番爭執。原因是：高雄一煤氣公司招股，其股份中百分之三十屬國民黨退除役官兵組織；百分之三十屬榮僑公司；百分之三十二屬現有的液化瓦斯業者；剩下百分之八給社會人士投資。陳田錨議長因此決定，剩下的百分之八，由高雄市銀行貸款高雄四十二位議員，投資該煤氣公司。唯有高雄市議員洪壽美挺身而出抗議。她指出：由市銀行貸款市議員，事屬政治特權，身為議長的陳田錨，實不應假公濟私，而應該以身作則。陳田錨大怒之下，指責洪壽美弟，曾得銀行貸款，亦應屬特權。洪欲辯駁，發言時間已到，乃向其他議員商借發言權三分鐘發言。她表示：「我弟弟依法向銀行貸款，有足夠的抵押和保證。小市民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實在是因為沒有吞金的祖父和當過漢奸的父親，來渡過經濟不景氣關頭。」

所謂「吞金的祖父」，不是別人，正是陳田錨的祖父陳中和。一八九五年，辜顯榮引日軍進台

北，陳中和引日軍進荅雅區。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同年五月，日本能久親王率軍由台北基隆打進，在苗栗、彰化有八卦山之役。由於受到阻力，日本遂遣乃木少將，十月從高雄上陸。劉永福時，陳中和領日軍與劉對抗。義勇軍抗戰初期，劉永福手下三將領：北部有簡大獅；中部有柯鐵虎，南部有林苗生，即林少貓。在劉永福最早組織黑旗軍時，林苗生在屏東任一碾米廠老闆，後領弟兄上百人，加入劉永福部隊。劉永福離開台灣後，剩餘的義勇軍，則由林少貓帶領，繼續抗日運動。於此期間，林少貓曾數度計劃刺殺陳中和，未果。陳中和避到廈門；若干年事情平靜後，才回台灣。當時台人對陳中和的痛恨，無以復加。

陳中和出身窮苦人家，七歲時為「順和棧」老闆收養。滿清時代，他的生意已作到南洋，會說日語，與日本官府聲氣相通。據云，「順和棧」老闆告過陳中和，陳未打贏官司，乃企圖吞金自殺，把財產留給後人。此事見「順和棧」後人所出「瑛瑜

謎稿」集，集後有一「褪了色的故事」，談「陳中和」吞金自殺事，「陳中和」顯然就是「順和棧」後人所痛恨的陳中和。但是，這一段「吞金」傳說的真實性如何？據驗判結果：陳中和性自私，絕不會有吞金留給子孫的意思。另以陳當時的權勢，不至於下場如此，因此判斷，這個故事的產生，是有意製造傳說「臭」他。

洪壽美辯駁陳田錨時，只知陳中和吞金故事，不知道陳田錨之祖父陳中和當漢奸、鳴炮歡迎日本人進城一事。洪壽美獲悉陳田錨祖父曾為漢奸事後，於四月二十九日，資詢市政府民政局局長，「何謂「漢奸」？」據答：「懲治漢奸條例不治死人；台灣割據日本，陳田錨祖父陳中和行為不算漢奸行為，故依法不是漢奸。」洪壽美又質問：「林少貓是不是「漢奸」？」民政局局長小聲答以「是漢奸」。洪壽美繼續質問：「陳中和是漢奸這一段，為什麼沒有記載在高雄市的歷史文獻裏？」高雄市議會陳派遂群起反來，要求將林少貓移出忠烈祠，否則將民政局局長撤職。

林衡道出身有名的板橋林家，曾在汪精衛手下任職江蘇。馮作民曾請林衡道提議，核准引日軍進台北。林衡道曾作報告，上呈蔣介石，指出台灣抗日英雄賴和為台共，怎可入忠烈祠？賴和遂被移出忠烈祠。林衡道前科累累，可是負責調查林少貓入忠烈祠。林少貓不是「共匪」，為何要重新調查？並且林衡道所找的人，全是據時代御用士紳的後代，沒有親眼目睹林少貓的抗日事蹟，自然把林少貓說成是土匪。台灣報紙分南北版，南部報紙一片討伐林少貓的聲音，御用士紳的後代，夢話、鬼話連篇，把林少貓描繪成草莽流氓。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有不少可靠的史料，沒有散失，我們可以從這些史料，查證出林少貓的抗日英雄事蹟。

根據日人對林少貓的說法，民間的記載有「東方軍事紀略」，記錄林少貓的事蹟，證明林少貓確實不是土匪；他的軍隊是義勇軍中，軍紀最嚴謹的軍事部隊。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亦有記載，林少貓號令嚴格，從未干擾百姓，奸猾狡詐，對附近百姓常施小惠，故百姓給予掩護，行蹤難求。「日本警察機密報告」亦將盜匪與抗日份子分列；林少貓是第一號抗日份子，意圖恢復舊制，以芟除日本人為目的。日本在台「第十五憲兵隊致總督府報告」中，亦未把林少貓列入盜匪之流，關於

林少貓的記載是：林少貓轉戰於雲林地區，號勇善戰。本名為林苗生，又叫林義成、林少貓。劉永福離台後，又有渾號：小貓。義勇軍神出鬼沒直至一八九九年。由於義勇軍，日本財政負擔很大，連能久親王亦負傷而死，後藤新平、兒玉遂想行安撫政策。

劉永福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離開台灣，剩餘義勇軍部隊則繼續奮戰至一八九九年，繼續一場沒有希望的戰爭，只有憑着一腔丹青青碧，有時而窮。日軍亦戰得精疲力竭，最後決定招降林少貓，給林少貓小小一個行政獨立的自治區。台灣總督向林少貓招降：「只要歸順，一切條件都是沒有條件」。歸順後的林少貓開始貨殖，受當時日本警方地方總署的讚譽：「頗有貨殖能力」。

由於林少貓歸順後，以貨殖為名，私下支援台灣南部抗日游擊活動，使地方抗日勢力日長。鑑於林少貓不除，南部的武裝抗日不滅，日本遂於一九〇二年決定一舉殲滅林少貓。兩道佈署，搜索突擊林少貓總部，林少貓未防範之下奮戰不敵，遂告失蹤。日軍嚴密封鎖南北各港口，後於北部下淡水溪發現林少貓屍體，為保護大批婦孺從眾而死。屍體被獲後，日軍搜索即停。

林少貓打劫過漢奸家庭，如陳中和等，但是，林少貓部眾有無打劫民舍，騷擾老百姓住家呢？部下有一些軍紀不良，可能很難避免，但是日本辦務署機密報告中，對林少貓命令部隊打劫的報告沒有。以常理判斷，游擊隊強徵糧餉，可能很難沒有，不能因此判斷林少貓為土匪。

九十年前，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樺山資政攻佔台北，宣佈台灣民主國的失敗。日據時代，定六月十七日為「始政紀念日」。今年六月十七日，台灣舉辦了「保衛林少貓英名演講會」，「夏潮論壇」也出一單行本紀念林少貓。最近高雄市議會，多為過去日據時代皇民之後，利用權勢，壓迫高雄市政府，顛倒歷史。更有很多人出來講話、寫文章，指責高雄市政府濫用職權，歪曲歷史；要求高雄市政府損害先烈林少貓的毀謗行為，立即停止，要求政府對有關官員立即懲戒。我們作為中國人，深以林少貓為榮，以陳中和為恥。究竟林少貓是土匪？抑或是民族英雄？究竟陳中和是漢奸？抑或是除暴安良的好官？我們期望七月十五日的「林少貓調查報告」，作一個真實公正的評斷。



# 石棉的悲劇

懵懂無知的小孩正在石棉工廠廢物堆上遊玩。照片攝於印度 Ahmedabad，一座石棉工廠旁邊。該工廠亦將石棉排在普通廢水溝中（右下）

## 屏輝

兩個禮拜的接觸，便足以致命

約翰·洛奇，三十三歲，紐約金融市場的律師，年青、健康，事業如日中天，有個幸福的家庭，與懷著身孕的太太南茜，恩恩愛愛，憧憬計劃著他們第一個小孩的誕生。然而，夏天，當他們到海邊渡假時，約翰開始覺得不對勁，背常痛，身體容易疲倦。醫生找不出毛病。直到九月的有一天，他們驚駭的發覺約翰的肚子向外突出，皮膚底下的靜脈清晰可尋，第二天清晨，經家庭醫師檢查後，火急把約翰送到醫院，切片、X光診斷結果，醫生告訴

南茜，她的先生得了一種因吸入體內的石棉纖維而起的不治之症——腹腔癌（MESOTHELIOMA）！醫生並委婉的對南茜說，約翰活不了多久了，現在醫生們的最大努力目標是想辦法讓他活到他們的嬰兒出世。約翰是個律師，怎麼可能接觸石棉呢？原來，十三年前，二十歲的約翰，為了賺點外快，到一個石棉紙批發店找到一個短期——只有兩個禮拜——的暑期工作；用手清點石棉紙後，將算好的石棉紙搬到貨車上——就這麼短短的兩個禮拜！他吸進操作石棉紙時飛揚起來的石棉纖維，就足夠使他在整整十三年後得致命的腹腔癌！兩個多月後，醫師用盡了新、舊化學治療法，也回天乏術，瘦得不

成人樣的約翰，在一個晚上睡覺時悄悄的死去，還來不及見他一個多月之後出世的兒子。

強尼·卡爾遜，十二歲，一個長得健康，非常惹人喜愛的小男孩，他的爸爸，唐·卡爾遜是美國賓州一個修理貨車的工人，在換輪胎時，常要噴射石綿，以增強煞車的磨擦力。強尼在學校放假時，會乖巧的幫爸爸的忙。就這樣，年紀小小才十二歲的他，被醫生檢查發現，他胸腔中的石綿纖維使他得了胸腔癌！沒多久，強尼就去逝了。痛不欲生的卡爾遜夫婦在電視記者訪問他們時說，醫生沒有任何有效的治療，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心愛的兒子，一天瘦似一天，到最後幾乎僅剩皮包骨，不能抱他，也不能坐他身旁，因為稍稍碰他，強尼就疼痛難忍。卡爾遜太太流著淚說，強尼在病前，伏地挺身可做五十次，病後連搬張椅子的力氣都沒有了。

愛麗絲·傑克森，四十七歲，英國約契鎮的一位家庭主婦，身強體壯，有個十五歲的兒子及五歲的女兒，都被發現染上石綿性胸腔癌。那是因為三十年前，她十七歲的時候，在鎮上一個石綿礦廠當採礦工人。在飛揚著細小石綿灰塵的山洞中工作了九個月。愛麗絲在醫院中與病魔奮鬥了七個多月，往日爬山路好幾十里不當回事的她，病後瘦弱得連起來走路都需人扶持。她那尚不知人間悲哀的女兒說，媽媽從前可以把我抱著舉起來，現在怎麼不抱我了？聽來令人不勝唏噓。為了控告她從前工作的石綿礦廠，她還得拖著病軀到法庭作證。電視記者問她，廠方有沒人告訴你石綿的危險？她憤憤的說，那會有人告訴我呢？他們能給我這份工作就好像已是一種恩寵了！最後，愛麗絲還是撤下六十五歲的丈夫，兩個小孩，與世長辭了。

在美國，在英國，在加拿大，在第三世界的各個角落，有成千上萬像約翰，像強尼，像愛麗絲一樣的石綿受害者。越來越多因吸進石綿纖維而得的駭人病例，證明石綿的極度危險性，而這些疾病的嚴重性，不可治性，令醫生們束手無策，更使一般人聽了不寒而慄。

---

#### 用途與致病症狀

---

石綿，所謂的「神奇礦物」，有幾個特性：無論是韌性、張力、抗熱性、磨擦力、抗酸性，都比大部金屬強。這個又細、又輕、又軟、又韌、又耐熱、又耐冷、又抗酸的神奇礦物，成了非常有用的

東西，兩千年前人類已經知道使用，但還是在二十世紀工業發達，文明進步後，石綿消費量才急劇增加。現在石綿用途，百分之七十是用在建築業防火絕緣，其他則用來製造約三千多種不同的日常用品，如熨斗、救火保護衣、紡織品、水管、煞車，等等。甚至嬰兒痱子粉中也含有石綿（美國十九種痱子粉中，有十種含石綿），許多像紐約貿易中心的摩天大樓的鋼架都噴射過含百分之二十石綿的防火用液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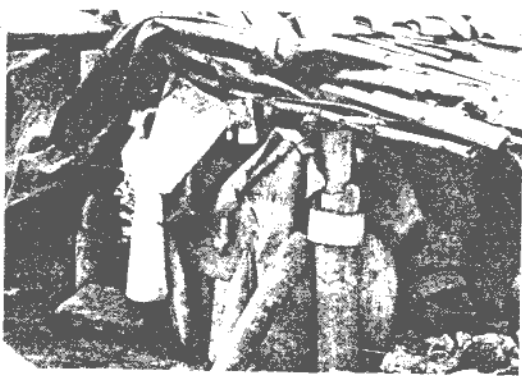
石綿雖好用，却很可怕。在採石綿礦過程，製造石綿產品時，或石綿產品被使用的時候，含細小顆粒（肉眼通常看不到），輕飄飄的石綿會逃入空氣中，然後被人體經由呼吸器官吸入肺臟中。進入人體的石綿纖維大部份停留在肺中，有些則隨著血液流到肝中、腸內、脾裏、甲狀腺內，甚至腦中。因石綿所致的疾病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稱石綿沉肺病。滯留在肺中的石綿纖維，使肺壁纖維化，硬化、變厚，得病初期的症狀是：氣喘、咳嗽、胸緊、胸痛，稍微使力則氣喘噓噓，末期則可能因氧氣不足而皮膚呈青藍，甚至窒息而死。第二種是肺癌。一半以上得石綿沉肺病的人最終都死於肺癌。第三種是胸腔或腹腔癌，是在胸膜或腹腔膜之間長了惡性腫瘤（即癌），這種病以前本來是很稀有的，但最近越來越多人患得，是最可怕最難治的。這三種病的潛伏期都在十年到三十年之長，也就是說，不幸吸入石綿纖維的人（不管是處理石綿的工人、使用石綿產品的消費者，或石綿廠附近的居民），短期是不會有症狀的，要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才發病。像上面所提的約翰·洛奇，在接觸石綿紙十三年後才得病，才記起十三年前所種下的病因；而愛麗絲·傑克森的胸腔癌元兇，更是三十年前她的那只作了九個月的石綿採礦工作。

美國聯邦政府估計有二千五百萬美國人曾經接觸過石綿纖維塵，據紐約一家研究石綿有關的疾病權威的蒙西奈醫院的研究員預計，從現在到本世紀末，美國每五十八分鐘即有一人因體中的石綿而病死，被認為是所有由環境因素所致之癌症中最大的兇手，約百分之十七的癌症是石綿纖維所致。除了上面所舉的三個典型的病例，美國最出名的石綿纖維受害者，是紅極一時，在台灣擁有衆多影迷的電影明星，史提夫麥昆。當海軍的時候，及在幾部他所拍的電影中，史提夫麥昆不幸接觸到石綿，得了不治的胸腔癌。之後，這位電影紅星耗盡家財，訪遍名醫，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無論石綿採礦工，

石綿產品製造廠的工人，碼頭工人，石綿工人的家屬，汽車修理工人，石綿工廠附近的居民，甚至使用含石綿產品的消費者，只要曾在有石綿纖維塵污染的地方呆過一天到三個月以上的時間，就有可能患上石綿性不治之症。

### 人們早就知道石綿的危害

先進國家如美、英、加拿大等擁有石綿製造廠的資本家，早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就知道石綿對人體的危害，保險公司甚至不願向石綿產品製造廠賣保險，因為他們知道保不起。陸陸續續還有不少有關石綿對人體危害的研究報告發表了。但是，資本家眼中只顧的是「利」，除非有人施以壓力，怎會想到工人或消費者的健康？於是美國幾家製造石綿用品的大廠商如曼威爾、歐文克寧、阿姆斯特壯，等石綿公司，不但不告訴工人或消費者石綿纖維有如定時炸彈似的危險性，甚至借用一些「科學家」，製造有利於石綿廠商的報告，而壓制住不利於他們利益的科學報導。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越來越多因接觸石綿而病死的悲劇，使得美國民眾瞭解到石綿的可怕，工人及工會開始對政府、廠方施加壓力，要求政府規定更嚴厲的石綿廠法規，嚴格限制在石綿廠空氣中所容許的石綿含量，要求廠方遵守政府法規，改善工作環境，為石綿工人所冒的生命危險，付更高的保險費等等。如今，美國法院石綿沉肺病、肺癌、石綿致胸腔腹腔癌的受害者控告廠方的案件成千成萬，大約每個月有五百件上了案！因製造銷售石綿成品而大飽私囊的資本家，在三十至五十年代造了孽。到了八十年代，那些受害者，已死



用石綿廢品搭成的「房子」。居於其中的人命運不卜可知。

的，將死的，未死的，才開始、才知道要討回公道！美國最大的曼威爾石綿製造廠因負擔不起太多的工人的、消費者的訴訟賠償費，竟狡猾地使用金蟬脫殼計，利用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宣佈破產後，隨即開張大吉，以逃脫賠償責任，還遊說國會要州政府負擔一半以上的賠償費，因為「他們也為政府賺了不少錢」。

美國情況如此，加拿大、英國也不例外。加拿大是世界三大石綿礦產地之一，在魁北克一個就叫「石綿」的小鎮，有一座極大的石綿礦山，山邊有一石綿產品製造廠。在小鎮街道上，放眼往前上方看，礦山頂，有一座如礮台般，管口朝天的輸送管，日日夜夜，從礦坑中不斷的排出灰白色的石綿礦廢物。當地的石綿礦廠，製造廠商，還得意的說，石綿為加拿大賺取大量外匯。又說「阿拉伯有石油，我們有石綿！」然而，賺錢的是那些廠商，遭殃的總是需賺取生活費的工廠工人，及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的當地居民及消費者！一個家住礦山腳下，從小在她家後園遊玩到大的猶在荳蔻年華的女孩子，因得石綿性胸膜癌死了。一個在石綿廠工作的工人，華特·吉恩得了石綿沉肺病，現在開車都要帶著氧氣罩，近幾年來，像華特·吉恩一樣控告廠方，要求賠償的有上千件。當地工會請紐約的蒙西奈醫院石綿病研究專家前往調查，在一百個被檢查的工人中，七十五人患有石綿沉肺病，肺癌或其他因石綿而得的疾病！如此算來，這工廠中，有七千五百個工人有著他們體中的石綿纖維所害的殘壞不全的肺臟，而這些人許多根本沒得到廠方的通知。蒙西奈的一個研究員說，廠方是不會向社會大眾交待，公佈調查結果的，因為他們怕民眾知道後不敢買他們的成品，怕工人、消費者告他們，怕要付更多的賠償費！這位研究員說對了，石綿廠商不但不理這些研究報告，還厚著臉在他們公共關係部門所編製的宣傳品中說，「……毫無疑問的，石綿產品是最安全的成品之一！」

英國最大的一家與美國資本家合設的石綿紡織廠，是在羅企德鎮的唐耐紐威爾石綿紡織有限公司，年收入近十億美金，該廠公共關係部誇口說，他們有最現代化的防塵設備，每年定期為工人健康檢查，所以他們的工人「非常不可能」染患石綿病。還說，工廠的工人每天工作時都「心情愉快，面帶微笑」，但一群由一位叫約翰·偉立領導的電視記者因要製作有關石綿的電視教育影片，要求進入工廠參觀訪問被拒絕。問及他們工人過去的病歷，廠

方說過去四年來只有三個工人得石綿沉肺病，但記者檢視病歷表，發覺至少有六人。過去二十年來有多少人死於胸腺癌呢？廠方答以二十三人，但記者調查結果有八十一人，根據估計，一九七八年後，十個工人中有一人將死於石綿沉肺病，肺癌，或胸、腹腔癌！而廠方却說他們的工人「非常不可能」得這些病呢；記者約翰·偉立將他調查訪問結果經由電視揭露出來，同時描述了愛麗絲·傑克森悲慘的境遇，驚動了英國上上下下，數千英國人寫信要援助愛麗絲的丈夫及兒女，石綿工人示威要廠方改進廠內環境，英國政府因欲平息民衆的怒氣及壓力，而將往昔規定的廠內空氣可容許的含石綿塵量再減低一半。

---

### 公害轉移到第三世界

---

先進國家的資本家們在本國因法規的嚴厲，民衆的壓力，工會強大的組織，昂貴的保險費等等諸多限制下，可圖之利不多，乃自然而然想到第三世界國家——資本的轉移對資本家而言是超脫國界的。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跨國公司高級行政人員世界性會議中，說得露骨，講的明白：第三世界給資本家提供了天堂般的設廠環境、經銷市場。原因何在？第三世界國家勞工既便宜、又馴服，法規不嚴格，工廠在空氣及水污染控制的花費只要先進國的花費的一半，工會組織鬆散甚或根本沒工會的存在，民衆對石綿危害的知識不多，有些國家（如台灣）更為鼓勵外資而給予外商幾年免稅的優厚待遇等等，等等。在種種有利的條件下，許多先進國的石綿廠商紛紛跑到第三世界，或遷或建，把極度危險的石綿產品製造廠外銷過去。

前面提過在英國設廠，英美合作的害耐紐威爾石綿公司，在第三世界二十個不同的國家均有設廠。美國最大的曼威爾石綿股份有限公司，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西、印度、南非，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均有分公司，這些來自先進國家的工廠是否遵守他們祖國的石綿法規標準呢？——當然不！事實上他們就是要逃避他們本國的嚴厲法規才湧向第三世界的啊！雙重標準（先進國的嚴厲，第三世界的鬆散）就是他們的標準。製作「石綿」電視影片的英國電視記者約翰·偉立專程到印度調查當地跨國公司石綿廠的操作，他所得的資料令人難以置信，拍下的鏡頭更令人髮指。在印度龐貝的一座叫做印

度斯坦法魯多的石綿成品製造廠是由英國的害耐紐威爾公司與當地資本家合資建成，英國佔七四％的股份。廠外不遠的地方有間學校，學校旁邊瀆滿著工廠所丟棄的石綿廢物，廠邊有著不少民房，小孩子們在堆滿石綿廢物的地面上玩耍。廠內更不忍卒睹，一個工人形容石綿塵灰就像「乾燥季節在泥土路面上跑的巴士屁股後頭飛揚的灰塵」。工人極少帶人工呼吸機或口罩保護自己。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石綿有多危險，因石綿纖維而得的疾病有多可怕！工人用掃把清掃地板使得石綿灰塵滿室飛揚，也沒有人告訴他們，濕拖把拖地才是較安全的方法。工人定期檢查，但廠方不通知工人檢查結果，却有些檢查發現有嚴重石綿沉肺病的工人被解僱了。工人的病歷顯示，這工廠中，每三個工人之中有一人患著或輕或重的石綿沉肺病或肺癌！

美國曼威爾石綿公司也不甘落後，在印度的阿姆德巴特鎮也設有一個石綿水泥廠（也是與當地合作的）。這個工廠的不安全情況比龐貝的那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通向工廠的那條路兩旁堆積著工廠排除的石綿廢物，工廠雖被高牆圍繞著，工廠兩邊的水溝却積滿著未經處理的石綿廢水，附近房子旁邊也有許多石綿廢物，小孩子們在石綿廢物堆上遊玩。一位環境保護學家把這些相片顯示給美國曼威爾石綿公司的副總裁看，這位副總裁吃驚的說：「這簡直是犯罪的行爲！」美國的石綿製品在七〇年代後已規定要貼上警告消費者石綿危險性的標籤，而這裏所製造的石綿水泥成品是不必貼上任何警告標籤的。很諷刺的，當美國許多人在法庭控告曼威爾公司在七〇年代前沒有將警告標籤附在成品上而使消費者受害時，八〇年代的印度石綿廠成品還不肯加上警告標籤！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世界石綿協會的會議紀錄上，石綿資本家們講得最清楚不過了：在那些政府沒規定要貼上警告標籤的國家，我們當然不加標籤，假如當地民衆的壓力太大的話，我們才設法與當地政府商量，用最含糊，最不明顯的警告標籤。

---

### 台灣也大量出口石綿產品

---

上述印度情況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寫照，墨西哥、南非、南韓……等第三世界凡有跨國公司石綿廠的地方都不例外。因此美國一位頗出名的、很有良心的環境保護顧問，貝里凱沙門（BARRY CASTLEMAN）很沉痛的在他一篇文章中說，「當

危險、有毒的物質、技術，或工廠由先進國家外銷到第三世界國家時，先進國家保護工人或民衆生命的法規、標準、醫學技術却没有同時外銷過去，……這些年來在先進國家所發生的『石綿的悲劇』勢必在第三世界國家重演！」這使筆者想起，經濟以外貿掛帥，也製造大量石綿產品的台灣。根據貝里凱沙門的調查，美國在一九六九年以後，因本國在石綿有關法規上的嚴厲，民衆的壓力，許多石綿廠已停止操作，石綿製品在本國減產，於是其他國家內銷進來的石綿紡織物直線上升，圖一顯示，世界各國賣給美國石綿紡織品，來自墨西哥、加拿大、台灣、巴西的量最多。而台灣地方雖小，却占第三位！光是一九七六年一年，台灣就運往美國一百萬磅的石綿紡織品！據貝里·凱沙門說，這些多是在台灣設廠的日曆石綿廠（NIPPON ASBESTOS）所製造的。日本資本家也在本國法規變得更嚴格以後，就轉而利用台灣「天堂般的設廠環境」、「綿羊般馴服的工人」、「若有實無的鬆散法規」大量在台灣製造石綿產品，再把產品銷在台灣本地或外銷到美國來。看到了台灣生產這麼鉅量石綿產品這一事實，那幾幕石綿造成的悲劇底報導影片又歷

歷在眼前了。在石綿紡織廠工作的台灣工人，知不知道石綿的危險？曉不曉得石綿纖維造成的疾病的可怕？他們工作的環境是否跟印度的石綿工廠相差無幾？住在石綿廠附近的居民，使用石綿產品的美麗島上的消費者，知不知道他們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可能因現在吸入肺臟中的石綿纖維而得不治之症呢？

參考資料：

1. NOVA; ASBESTOS: A LETHAL LEGACY, A T.V. EDUCATIONAL FILM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JOHN WILLIS.
2. CASTLEMAN, B.: DOUBLE STANDARD: ASBESTOS IN INDIA NEW SCIENTIST, 1981, FEB.
3. CASTLEMAN, B; MADAN, R. & MAYES, R.: INDUSTRIAL HAZARDS EXPORTED TO INDIA, ECONOMICS AND POLITICS WEEKLY, 1981, JUNE.
4. MAYERS, J. THE SOCIAL CONTEX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ASBESTOS AN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981, VOL 11, NO. 2.
5. CASTLEMAN, B. & VERA VERA, M. J. IMPENDING PROLIFERATION OF ASBESTOS. IN HEALTH AND WORK UNDER CAPITALIS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YWOOD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3.
6. CASTLEMAN, B. THE EXPORT OF HAZARDOUS FACTORIES TO DEVELOPING NATIONS. IN HEALTH AND WORK UNDER CAPITALIS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上書)。
7. OWEN, O. S. NATION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 ECOLOGICAL APPROACH, CHAPTER 16: POISONOUS SUBSTANCES IN THE HUMAN ENVIRO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80.

圖一 美國石綿紡織品進口來源(英磅)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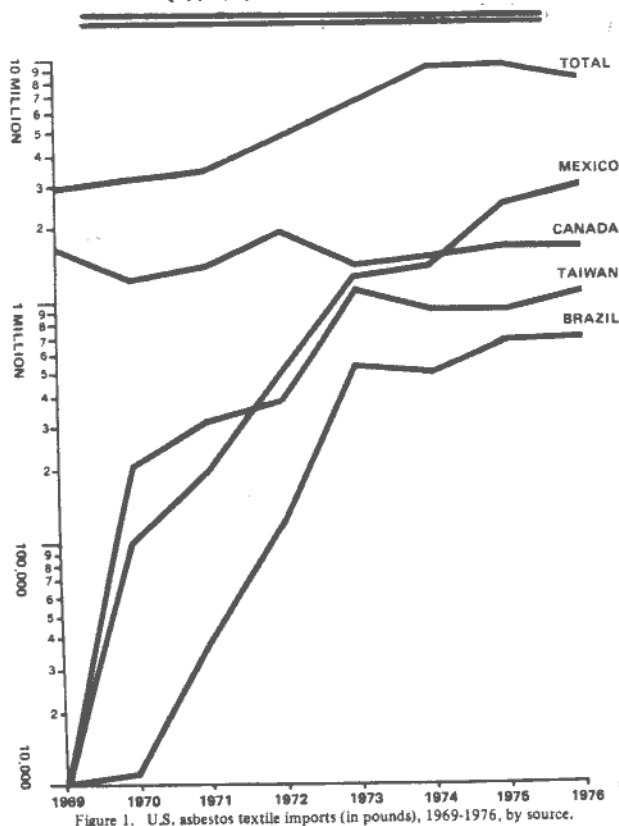


Figure 1. U.S. asbestos textile imports (in pounds), 1969-1976, by source.



# 介紹露西亞與

## 低度開發的回憶

談兩部古巴電影

吳弗林

從本文所介紹的兩部電影，讓我們看到，電影可以不必是好萊塢式的，不必是瓊瑤式的。另一方面，這兩部電影雖有深刻的思想，但也可以不必是教條式的，政治入股式的。近年來，台灣一些年輕電影工作者也開始突破瓊瑤式與政治宣傳式的框架、嘗試拍攝鄉土電影，引起人們普遍的注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古巴這兩部電影，很可供比較。

然而，本文之引人入勝，或者說，這兩部電影之引人入勝，還在於它反映了在時代規範下，個人所受的擺佈，個人內心的掙扎。人們要重視客觀力量，也不可忽視主觀努力的意義。這種種的矛盾，刻劃着人性的曲奧，是人類無數悲劇的根源，但也往往是英雄時代的契機。

革命前的古巴電影，深受好萊塢的影響，而她的社會、經濟型態，也是崇洋媚外，高度依賴美國。這些都與今日的台灣有幾分相似。是則，這兩部電影對於關心台灣的朋友而言，又有更進一層的意義了。推薦本文給你，更建議讀者們設法尋看這兩部電影。

——編者識

在美國談古巴電影，尤其是卡斯楚取得政權後的「革命電影」，有相當程度的困難。美國政府從一九六二年的「古巴事件」之後，便實施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古巴的影片無法直接進口，領到財務部上演執照。不要說一般觀眾看不到革命後的古巴電影，連各大報的影評人也不易看到。一九七二年在紐約要舉辦的「古巴電影節」，雖然有進步的好萊塢人士、影評人的聲援，還是被尼克森政權騷擾、壓制而不得已取消。在這種限制之下，從兩部一九

六八年前後拍成的電影「露西亞」(Lucia)和「低度開發的回憶」(Memories of undevelopment)來看古巴電影的概況，難免要患上以偏概全的毛病。其實這兩部電影是「古巴電影學院」(ICAIC)從一九五九年成立以來，所製作非常傑出的作品。「露西亞」在一九六九年取得莫斯科影展的金牌獎。「低」片是由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以業務需要的理由從古巴帶進美國，於一九七三年取得上演執照，在紐約公開上演。紐約時報的文生·甘比 (

Vincent Canby) 讚為：「過去十二年來，在紐約能看到的最佳拉丁美洲電影之一。」新聞週刊也有類似的推崇。

---

### 電影院不是作夢的地方

---

要談這兩部電影，就不能不談「古巴電影學院」。麥高·麥爾生 (Michael Myerson) 在他所編的「低度開發的回憶——古巴的革命電影」一書中，對「古巴電影學院」的功能及成就有扼要的介紹。這個類似「電影文化部」的機構，在卡斯楚打進哈瓦拿幾個星期之後，便委託圭瓦拉 (A. Guevara) 開始籌備成立。圭瓦拉和卡斯楚是大學同學，從學生運動領袖變成游擊隊後，他曾用簡陋的器材拍了一些有關革命活動的紀錄片，做為游擊隊的教育材料。「古巴電影學院」成立，主要的目的是利用電影媒體協助革命的推行。其業務範圍包括所有的有關電影活動：從訓練電影工作人員，生產各式影片，如新聞片，紀錄片，和劇情片等，管理各地的戲院，安排電影的排檔，到影片進出口的業務都在內。革命前的古巴和台灣一樣，戲院上演的不是好萊塢電影，便是墨西哥片。古巴本土的電影和其經濟狀況一樣，都是屬於低度開發的形態。在商業上無法與進口片競爭。所以一般住在都市的觀眾都已非常習慣於好萊塢的電影的表達方式、和其資本主義下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卡斯楚的文工人員而言，如果古巴人民能看到新社會美麗的遠景，社會主義的革命會進行的更順暢。「古巴電影學院」在這時期的工作，便是教育觀眾，讓他們了解電影院並不是作夢的地方，電影不是讓他們去逃避現實的，不是他們夢想的視覺化。相反的，電影是要提供一個可以讓觀眾檢討現實生活的視野，而這個現實，革命前或革命後的，都必須由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的角度重新定義、分析。由於表達內容要經過這種革命性的改變，表達方式、風格 (亦即電影語言) 也勢必跟着變化，在口味上已被好萊塢電影腐化的古巴觀眾，首先必須學習了解新的電影語言，才可能接受電影的意識形態。於是「古巴電影學院」到處舉辦電影座談會，討論電影風格、題材，解釋電影的基本語言。甚至在電視上講解電影技巧。透過這些教育活動，古巴觀眾對電

影的認識及了解，變得相當的「文明」，提供了一個可以「曲高和眾」的社會基礎。

除了改造觀眾的口味之外，「電影學院」也設法打通地域限制可能引起的落後觀眾。雖然全國有五百多家戲院，但這些戲院大多集中在都市地區。住在窮鄉僻壤的農人却沒有多大的機會進城去看電影。為了打通這個障礙，流動戲院便派上用場——將放映機裝在卡車上，開到鳥不拉屎的村莊去放電影。很多老農人總算在革命後，第一次看到電影，自從六二年的古巴事件之後，古巴觀眾已經很少看到好萊塢的電影了 (由於禁運)，為了解決片源的短少，電影學院從歐洲、日本、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進口電影。由於接觸到多樣性的電影文化，無形中，古巴觀眾欣賞電影的能力便較「精緻化」了。

---

### 從反映現實到分析前進

---

古巴電影，在「電影學院」成立之後，幾乎是從頭開始的。除了少數曾在外國學過電影的導演外，所有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太多的經驗。在早期，義大利戰後的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對古巴導演有全面性的影響。這個影響固然和這些導演曾在義大利學過電影有關，但主要的還是這個表現的風格和古巴的現況是類似的。戰後義大利的混亂，戰敗的衝擊、和重建的過程，在某些情況和古巴革命後的情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新寫實主義的風格及題材，都是針對現實的困境而發展出來的。這個影響在這兩部電影中，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痕跡。但是這個影響到後來便不再合適了。因為古巴的革命仍在進行中，情況與戰後義大利漸漸分歧，而所發生的事件，其意義亦不易由表面來猜測，所以用分析的態度可能要比用反映現實的態度來得適合。因此古巴電影工作者其實是跟着社會主義革命在摸索前進的。他們面對的壓力是沈重的。由於財務上的羞澀，他們必須拍得精簡。他們必須擺脫中產階級個人主義式的藝術觀，將他們的作品普及成大眾化的，不致於和觀眾疏離。在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他們不能不意識到政治覺醒的重要性，但又不能落入宣傳教條的八股。他們面臨的挑戰，在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而他們的成就也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露西亞」是索拉斯(Humberto Solas)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拍這部電影時他才只有二十六歲。他本來唸的是建築，後來進入「古巴電影學院」，拍了一些記錄片後，便嘗試拍劇情片。「露西亞」其實是三支短片的組合，分別講三個都叫「露西亞」的女人，在古巴歷史上的三個時期，發生的三段愛情故事。這三段影片根據其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用三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展示三個時代的風貌，是非常成功的。第一個「露西亞」的故事發生在一八九五年的古巴獨立戰爭。這個露西亞是地主的女兒，在當地的小鎮算是名門閨秀。平時穿着講究、打着陽傘、搖着摺扇上教堂，或在豪華的巨廈裏與其姐妹作女紅，聽鎮上流傳的閒言閒語。古巴與西班牙的戰爭並未對這些女人有太大的影響。她們仍收到巴黎寄來的帽子，互相起哄嬉戲。一天，在教堂的石階上，不意間遇到了一位才從西班牙過來的英俊商人。因為芳心大動，不能自己。交往了一段時間後，才發現這人在西班牙已有妻小。「露西亞」雖欲斷絕往來，但禁不起他的甜言誘惑，經過一陣痛苦的掙扎之後，決定放棄一切，追求愛情，與他私奔。露西亞的弟弟因為參加獨立戰爭，躲在山上他的家的咖啡園，組織革命武力。這位男人便建議逃到她弟弟匿居的基地，露西亞在熱烈的愛情中，看不出這個陷阱，帶他往她弟弟那裏去，終於引進了西班牙軍隊，將游擊隊一網打盡，「露西亞」的弟弟也因此喪命，原來這人只是西班牙軍隊的特派員。露西亞發現自己放棄一切全身追求的愛情被出賣後，捶胸頓足，在悔不欲生的絕望、憤怒中，拿着小刀，親手將背叛她的情人，活活刺死。這段故事，索拉斯拍得甚為雄壯，尤其是戰爭的場面，處理得有如史詩。連「露西亞」的兒女私情，對愛情的堅決，對背叛的憤怒，也予人偉大的感覺。古巴婦女在這個時代，依索拉斯來看，是受着大時代變動的擺佈而不自知的。例如這段故事提及的瘋婦，原本是個修女，抱着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操，到戰場上告慰死難的戰士，不意竟被散兵強暴而變瘋狂。這個瘋女在鎮上被嘲弄、侮辱，正是她堅決的獻身精神所招得的報酬。正如露西亞一樣，她們的能力處於那個時代，常是帶來悲劇性的結局的。

第二段，「露西亞」發生在一九三三年，那年正是號稱「熱帶的墨索里尼」馬加多(G. Machado)垮台。這個在一九二五年被選為總統的獨裁者，剛開始還頗有聲望。那時，古巴的糖業由於生產過量，糖價下降，已全然崩潰。由於糖業在美國商人以殖民地經濟方式的控制下，成為古巴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一種類似買彩票的經濟。當世界糖價上漲時，糖廠便大幅增產，產量一多，糖價又下降，形成極不穩定而無法成長的經濟形態。糖農一年有六、七個月要失業，因為只有收割及種植才需人力。馬加多上台之後，即宣稱要帶領古巴走向經濟、政治獨立的道路。然而，美國商人對古巴經濟控制的能力不只沒有減少，反而制訂了法律，讓美國電氣、鐵路公司能自由在古巴收購私人土地，擴大營業。當反對聲浪高漲時，馬加多便派軍隊、警察到處鎮壓，於是革命活動便秘密展開了。

這個三十年代的露西亞是受過正式教育的女人，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對她母親那種三姑六婆式的生活方式，有着智性的反感。故事發生在夏天她和母親去離島渡假。邂逅了避居在當地養傷的革命青年「阿鐸」，交往中「露西亞」對「阿鐸」芳心暗許。在回到內地重逢之後，「露西亞」便與「阿鐸」結婚。「阿鐸」仍然與其同志在都市進行武力鬭爭，「露西亞」接受丈夫的薰陶，也介入革命活動。她與「阿鐸」友人的女友同進成衣廠做女工的運動，在廁所寫「反動標語」，組織女工罷工示威。馬加多政府被推翻後，由雷蒙·克魯·聖馬丁(Ramon Crau San Martin)領導的政府，並未能成功的擺脫美國人的控制。內政情況也沒有改善，貪污、浪費、壓榨工農的現象反而變本加厲。「阿鐸」眼看着昔日的同志墮落了，革命徹底的失敗了，在痛心之餘，又拾起衝鋒槍，進行恐怖活動，終於中彈喪身。露西亞的愛情又再度成為泡影。這時的露西亞挺着懷孕的肚子，提着行李，徘徊在街上，不知何去何從。

在拍這一段習稱浪漫的三十年代青年，索拉斯

的風格很有法國電影的味道、場面調度用的很和平清俊，猶如一首恬淡幽愁的小詩，令人回味不已。在愛情方面，這個露西亞並沒有愛得驚天動地，然而是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心情的。在政治上，「露西亞」並未有獨立的自省，她是因為愛「阿鐸」才介入革命的，因此，「阿鐸」犧牲後，她是惘然的。不過索拉斯似乎有樂觀的暗示，「露西亞」終會繼續走向革命的道路。如果回頭看卡斯楚的革命，婦女的確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而卡斯楚也聲稱：「古巴最革命的事便是古巴婦女已開始從事自身的革命。」第三段「露西亞」便是這樣的故事。在風格上，這段拍得像齣義大利風格的人間喜戲，直接面對的問題，便是革命後的古巴婦女如何應付大男人主義的心態，而又同時能享受愛情，做個獨立自主的工作女性。這段仍在進行的革命，索拉斯並沒有提出答案，也不可能提出答案，但他提出的問題，是值得深思的。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露西亞」，是農村裏不識字的女性，才結婚沒多久。她丈夫「托馬斯」雖然自稱是革命份子，跟着新制度走，但是仍抱着一百多年前的男性至上主義，認為「露西亞」一切都得聽他的。由於善嫉，他禁止「露西亞」到農場從事生產活動，也不准她出外，或會見任何人。照「托馬斯」的講法，「露西亞」是完全屬於他的，沒有任何人可以去碰她，更別妄想染指了。雖然地方幹部曾對「托馬斯」加以勸導，要他不可如此反動，甚至威脅，如果情況不改善的話，組織不會配新房子給他。但是，「露西亞」因為愛她丈夫，雖然覺得不對，但也沒提出抗議。而幹部的協調也因女方默許這種對待，無功而退。事情變化發生在卡斯楚發動的消除文盲運動，被派到這小村莊教「露西亞」識字的，是個年輕教師。「托馬斯」起先杯葛，絕對不讓這男教師進到屋裏來。後來妥協了，但是每當這個教師在教「露西亞」時，他便在一旁監視。這個來自哈瓦拿的進步青年男教師，自然是同情「露西亞」的處境，一有機會便慫恿「露西亞」擺脫這種跡近奴隸的生活。一天，這事為「托馬斯」發現，大怒之下，打跑了這教師，也把「露西亞」修理一頓。「露西亞」便趁機逃走，住到幹部家裏去。她似乎已有自我意識的覺醒，決定過着進步的生活，拒絕回到「托馬斯」身邊。然而，解放的生活沒有愛情，而且也是枯燥無味，了無生趣的。影

片結尾，「露西亞」去找「托馬斯」重訴情意，希望能再住一起，但是堅決的要她丈夫諒解她必須出去工作，做個有用的人。「托馬斯」不改前態，還是認為是他妻子，就必須聽他的。兩人又吵又鬧，便糾纏撕打起來。

---

### 找到真正屬於古巴的電影

---

從第三段發生在三個時代，有關三個女人的愛情故事，古巴的婦女，正如美國專賣給女人的香烟（Virginia Slim）廣告所用的標語：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過來。看來還會繼續走下去，只要古巴的革命不停頓的話。在革命的過程中，古巴並不是沒有它獨特的問題的。雖然社會、經濟制度已社會主義化，但是過去在殖民化的資本主義下殘存的意識形態，仍然留在大部份人的記憶裏。農女「露西亞」的丈夫如此，在哈瓦拿的中產階級更是如此。「阿里」（Tomas G. Alea）根據「德士諾」（Edmundo Desnoes）小說「低度開發的回憶」改成的電影，便是講一個叫「舍喬」（Serio）的中產知識份子，疏離於古巴革命的心態。這部電影，是古巴電影的里程碑。從這部成熟、智慧的電影，古巴電影工作者才算找到真正屬於古巴的題材，而走出一條日後發展的道路。

「阿里」生於一九二八年，本來唸法律，在五十年代到羅馬學電影，這也是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對六十代的古巴電影有深遠影響的原因。（西方影評人常拿此片與安東尼奧尼M. Antonioni的早期作品相比。安氏也是處理疏離心態，但他的疏離是發生在後工業文明的社會下，追求物質生活疏離。）以他的年齡，在「古巴電影學院」算是老人了，七十年代，他主要的工作便放在指導年輕導演拍片，和撰寫適合於革命社會需要的電影理論。一九七四年，「低」片受到美國全國影評人協會（National Society of Film Critics）的特別獎，「阿里」因拿不到美國簽證，未能出席領獎。美國財務部立即警告，誰代領約兩千元的獎金，便得準備坐牢，罪名是「與敵人通商」。領獎當天，那時任主席的「沙里士」（Andrew Sarris），「村聲」週刊的影評人在政治上算是左的。誤將「阿里」比擬為古巴的索辛尼津。因為自從「低」

片之後，「阿里」有五年之久，沒有作品問世，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他一定跟卡斯楚對上了。不然為何這麼好的導演，沒有其他作品出來？「阿里」在一九七七年的一篇訪問錄中對這件事下這樣的評論：「像沙里士生活在那種環境，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一定很難了解。對我來講，我做一個導演能成就的，不會比我們整個「電影學院」這個團體的集體成就來得重要。僅只是為了滿足我個人的創作慾而犧牲了我的同事，我是不會有這個夢念頭的。個人的成就並非一切。講實在的，我並不是沒有這種意念，但是要滿足我個人的創作慾，我必須藉着古巴電影運動的存在來達成。沒有這個運動，我的作品充其量只是某一藝術潮流的意外罷了。在這個情況下，你可能享有一些名聲，但是却不能達到你的真的想達成的「自我實現」的境界。這個境界的是你覺悟到你可以盡你所能貢獻出去，而你工作的環境保證你這個可行性。」（註①）

#### 徘徊在門口的中產知識份子

「低」片的時間背景是一九六一年。主人翁「舍喬」的太太及雙親才離開古巴到邁阿密定居不久。他一個人在卡斯楚的新社會下，百般無聊，像個孤魂遊鬼，無所事事。他的時間不是花在對過去美好日子的回想，便是花在性的幻想及活動。即使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事件」，古巴總動員備戰以防禦「美帝」的入侵，他都像個局外人，抱怨自己生錯了時代。「舍喬」年輕時，想做作家。後來他父親給他一個傢俱店經營，他便埋首賺錢，而放棄到紐約與女朋友聚首從事寫作的計劃。後來結了婚，他成了道道地地的中產階級，像他的朋友一樣，不管政治，雖然覺得巴帝斯答（Batista）政權腐敗，生意難做，但也不能接受卡斯楚的社會主義。革命後，他們的房屋被迫出賣，但他們談的仍是美國今年的新車。一天在街上閒逛，他邂逅一個叫「愛蓮娜」的女孩。她想當電影明星，「舍喬」便毛遂自薦，說自己認識「古巴電影學院」的人，而且第二天便帶她去面試。這一段導演「阿里」現身說法，演他自己。順便提到，革命後的古巴和以前一樣，也有一個委員會之類的組織，專門剷除會敗壞道德的鏡頭。而這些片段，「阿里」却試着用在他的電影。（例如，講到好萊塢電影的公式化，「阿里

」便一直重複這些男女做愛的片段。視覺上，這些動作變得甚為做作、可笑。）面試當然是失敗了，「愛蓮娜」沒進學校受過什麼訓練，除了身材好之外，既不會唱歌也不會演。離開「古巴電影學院」，「舍喬」便引誘「愛蓮娜」到他位於大廈頂樓的公寓，拿幾件他太太沒帶走的衣服給她，在半推半就下，將她誘姦。兩人繼續交往下去，「舍喬」漸漸發現「愛蓮娜」膚淺，無趣。用他的話：「我一直都想過着像歐洲人的生活。但愛蓮娜在每件事上都迫着我感到低度開發的狀態。……她不瞭解，她腦子裏裝的是我非常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她不了解我。」

一天，他們去參觀「海明威」以前住的房子（已改成海明威博物館）。「愛蓮娜」當然連誰是「海明威」也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個北方佬（Yangkee）。屋中陳列着：在非洲打獵穿的長靴，美國傢俱，在西班牙拍的相片，英文書與雜誌，和鬪牛的海報。「舍喬」自白：「他從來沒有真的對古巴感興趣，他是來這裏避難，招待朋友，用英文寫書，在灣流釣魚。」古巴沒有美國野牛（Buffalo）。「舍喬」是不滿的，古巴，一個低度開發的海島，沒有一件事是持續的，每件事都被遺忘了，連人也是分裂，不一致的。他本來可以成為作家的，如果他當初能下定決心離開古巴的話，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或來得太早了？「舍喬」終於決計擺脫「愛蓮娜」的，他躲在海明威的書房裏，偷看「愛蓮娜」是否因為找不着他而與其他旅客一起離開。擺脫「愛蓮娜」沒有多久，她哥哥便找上門來。古巴是天主教國家（即使卡斯楚上台仍然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婚前性行為是敗德的，尤其是普羅階級的家庭。女方本來只要「舍喬」同意娶「愛蓮娜」便算了，但「舍喬」認為娶不娶她是由自己來決定的。女方的爸爸媽媽在盛怒之下，便控告「舍喬」強姦他們才十七歲的女兒。「舍喬」答稱，性行為是在女方同意下進行的，而且對方也不是處女。剩下的日子，他瞧着來他房子清掃的女傭，幻想與她作愛。焦灼的在他狹小的公寓裏頭走來走去，看報紙，看電視，而「甘迺迪」已公開宣稱不能容忍蘇聯在古巴配備任何核子飛彈基地。卡斯楚也強硬的聲稱絕不接受美帝國主義者對古巴國防的干涉。哈瓦拿在暴風雨欲來的前夕，軍隊、民防隊都積極、忙碌的佈署，「舍喬」自言自語：「戰爭如果現在打

起來，抗議是沒有用的，我曾像其他人一樣死掉。這個島是個陷阱，我們太窮、太小了，尊嚴的代價太高了。」在他的頂樓洋台，他透過雙目望遠鏡看着哈瓦拿城在備戰，坦克車在街道行駛的噪音愈來愈響，影片就在這時結束。

---

### 兩股文化衝突中的疏離感

---

這部電影的成就，並非在堆砌古巴革命的偉大。可觀的地方，是讓我們清楚的看到中產知識份子，徘徊在革命的門口，猶豫不決的心態。新事物對「舍喬」來講雖然提供了一個可能性，（這也是他為何不願離開古巴的原因。去美國，他只是個新進的移民而已。另外，他又有知識份子慣有的對中產的不齒，因此，革命對他而言，便是他對古巴中產階級的復仇。私底下，他是鄙視他太太，他朋友的。因為他們代表的正是他最不想要的但却已經變成的：看不起自己祖國，只顧自己的利益，心態上是個美國人，却住在古巴。）但是，畢竟太陌生了，與過去他所習慣的美好生活，斷了層。他要，就成為沒有記憶的人，重新開始。不然便只有讓過去的記憶將他吞噬。「舍喬」不幸屬於後者。照他的話：「才三十八歲，我已是個老人了，我上覺得自己變得更成熟、更有智慧，却開始腐爛，變得更笨，像爛掉的水菓一樣。這大概和地處熱帶有關係吧！這裏每樣東西都熟得早，也爛得快，沒有一樣事物能持久。我的生命就像一株畸型的植物，長着巨大的葉，却結不出果來。」他鄙視處於低度開發狀態，却無能為力改變現狀。而對自己文化的鄙視，却是因為已接受了外來的優勢文化，視之為當然。殊不知，本土文化之所以落後，正是優勢文化壓榨、欺凌的結果。與其說是低度開發，不如說開發錯誤來得妥當，大量的外來資金，在古巴均投資在為外國市場服務的農產加工業（如糖、菸草）。哈瓦拿做為加勒比海的巴黎，只是外國商人、觀光客的遊樂場。「舍喬」所代表的這個階級，便是靠着這個外來勢力對本土的剝削，在落後的海島上過着「先進」的生活。然而處於這兩股文化的邊緣，精神上的疏離是必然的，當這兩股文化衝突表面化之後，如果在政治上沒有相當的覺悟，「舍喬」便成為新時代裏多餘的局外人了。正如他說的：「每件事不是

來得太早，就是來得太晚。」一個生錯時代的人，焦慮，做白日夢，無所事事，腦子空無一物，在大時代的變動裏，反而寫不出東西，只能象徵性的藉着望遠鏡來認識這個新來臨的時代。「舍喬」在這種疏離感下，對愛也是無能的。他不能感覺，不能愛。他無法愛他太太，她離開古巴，本來已空虛的心，也感覺不到一絲悲傷、或喜悅。他對「愛蓮娜」，除了解決生活的無聊外，她的存在對他是沒有一點意義的，一個用兩三件他太太遺留下來的衣裙換來的女人，他是不用負責任的。「舍喬」十三歲就上妓院，作一次愛才一個披索。他是習慣於商業形式的男女關係的。他在新社會來臨時，已走到生命的終點了。

---

### 為群眾服務的藝術也可以是精緻的

---

照「阿里」自己講，「低」片在古巴演時，觀眾反應算是熱烈的，很多人甚至看了四、五次。如果這部電影和古巴的革命有什麼關係，那便是它令觀眾看了感到焦灼不安，迫使得觀眾去思考問題：為什麼「舍喬」——英俊、富有，與上層社會有來往，令觀眾情不自禁認同的主人翁，會一步一步走向虛無？對發生在身邊的事件，無能反應，與現實脫節，而成為一隻寄生蟲？在表面上，「低」片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線索，片中插進很多新聞片，例如拉丁美洲知識份子對「低度開發」的討論會，豬灣事件美國傭兵的自白。使得現實的氣氛很濃，而在思考上的視野也擴大成全球性的階級鬭爭。實質上，「舍喬」的問題，正是大多數仍留在古巴的中產知識份子的問題，古巴革命的領導階層，在這方面，容許「阿里」直接表現這種困境，的。比起「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算是相當文明的。從這兩部片子，我們看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藝術，可以不是政治宣傳（謊言），可以不膚淺，甚至不必叫喊叫殺，戾氣冲天。至少古巴電影工作者的努力，證實了一點，為群眾服務的藝術，是不用犧牲其精緻性的。

註①：這篇訪問刊載在「新藝」（The Cineaste）電影季刊，一本在紐約發行，專談政治電影的刊物。

# 一 意 一 見 的 一 回 一 響

## 「民主」與「台灣」之關係

對於「民主台灣」，我有個疑惑：「民主台灣」宣稱為「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出版。但我從沒見過支援會有過什麼活動，「民主台灣」也沒有支援會的報導，若支援會只是「民主台灣」的出版社，則「民主台灣」的出版宗旨似乎有必要重新強調，否則意見調查表只是對着虛空過招，無具體標準可以評判。

還有，貴刊名為「民主台灣」，對於台灣之探討尚可，但對「民主」與「台灣」之關係則甚少發揮，尤其在理論方面，對台灣走向民主化的社會背景，思想內涵，現實條件，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走向民主必然碰到的障礙所談甚少。希望貴刊在此方面多

有發揮。

另一方面，希望貴刊能對海外台灣人眾多的社團與刊物做一番歷史與現況的介紹與評論。在做評論時希望貴刊能表明分析之立場與評判標準。

讀者之一

## 應當提倡“台灣意識”

很遺憾看到民主台灣沈溺於“中國結”裡頭，尤其最近這期可以說完全投入於“夏潮論壇”的論調。如果台灣人民不有一個堅強的“台灣意識”，只能終久處於“你當家，我作主”的二等國民境界——不管台灣是獨立或統一，因此我以為海外熱愛台灣的人應該盡力來喚醒“台灣意識”，即使你們不贊成“台灣民

族論”，但是基於存異求同的心理，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劑使台灣人民早日覺醒而不沈迷於國民黨或共產黨所一再強調的“中華意識”的苦藥。我一直以為在島內堅持“台灣意識”的人是有理的，看看中國的實際狀況，又何必強求“統一”呢？事實上鼓吹“中華意識”或所謂“社會主義”對目前的台灣情況是無所助益的，要有任何助益可能只是幫助國民黨來壓迫“台灣意識”的早日成熟。如果真的心愛“民主的台灣”，並真的希望促其早日實現，我以為提倡“台灣意識”是一條必經之路。台灣人民如果願獨立，則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除了沙文主義者外，誰也找不出理由來反對；同理如果台灣人民願

### 民主台灣訂閱單

訂閱「民主台灣」\_\_\_份共\_\_\_期  
(每份每六期10元)請寄下址：

1.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3.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2. 自\_\_\_期至\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贈閱一期給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以上共訂費美金\_\_\_\_\_元。

我願捐款美金\_\_\_\_\_元。

支票寄：OS 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 — 意 — 見 — 的 — 回 — 響 —

統一，則所謂的“分離主義者”亦無能舉出道理來。目前我以為道理是那些致力“台灣意識”早日成熟的人那邊，而不是在“夏潮論壇”那邊。

在島內宣揚“台灣意識”是有相當的限制的，君不見“生根”系列之一再被查禁，而宣揚“大中華意識”的是普受台灣人民的直接壓迫者——國民黨——的大力支持。作為熱愛台灣的份子的貴刊諸君，難道忍心在海外呼應陳永善等人而被K黨援引來

壓迫、擠壓那被壓迫的台灣人民覺醒之芽呢？

讀者之二

## 一點小小的掌聲

我是剛從台灣來美不久的學生，初次看到貴刊時，真是驚喜，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竟然還存在着。我雖然不能完全吸收瞭解貴刊較專門的文章（我是念工科的

，再加上在台時被那群張着眼睛說瞎話的社會科教員搞得對文史恨之入骨），但對你們的支持不曾稍減。民主運動不只是政治革命，必須配合社會革命，文化革命。你們是屬於較高層次的半理論性刊物，曲高合寡在所難免，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求其盡心而已。一點小小的掌聲，希望帶給你們一點鼓勵！

讀者之三

## 稿約 — 這 — 是 — 您 — 的 — 刊 — 物 —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爲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爲我們的故鄉，爲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不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一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心。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OSDMT)  
P.O.Box 53551  
Chicago, IL 60653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548  
54TH ST, #2  
CHICAGO, IL 60615